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碩士論文

新台灣之子雙文化認同的心理歷程探究

A Narrative Study of Bicultural Identity and Its Psychological Process of
Children With Immigrant Mother in Taiwan



指導教授：許鶯珠 博士

研究生：張琬涓

中華民國一〇二年七月

新台灣之子雙文化認同的心理歷程探究

A Narrative Study of Bicultural Identity and Its Psychological Process
of Children With Immigrant Mother in Taiwan

研究生：張琬涓

Student : Wan -Chuan Chang

指導教授：許鶯珠

Advisor : Dr. Ying-Chu Hsu



i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July 2013

Hsinchu,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中華民國一〇二年七月

新台灣之子雙文化認同的心理歷程探究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新台灣之子雙文化認同的心理歷程，以質性研究中的敘說探究為研究方法，透過深度訪談三位青少年新台灣之子，以「整體－內容」和「類別－內容」的分析方式分析其生命故事，得到結果如下：

- 一、家庭內父母的社經地位、教育程度、文化傳遞程度，以及父親方對母親母國身分和文化的接納狀態等因素，可為三位新台灣之子的雙文化認同帶來啟蒙。
- 二、三位新台灣之子過往被歧視的經驗，與以主流價值觀、實用性，來衡量學習、認同的價值，分別對自我與母親母國文化的認同帶來影響。
- 三、三位新台灣之子於雙文化認同的心理調適偏向對污名化的回應。包含：行動發聲、情緒宣洩後保持心理距離、揭露、調整內在認知。
- 四、三位新台灣之子和環境脈絡間具有交互作用性，對族群文化認同不是單一選項，而是同時認同兩種族群文化標記，後依被主流文化接納的程度，在認同上呈現融合、半融合與期待被同化的狀態。
- 五、台灣社會對新移民概念的轉變趨勢，影響三位新台灣之子在不同時空背景下，分別以標籤化和去標籤化的方式被對待，呈現時代性具有建構接納與尊重多元文化氛圍的特性。
- 六、三位新台灣之子結合了父母雙方的跨文化資本，各自展現出屬於自己的生命色彩，比只有單一文化的孩子更具有多元語言與價值視野的優勢。

根據研究結果，研究者建議未來研究者，社群民眾、新移民家庭教育單位、學校老師、政府當局及多元文化諮商工作者，發現與重視新台灣之子的獨特生命色彩及優勢能力。

關鍵字：新台灣之子、雙文化認同、心理歷程、敘事研究

A Narrative Study of Bicultural Identity and Its Psychological Process of Children With Immigrant Mother in Taiwan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explores bicultural identity and its psychological process of 3 children with immigrant mother in Taiwan using 「holistic-content」 and 「categorical-content」 analytical methods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based on the qualitative approach, narrative inquiry. The research were explored as following :

- 1.The 「 socioeconomic status 」、 「 level of education 」、 「 the degree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 「 the acceptance of mother native culture from father 」、 「 in family, enlighten the bicultural identity of 3 children with immigrant mother in Taiwan.
2. The 「 discriminated experiences 」、 「 measuring the value of leaning and identity by the worth and practicality of majority 」、 「 influence the self and bicultural identity of 3 children with immigrant mother in Taiwan.
- 3.The bicultural identity and its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process of 3 children with immigrant mother in Taiwan trend to response to stigma. Including : acting out 、 maintaining psychological distance after emotional catharsis, disclosure, adjusting the inner awareness.
- 4.There is not a only one choice for 3 children cultural identity, but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cultural degree of majority identity. It will be presented on the state of integration, semi-integration and expect to be assimilated.
- 5.Transforming tendency of immigrant acknowledge affecting 3 children with immigrant mother in Taiwan were treated by labeling or not, showing the times has characteristics of constructing the atmosphere of acceptance and respect for cultural diversity.
- 6.Three children with immigrant mother in Taiwan combine cross-cultural capital of parents, showing their own life style, has a multi-lingual advantages and perspective, more than other children with single culture.

According the result, it is suggested to future researchers, community residents, th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of children with immigrant mother, school teachers,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unselor that the children within multi-cultural have their unique life style, and it is more important that we could not ignored their strength and how to find it out.

Keywords: children with immigrant mother in Taiwan, bicultural identity, psychological process, narrative research.

致謝

終於走到了睽違已久的這一刻，回首這三年諮商所的求學生涯，真是名符其實的理論與實務豐收之旅。當初選擇再攻讀第二個碩士學位，單純只是憑著一股想增進自己工作知能的動力，沒想到在因緣際會之下，在社區工作中有了讓我學以致用的機會，而這樣的機緣也成就了我這份論文。

在這趟旅程中，首先要感謝四位研究參與者—照鏡子會被帥死的ShenHu、尋找另一片天姐弟與不一樣的我，由於你們淋漓盡致的分享，才得以讓我成就如此精彩的論文內容，引領更多人理解新台灣之子在面對雙文化時的認同心境，重新用欣賞的視野和友善的態度，對待身邊和我們不同生活經驗的人。也要感謝照鏡子會被帥死的ShenHu的父母、性學研究所結識的好姐妹真瑤，以及美濃教會的潘傳道，熱心地幫我尋覓和引見研究參與者，大方地提供我於研究過程中所需的各項協助。

其次，感謝我的指導教授許鶯珠老師，於論文書寫過程中，耐心地協助我從文獻閱讀中建構研究方向，在百忙之中不厭其煩地和我一起閱讀數以萬計的文字，並在我思緒阻滯時釐清和提醒書寫和分析方向，且不吝給予讚美和鼓勵，讓我能按照計畫如期完成學業。更要感謝口委趙祥和老師與龔慧珠老師，由於你們專業、懇切的指導和提醒，讓我有機會再一次透過研究，以不同的視框看見研究參與者和自己的關係，除了使此篇論文符合敘說精神外，更讓我貼近與整合自己的生命經驗。同時，也感謝所內方紫薇老師和許韶玲老師，與二位老師一同進行國科會研究是一難得的經驗，除了為我的研究奠定更紮實的基礎外，也充分感受到老師們對學生的關心和照顧。三位老師各有所長，提供多元課程內容與學習視野，豐富我的諮商知能。另外，與我共同走過三年求學時光的4位同學—佩儀、頁莖、淑玲和牧臣，我也要說聲感謝，雖然我因工作的關係時常來去匆匆，但你們總是不忘熱情地邀約下課後餐敘，更於我不擅長的統計課程上提供協助。

再來，要對家人獻上最深的謝意，感恩父親榮貴和母親詠吟的支持，你們在生活上無微不至的照料，以及對我生涯抉擇的支持，是我最強而有力的後盾；更感謝妹妹和弟弟們在母親癌症第三度復發這一年來，承擔起主要的換藥工作，讓我可以有更多時間致力於論文的書寫。有你們在身邊，讓我在研究所的旅途中不孤單。

最後，最重要的要感謝我自己，三年前做出與六年前同樣的選擇，儘管因而無法有穩定的工作，但我在這過程中，除了於面對生命中不確定性的彈性與能力增加外，有更多對自己的覺察持續在發生著。這三年，發生了許多事，遇見了許多人，每一件事、每一個人共同成就了這本論文，崎嶇蜿蜒的道路，已然通往康莊大道，我的生命經驗也隨之充滿無限的能量，繼續往前邁進。

琬涓 2013.7.15

目錄

中文摘要.....	I
英文摘要.....	II
致謝.....	III
目錄.....	IV
表目錄.....	V
圖目錄.....	VI
第一章 緒論：研究者與新台灣之子的交會.....	1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研究目的與問題.....	13
第三節、名詞定義.....	14
第四節、研究限制.....	16
第二章 文獻探討：現在與過去的相互映照.....	19
第一節、新台灣之子的心理認同發展與困境.....	19
第二節、新台灣之子的雙族群與文化認同.....	25
第三節、族群與文化認同的社會心理機制.....	37
第四節、新台灣之子在多元文化下的新面貌.....	41
第三章 研究方法：進入敘說的世界.....	44
第一節、研究方法學.....	44
第二節、研究資料蒐集.....	46
第三節、研究資料分析.....	55
第四節、研究倫理.....	62
第四章 故事敘寫與文本分析：傾聽新台灣之子的生命交響曲.....	64
第一節、故事文本與歷程分析圖.....	64
一、照鏡子會被帥死的ShenHu故事文本.....	64
二、照鏡子會被帥死的ShenHu歷程分析.....	75
三、尋找另一片天故事文本.....	78
四、尋找另一片天歷程分析.....	87
五、不一樣的我故事文本.....	90
六、不一樣的我歷程分析.....	99
第二節、敘事文本分析.....	102
第五章 終曲：看見、反思與前進.....	157
第一節、研究發現與綜合討論.....	157
第二節、研究者的回觀行動與反思.....	171
第三節、建議.....	176
參考文獻.....	181
中文文獻.....	181
英文文獻.....	184
附錄.....	185
附錄一：研究邀請函暨同意書.....	185
附錄二：訪談大綱.....	1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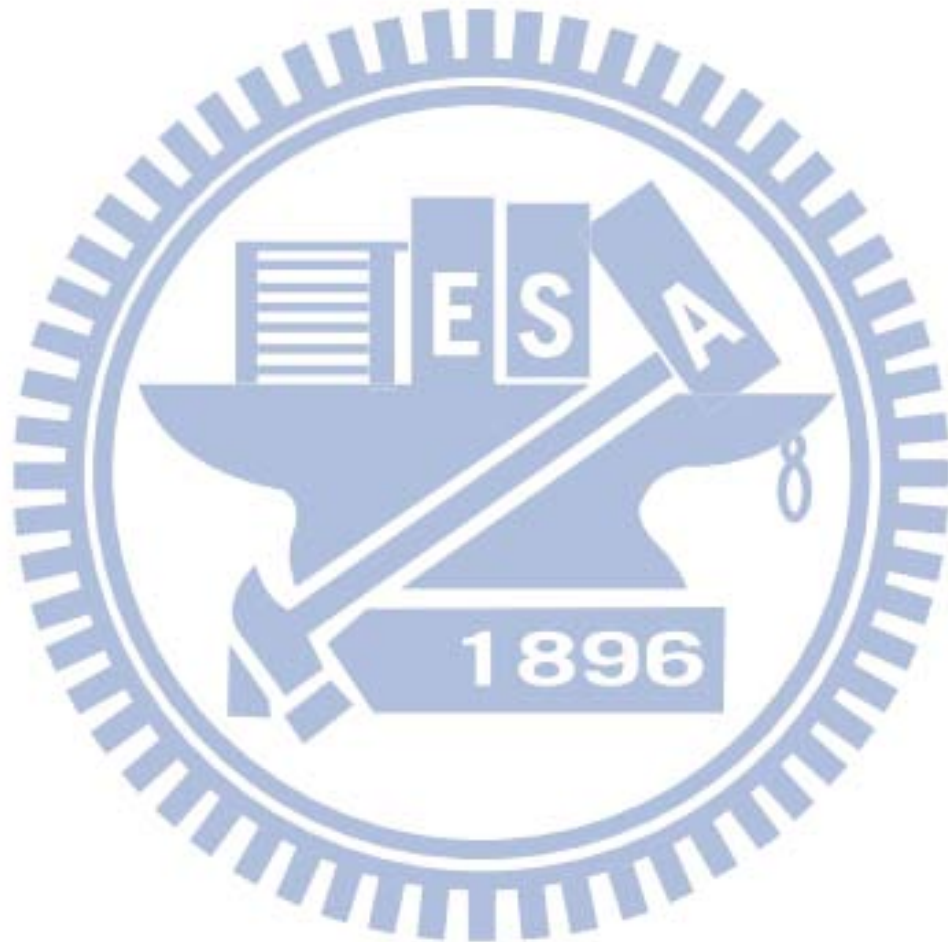
表目錄

表 1-1	100 年外籍與大陸(含港澳)配偶人數.....	3
表 1-2	100 學年度外籍配偶子女就讀國中小人數統計-國籍別.....	4
表 2-1	文化認同程度的四種形式.....	30
表 3-1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49
表 3-2	逐字稿編碼、研究日誌紀錄範例.....	54
表 3-3	故事敘寫與歷程發展圖相互建構範例.....	56
表 3-4	跨個案同類主軸彙編範例.....	58
表 3-5	跨個案異同比較彙編範例.....	59



圖目錄

圖 4-1	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對雙文化認同的意象圖.....	74
圖 4-2	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雙文化認同歷程發展圖.....	77
圖 4-3	尋找另一片天雙文化認同歷程發展圖.....	89
圖 4-4	不一樣的我雙文化認同歷程發展圖.....	101
圖 5-1	從「外籍新娘」到「外籍配偶」再到「新移民」、「新住民」.....	169



第一章 緒論：研究者與新台灣之子的交會

新台灣之子是近幾年來繼新移民女性之後，在多元文化領域上新興與熱門的研究族群，實務工作經驗引發研究者對該族群研究的關注。本章旨在說明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和研究問題，並進行本研究中重要名詞的釋義，以及說明本研究之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新台灣之子的形成背景

東南亞籍新移民女性來台灣的歷史，最早始於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期，當時為因應隨國民政府撥遷來台的老兵面臨擇偶的困境，而由少數在台的東南亞華僑媒介印尼、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等國家貧困的東南亞華僑婦女嫁入台灣。

1980年代中期開始，台灣正值工業轉型期，資本開始大量外移，1994年政府宣布南向政策，公開鼓勵人民到東南亞投資，加上大量引進外籍勞工，致使工廠紛紛關閉，大批本國勞工失業返回農村，以非正式部門的工作為生（龔元鳳，2007）。此時期家庭結構變遷，出現婚姻年齡延後、女性教育程度和地位提高、夫妻共同外出工作、妻子要求丈夫分擔家務、子女教養複雜且困難、照顧老人負擔、離婚所造成的單親和繼親家庭增多等現象，讓本國女性選擇成為單身貴族或不婚族趨勢明顯，傳統女大當嫁的婚姻制度瓦解，使得創業未成返鄉的經濟弱勢勞工，難以在台灣婚姻市場上覓得適當的對象。於是，這些已屆適婚年齡的青年人口，在中國傳宗接代的婚姻制度使命下，遂紛紛轉至距離台灣較近的東南亞國家尋找配偶。

夏曉鵬（2000）認為資本主義發展造成了國際間核心、半邊陲和邊陲的不平等國際分工關係，核心和半邊陲國家一方面將資本移往邊陲國家，另一方面也從

邊陲國家進口勞力，而半邊陲國家的農村勞動力卻也在此模式下，難在勞動市場上得到生存的機會，同時也影響他們在台灣婚姻市場上的競爭，只好向邊陲國家尋求婚配對象。從國內研究（莫藜藜、賴珮玲，2004）顯示，透過此婚配方式來到台灣的東南亞新移民女性，常常被標籤為來自於落後的東南亞地區、買賣的婚姻模式等負向說詞，因此，她們嫁來台灣後，自然也會被曲解、矮化，無法獲得家庭、社會應得的尊重與地位。在如此污名的眼光下，來自外界對母親的扭曲看待可能會自然轉嫁到新台灣之子身上，由他們繼續承擔。



二、新台灣之子的現況

根據內政部統計通報的資料，截至 2011 年底，我國外籍（含大陸港澳）配偶已達約 46 萬人(參閱表 1-1)，其中非大陸港澳籍的女性外籍配偶達近 133,255 人，約占總人數的 1/3，意即每三個外籍配偶家庭中就可能有 1 個由東南亞女性配偶所組成的新移民家庭，且有逐年增加的趨勢。隨著外籍配偶的增加，新台灣之子的人數也跟著成長，依據教育部 2011 年的統計資料顯示，100 學年度就讀國民中小學之「新台灣之子」總計有 192,224 人，約占全體國中小學生人數 8%，其中就讀國民小學者計有 158,584 人，就讀國民中學者計有 33,640 人，分別約占國小學生和國中學生比率為 10%和 3.5%，當中也以其母親為東南亞女性配偶的學童數為最多(參閱表 1-2)。相較於台灣本國配偶家庭出生率逐年下降的情況，新移民女性配偶的子女數正以直線上升的速度持續增加中，加上被視為處於家庭弱勢，受到社會的歧視與排斥，對於具有此文化特殊性家庭的新台灣之子，便形成了我們另一個需關注的新興面向。

表 1-1 100 年外籍與大陸(含港澳)配偶人數

總計 (含東南亞、大陸港澳外的其他國家)	合計		越南		印尼		泰國		菲律賓		柬埔寨		大陸、港澳地區配偶 合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459390	133255	29	86249	18.8	27261	6	8262	1.8	7184	1.6	4299	0.94	308535	67.16

資料來源：出自內政部戶政司(2012)

表 1-2 100 學年度外籍配偶子女就讀國中小人數統計-國籍別

國籍	總計	國中				國小						
		計	1 年級	2 年級	3 年級	計	1 年級	2 年級	3 年級	4 年級	5 年級	6 年級
總計	192224	33640	12736	11405	9499	158584	24593	27852	29070	29545	26508	21016
中國大陸	69044	12320	4950	4100	3270	56724	8196	9642	10216	10478	9616	8576
越南	71483	7514	3241	2597	1676	63969	11593	12679	12534	11998	9293	5872
印尼	28408	7732	2434	2666	2632	20676	2362	2880	3519	4044	4283	3588
泰國	4331	1264	395	443	426	3067	387	430	516	562	609	563
菲律賓	5630	1884	565	643	676	3746	445	525	577	664	755	780
柬埔寨	4526	478	273	172	33	4048	620	725	695	758	732	518
緬甸	2363	601	262	197	142	1762	205	257	248	296	376	380
馬來西亞	1623	619	188	214	217	1004	134	145	155	160	212	198
美國	751	142	47	38	57	609	129	106	102	88	111	73
南韓	613	181	52	51	78	432	64	57	72	68	85	86
日本	1059	321	108	110	103	738	139	111	123	130	107	128
新加坡	183	60	26	14	20	123	14	11	28	18	23	29
加拿大	216	35	19	7	9	181	37	32	35	31	29	17
其他	1994	489	176	153	160	1505	268	252	250	250	277	208

資料來源：出自教育部(2011)

三、實務現場的經驗與看見

就在2010年的暑假，研究者因緣際會到社大服務，有機會在社區中與新移民女性配偶和她們的孩子工作。在一次以新移民家庭為對象所辦理的社區親子活動過程中，與新台灣之子同住在社區內的其他兒童們前來詢問能否參加活動，我們表示竭誠歡迎並邀請非新移民家庭一起加入同樂，但此時就有幾個孩子互相說道：「我們不是外籍新娘的小孩，不要去」，隨後即出現一群小孩離開會場的情形。當時，研究者聽到這樣的聲音，回頭看到這樣的景象，強烈感受到一股貶抑和畫清界限之意，當下赫然發現，在兒童的同儕團體中，他們竟已開始自動從不同於自己的族群中區分開來，而孩子世界中「我群」和「他群」的族群認同區隔也就從這樣的互動中逐漸發酵形成。

在這之後，研究者便開始關注新移民家庭中的新移民女性配偶與新台灣之子。在社大，研究者發現到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是：新移民女性配偶到社大識字班來學習中文一事並不被夫家人所鼓勵，多是基於取得身分證的規定，而非真的想要讓她們有機會學習台灣文化，甚至有些夫家人還會追蹤她們到校上下課的時間，只要沒有在預定的時間回到家裡，辦公室人員就會接到家人來電詢問，或直接來社大找人，其家人此行動的背後似乎透露著一股擔心和不信任。這樣的情境更讓研究者連結到常常聽到身邊的長輩對新移民女性配偶的刻板印象，認為她們只要學會中文，取得身分證後就會跑掉，不安分、不聽話，只想從台灣拿錢回自己的國家。

然而，當研究者在社大性別課堂與幾位新移民女性配偶個別互動時，其中有人說到對她來說最大的困難就是孩子的教育和溝通，因為自己認識的中文字不多，國語也說得不流利，除無法於課業上給孩子教導外，在與孩子相處和行為教養也很力不從心，因此孩子的學習和管教多需仰賴夫家人。在語言隔閡的情況下，新移民母親可能渴望同時使用其熟悉的母國語言教導孩子，以及在生活中與孩子一起分享母國文化，但台灣社會不論是否對新移民母親有所貶抑和防衛，新移民家庭中位居主流位置的父親與其他家人，均以台灣文化為主要學習標的，忽略讓孩

子學習母親的母語和文化，形成孩子在只接觸父親單方語言、文化的情況下，容易感受到母親的一切被大家排斥和次等地位的狀態，與母親間的關係就可能產生心理衝突，進而出現低自我價值感。

2011年開始，研究者進一步有機會至新竹郊區的社福協會和國小帶領兒童人際關係團體，團體過程中看到的現象是，在這些新台灣之子的眼中，媽媽和別人長得不一樣，講國語、台語有奇怪的腔調；自己的膚色較黑，眼睛大而輪廓深，也和其他同學長得不一樣，如此差異的不被接納讓他們變得沉默、不敢說出自己的想法、人際互動有困難，有些孩子甚至遭受被言語和肢體霸凌的現象。這是研究者於實務工作現場中，所見聞之新台灣之子和其新移民母親在台灣的生活，令研究者感受到相當不捨和無奈，同時也嗅到似乎是一股「社會建構污名」的氛圍，讓他們陷入這樣的處境。



四、無所不在的污名

「媽媽，我是哪裡人？是越南人還是台灣人？我是不是比同學笨？」

——《不要叫我外籍新娘 p.74》

這是「不要叫我外籍新娘」書中一位新台灣之子，對自己身分認同以及自我概念所提出的疑問，可以聽出孩子開始承載著比其他人笨的污名標籤。這十幾年來，政府南向經濟政策發展的結果，從台灣移出的都是高教育、高技術人員，移入台灣的新移民女性配偶多數來自東南亞經濟落後國家，學歷較低，結婚的丈夫亦有低收入戶與身心障礙者，她們平均生育子女數高於一般台灣家庭，遂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新台灣之子」，一個聽起來充滿希望的名詞，相關的研究與報導因而如雨後春筍般出籠。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曾在 2003 年進行新台灣之子學校適應情況的調查，新聞稿報導指出，新台灣之子有 33.29% 學習適應欠佳、20.83% 生活適應欠佳、38.11% 在校整體適應欠佳、僅有 7.77% 適應良好（台北市政府教育局，2003）。在台中榮民總醫院進行的研究中指出，外籍子女有 26.47% 「相當高」的發展遲緩比例；高雄長庚醫院更指出有高達 63.6% 的外籍子女出現發展遲緩的現象，但這二項研究的推論樣本均只有 100 名左右（楊瑪利、楊艾俐，2004），就量化研究的觀點而言，此樣本數並不足以形成推論母體特徵的依據。

截至 2011 年，研究者以「新台灣之子」、「新移民/住民(女性)子女」、「外籍配偶/新娘子女」、「跨國(婚姻)家庭子女」等關鍵字，查詢國家圖書館之全國碩博士論文資料庫，得相關之學位論文近百篇，這些研究主要聚焦於生活適應(蘇玉慧，2006)、學業成就與生活適應間的關係(鍾文悌，2004)、教養態度(蘇容瑾，2004)、社會支持(李怡璇，2005)、家庭環境與學業成就間的關係(柯淑慧，2004)、家長參與和學業成就間的關係(陳清花，2005；劉芳玲，2005)、自我概念與人際關係間的關係(熊淑君，2003)、親子關係及家庭氣氛與生活適應間的關係(葉宜亨，2005)、家庭環境與其自我概念、學校生活適應間的關係等面向

(王雅惠, 2006), 其中以教育議題中的學習成就、生活適應, 及其間的關係主題居多, 雖然各研究結果間各有定論, 但有傾向顯示由於文化差異、經濟弱勢、語言溝通障礙, 家庭結構失功能等因素, 造成新台灣之子低自我概念、生活適應不良、學習發展遲滯、學習動機意願低落與人際關係建立困難的情形(柯淑慧, 2004; 莫藜藜、賴佩玲, 2004; 蔡榮貴、黃月純, 2004; 鍾文悌, 2004)。

因此, 「外籍新娘」、「新台灣之子」似乎已被污名化, 成為低素質的代名詞。這些刻板印象與歧視態度迷漫在社會各階層當中, 且看似有相當證據的污名印證, 新台灣之子生活在此污名化的意識形態環境下, 可能使得他們在認同發展的過程中, 因為了融入主流文化而需貶抑母親, 落入文化不利所帶來的學習低成就、不被接納的人際疏離等困境, 而不斷經驗罪惡、無力、自卑、自我厭惡等心理感覺歷程。



五、污名化下的認同困境

「班上有一名學生的母親是泰國籍，當我建議媽媽來學校介紹泰國時，只見孩子低著頭不說話，也不做任何回應，因擔心受到歧視，過不久孩子便轉學了。」

——《新台灣之子 p.163》

「孩子的心裡其實很孤單」，這是賽珍珠基金會執行長柯宇玲對新台灣之子內在聲音的同理感受，她認為，因為台灣社會不能真正接納他們，讓這些孩子產生很多防衛機制（楊瑪利、楊艾俐，2004）。就身為助人工作者的研究者而言，對於這樣的回應產生很大的共鳴。由於媒體對於新台灣之子過度負面報導，以及相關研究的負面結論，加上在社區工作時所觀察到的現象，研究者認為新台灣之子之所以背負著低自我概念與學習低成就的污名，可能與其在社會化過程中，內化他人的價值觀而成有關。

以孩子的成長歷程來看，隨著年紀的增長，其主要的認同對象從家庭中的父母親，延伸到學校的老師與同儕，甚至擴展到社區生活環境中的各種人際互動關係。依據 Erikson 的心理社會階段理論，青少年時期會面臨「自我認同—角色混淆」的危機。在這個階段，個體必須自我認同、忠誠、享受自我，否則將造成個體覺得自己不夠完整、不定型（游恆山編譯，2004）。由此可知，青少年時期正處於個人由家庭走向社會，發展自我觀念及社會態度的關鍵時期。青少年在與文化環境的互動過程中，逐漸對族群概念以及文化規範產生了深刻的體認，並建立其價值信念。除了所有的青少年所需面對自我認同的問題外，弱勢族群的青少年往往還必須面對族群文化認同的問題，亦即個人對某個族群團體及其價值和傳統文化的認同（Phinney, 1990）。Weinreich (1983) 指出族群認同是一種態度傾向，主要的心理功能是對抗在社會中生活的團體和文化，讓其受到政策、經濟或媒體的尊重，以及不受歧視、語言或身體上的攻擊（引自 Phinney, 1990）。因此，族群文化認同是自我認同發展的一個重要層面，且對弱勢族群之自我認同影響甚大。

個人的族群文化認同與自我認同有密切的關係，具有良好族群文化認同的人通常也有比較健康的自我概念和比較正向的跨文化態度。

但當我們的社會對於新移民女性配偶是如此貶抑的看待，自然對於她們所生的孩子也會持著異樣、排斥的眼光。孩子與母親臍帶相連，也會透過母親來認同自己和社會，當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感受到父親這一方強烈對母親母國身分和文化的貶抑，自己的母親無法被父親、其他家人和社會所接納和認同，這似乎就是在告訴孩子他有這樣的母親是丟臉的，但令其矛盾的是自己身上有一半卻流著她的血，是無法抹滅的事實，如此一來，他們在自我認同上的心理衝突便會油然而生。



六、從「心」重新了解

由前述可知，目前國內關於新台灣之子的研究，始終壟罩在「素質、學習能力差」的陰影中，但卻缺乏心理層面的相關研究，只是一味看見他們的行為問題與學業低成就，而忽略關注孩子們在成長過程中，面對父母親兩種不同國籍身分、社會對外國籍母親不友善的看待，以及二種不同文化差異所交織而成的心理發展與轉換歷程。在周美慧（2006）和李國基（2008）的研究中相繼指出，由於新台灣之子的自我概念普遍低下，且對身分認同感到混淆，遂產生自我認同的危機。這樣的研究結果讓研究者思考到新台灣之子被標籤的種種適應和行為問題，與他們在尋求認同的過程這二者間，必定有某種心理歷程和現象在發生並交織而成，似乎有重新再思考現象原貌的必要性。

Bronfenbrenner (1979) 指出，來自兩個不同文化婚姻結合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可能比一般的孩子承受更多負面壓力，週遭社會成員的排斥會造成其適應困難或低自尊，導致心理適應失調，甚至認同困境(引自夏曉鵬, 2005)。Phinney、Horenczyk、Liebkind 與 Vedder (2001) 以互動理論觀點在研究中指出，對移民者而言，雙文化的形成是重要目標，它包含成為主流社會的一部分，而達到這目標會帶來心理健康。在達成的過程中如果他們的努力遇到歧視或拒絕，不被大社會的成員所滿意和視為有生產性，則會令他們感到挫敗；如果主流社會正在接受移民者，他們會渴望和開始在原有的空間內，去調適進入新國家的過程，則將會有選擇成為雙文化認同的結果。成功的文化適應特徵包括有：心智和身體的健康、心理滿足、高自尊、好的學業成績和稱職的工作表現。

國內外其他相關研究也指出，族群認同、文化適應二者與自我認同、心理幸福感和行為適應間具有正向關係，跨文化個體接受融合或雙文化策略，有較好的心理和社會文化適應，有較強族群認同的雙文化青少年，也有較好的心理社會適應（陳毓文，2010；Abu-Rayya, 2006；Eyou、Adair & Dixon, 2000；Ward, 2006），早期經驗歧視的負向文化適應，或負面自我形象皆會導致失衡，形成憂鬱的心理症狀（Juang & Cookston, 2009）。由此可知，新台灣之子對於雙文化認同的良好

與否，均會影響他們的生活和心理適應情形。

綜覽目前所有關於新台灣之子的研究中，以新台灣之子認同議題所進行的研究共有10篇，多數聚焦比較新台灣之子對父母二種文化的認同程度高低、影響因素，認同形態，或其和自我概念、自尊間的相關情形(王聖雯，2006；李國基，2008；吳瓊沁，2009；莊家欣，2006；黃瓊瑤，2007；趙佳慧，2006；榮彩君，2007；龔元鳳，2007)，關於心理運作歷程的部分則僅有2篇(李維純，2007；陳佩君，2007)，主要探究新台灣之子雙重族裔身分的自我概念、自我認同發展內涵；研究樣本以小學階段的兒童為大宗，少部分擴及國中和高中職，至於大學則相當罕見；研究方法以問卷調查、實驗研究等量化研究為主，且問卷多沿用原住民族群認同的內涵，個案研究和訪談等質性研究相對少數。

對於就讀中學之新台灣之子而言，他們一方面正處於自我認同的重要發展時期，另一方面也由於父母是跨國婚姻的組合，可能因其膚色、文化背景、後天環境限制等不利因素，而被用以做為判別成內群體或外群體成員的重要標幟，致使他們在自我統合的發展過程中，的確比一般青少年多了一項「文化認同」的任務。當他們面對母親母國文化以及父親台灣社會主流文化的衝擊時，在其心理發展與轉換的過程中，勢必要比其他同儕承載更多認同上的壓力，也由於承受雙重文化的影響，使得他們的價值觀更容易產生衝突，進而造成統合的危機，發生適應上的困難。

因此，探索在中學青少年階段的新台灣之子，如何對母親母國文化以及父親台灣社會主流文化進行認同，以及在過程中會經驗什麼樣的心理衝突，產生何種行為反應和調適，將對新台灣之子是「素質差、發展遲緩、適應不良、行為問題多」等被我們所建構出來以為的「真實」，有多一些客觀的理解與固有刻板視框的解構。有鑑於此，引發研究者想探究新台灣之子在其成長過程中，如何經驗面對父母二種不同種族身分、文化，以及因這樣的差異所經歷的認同心理衝突、矛盾和轉換歷程為何的動機。

第二節、研究目的與問題

根據前節所述，本研究主要目的在了解青少年階段的新台灣之子，對母親母國文化及台灣社會文化的認同狀態，以期更深入的認識與了解新台灣之子於尋求認同過程中的心理現象，真實地呈現出他們對雙文化認同的生命經驗。本研究採質性研究的方式，以中學青少年階段的新台灣之子為研究參與者，關心與探究以下問題：

- 一、新台灣之子在母親母國及父親台灣社會主流文化間之生活經驗為何？
- 二、新台灣之子在二種不同族群與文化間，會經驗什麼樣的心理衝突，帶來何種行為反應和調適，以及認同狀態如何？



第三節、名詞定義

一、新台灣之子

依據歷年內政部戶政司(2012)的統計資料顯示，台灣已歸化或定居的婚姻女性移民中，以越南、泰國、印尼、菲律賓、緬甸、柬埔寨、馬來西亞等東南亞籍配偶為數最多，新加坡雖亦屬東南亞國家，但相對而言為數較少，政經環境也較其他東南亞國家穩定成長，其次為中國籍，再其次為美、加、日、韓等國籍。在這些國家中，除中國籍的語言和文化與台灣相似外，其餘國家均與我們相差甚大。

本研究會設定新台灣之子的母親為上述東南亞籍的婚姻移民女性，除了是人數為多、文化差異性大的考量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東南亞國家的經濟條件相較於其他國家落後，在這樣前提下所促成的婚姻，大多被視為是因經濟需求而聯姻，因而對她們有所貶抑。

因此，本研究所稱之「新台灣之子」，係指其生母原國籍為越南、泰國、印尼、菲律賓、緬甸、柬埔寨、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透過婚姻仲介或其他媒介管道，與台灣本地男子進行婚配後，定居於台灣所生，現於中學階段的子女。

二、雙文化認同

認同(identification)為個體行為社會化的歷程，亦即「在社會情境中，個體向其他個人或團體的行為方式、觀念態度、價值標準等，經由模仿、內化，而使本人與他人或團體趨於一致的心理歷程」(張春興，1989)。

當二個文化團體成員們互相接觸，過程中因二者文化交會所形成的部分改變，個體會經驗不同的心理變化，形成心理的文化適應(psychological acculturation)。這是一個動態的建構過程，是二個或多個團體經驗相互接觸的結果，關注的基本面向是態度、行為和內在文化認同 (Berry, 2001)。

由於本研究邀請的研究參與者，是兼具有台灣與東南亞二種雙重文化的特殊

背景，自小從家庭情境開始，進而延伸到學校與社會情境，便需面臨一連串尋求內在個人與外在社會一致性認同的衝突與涵容過程。因此，本研究所稱之「雙文化認同」，係指新台灣之子在母親母國及父親台灣社會主流文化間，如何知覺和學習二種文化的行為方式、觀念態度、價值標準，認同狀態如何，以及帶來何種行為反應和影響。

三、心理歷程

本研究所稱之「心理歷程」，係指新台灣之子在尋求母親母國及父親台灣社會主流文化認同時，個體與環境互動過程中，面對二種文化差異所經歷的認同心理衝突、矛盾和轉換等心理運作與轉變現象。



第四節、研究限制

本研究因研究對象的擇取、研究方法及研究內容，導致可能產生一些研究限制，茲將研究限制與因應方式說明如下：

一、研究對象擇取的限制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在新移民雙親家庭中，有接觸二國文化經驗的青少年新台灣之子，由於受限於此身分條件，在有限的時間內，遂透過研究者工作場域或人際圈直接或間接介紹，以立意取樣邀請符合條件且有意願參與的研究參與者，致研究對象的背景與生活環境會有極大相似之處。

雖然此為先決條件上的限制，但本研究係針對個體在面對二種不同文化時，如何覺知、學習，以及在過程中的心理經驗，每位研究參與者的生活經驗必定有其個別差異；更由於經驗是個體的主觀建構，即使來自相似生活場域的二個人，其對經驗和感受的解讀定有其獨特之處。

因此，研究者在與每位參與研究者建構生命故事時，盡可能地在大同中探詢小異的經驗，期能夠為本研究帶來價值。

二、方法上的限制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方法學中的「敘說探究」作為研究方法，以深度訪談來對研究參與者生命經驗進行建構與理解，並進一步透過文本分析的方式，初探新台灣之子雙文化認同的心理歷程。

不同於量化研究的以量取勝，質性研究的目的是在於透過特定族群或對象的訪談，來呈現社會脈絡中的某一種現象，研究參與者不多，所以並非以推論為主；而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本身就是最主要的研究工具，且敘事研究強調多元、主體性、脈絡和個體間的相互影響。

因此，在訪談和資料分析的過程中，研究者透過研究日誌的紀錄、與研究參

與者一同校正文本、與指導教授一同討論和進行文本分析、將研究日誌納入分析，以及最後納入二位口委的觀點，期能更豐厚整體現象的呈現。

三、內容上的限制

本研究對於新台灣之子雙文化認同意涵的界定、文化認同向度的參考架構，以及研究對象的選擇，乃依據國外族群認同理論，及國內外相關研究之探究結果而得，加上國內目前對新台灣之子文化認同的文獻極少，國際間對雙族群特性群體的相關理論與研究亦極為缺乏，因而恐無法涵蓋所有新台灣之子在雙文化認同過程中的所有內涵。

如上方法學限制所提，質性研究本質上就不以推論為主，但以敘事研究的多元建構特性而言，研究參與者的照片、文字記錄等歷史資料，均能夠為單純口述經驗帶來更多豐厚內涵，而透過此研究過程所收集到的豐富、多元資料，經由資料分析與詮釋過程，讓資料與文獻產生對話，雖呈現的內涵僅能視為是該特定新台灣之子們的個別化經驗，無法涵蓋所有新台灣之子在雙文化認同過程中的所有內涵，但期能夠成為本土理論建構的初步基礎。

四、未成年研究參與者知後同意的限制

本研究的研究參與者為未成年人，父母為其法定監護人，故在邀請研究對象時，除了向研究參與者解釋研究內容與過程，並探詢其參與的意願外，研究者還同時會向家長進行完整說明，需要於家長和研究參與者雙方均同意，並簽署「研究邀請函暨同意書」（參照附錄一）後，方開始進行訪談。

由於參與研究的意願非研究參與者本身一人即可決定，因此會面臨到家長不同意其孩子進入研究，或家長同意而孩子卻不同意的情況。當有此情況發生時，研究者會盡可能地了解他們成為研究參與者的各種擔心和疑慮，並加以澄清，再次說明研究過程中的保密原則和權利義務關係，期讓雙方不會因參與本研究而受到傷害。若經過此一過程，仍無法讓欲邀請成為研究參與者的對象同意參與研究，

研究者不會勉強對方，會積極再尋找下一位可能的研究參與者。

另由於研究參與者是未成年，父母有可能會對於孩子所說的內容感到好奇，因此，訪談和文本的內容是否也需要告知父母，也是研究倫理的考量之一。基於研究倫理中的保密原則，以及尊重個人的隱私權，研究者會向家長說明單獨與孩子訪談的必要性，約定訪談的時間和地點均會先告知，好讓家長放心。在文本內容的部分，也會向家長加以說明是以孩子所敘說的內容為主體，由研究者直接與孩子進行文本的建構，不在敘說內容的真實與否，而在內容如何被敘說，以符合敘說的精神。



第二章 文獻探討：現在與過去的相互映照

本章旨在藉由對心理、族群文化認同和多元文化相關文獻之探究，了解可運用於新台灣之子雙文化認同的理論與研究。第一節是探討心理認同發展相關理論，以及分析認同發展困境；第二節為探討雙族群與文化認同相關理論，以及整理和分析相關研究；第三節聚焦於新台灣之子在認同議題下的社會心理機制；第四節則是介紹多元文化觀點對新台灣之子研究的重要性。

第一節、新台灣之子的心理認同發展與困境

一、心理認同的意涵與理論

認同在心理學上的意涵是指，一個人將另一個或一群人的行為特徵，或內隱的人生觀、價值觀等，予以內化成為個人屬性的一種過程（張春興，1989）。青少年期是兒童晚期進入成年早期的重要階段，此時期除了生理的變化之外，更重要的發展任務為尋找「我是誰」的答案，亦即個體於社會體系中，透過與系統的交互作用，尋求一套思想、情感、價值、態度和行為以定義自我，獲知自己在當中的角色期待與社會位置（黃德祥主譯，2006）。當新台灣之子逐漸面對自己身分的特殊，與外在社會對自己、對母親，甚至對家庭的特殊眼光相遇時，自己如何看待身為一個新台灣之子的身分，可先從幾個主要的發展理論觀點，來了解其自我認同發展的心理意義。

（一）、C. H. Cooley 鏡中自我與 G. H. Mead 社會自我理論

Cooley (1956, 1964) 認為自我是社會產物，自我概念源自兒童與他人不斷地互動，由個體觀察他人對其所作的反應方式而發展的「鏡中自我(looking-glass self)」，由想像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想像他人對此形象的批評，以及由此

形象而發展出自我的感覺(如驕傲、羞恥、自卑…)等三個階段所形成。

Mead (1934) 更將此觀念拓展，認為社會自我是發生於人與人的互動過程中，個體將各種角色期待內化到社會自我之中，且終其一生不停地調適與改變的概念。他認為社會自我是由自我概念、自我覺察、自我價值和自尊所組成，在社會互動的過程中，不是每個人或團體對個體是相同重要的，會使個體產生心理認同的個人或團體即稱為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和參照團體(reference groups)。兒童的自我也就在當中學習他人的角色，以及想像他人對自己的評價而逐漸發展出來（引自林瑞穗譯，2002）。

依前述所知，台灣主流社會對於新台灣之子的研究和現象陳述，多顯示他們的學習低成就和人際互動困難，然而這是一種「結果」的呈現，若以此二理論來看這樣的結果，可以發現新台灣之子生活在週遭人均以素質差、能力差、適應不良的眼光來看待自己的情境下，會接收他人從與自己互動中所顯現的反應，開始形塑自己在他人眼中的負向形象和感覺。也就是說，當主流社會預期新台灣之子會出現學習低成就和人際互動困難，以及所衍生的各種行為問題時，重要他人(如，老師)和參照團體(如，同儕)對於他們就會給予負面評價和較低的期望，而新台灣之子就會以這樣的回饋來認定自己，呈現出符合外在期待的樣子，並產生羞恥、自卑的感覺，因而產生所謂的「比馬龍效應」(Pygmalion effect)。

(二)、J. Piaget 認知發展理論

Piaget (1950) 認為兒童的認知發展會以階段形式出現，透過平衡歷程從一階段演化至下一個階段，他提出感覺動作期、前運思期、具體運思期與形式運思期等四個階段，階段間的進展在於維持同化和調適間的平衡。最初，嬰兒出生不久後，會開始主動運用他與生俱來的一些基本行為模式對環境中的事物做出反應，獲取知識。此等以身體感官為基礎的基本行為模式，可視為個體用以了解周圍世界的認知結構，每當遇到某事物時，使用既有的認知結構去核對、處理，此即為基模(schema)。

隨後，兒童會在環境中所遭遇到的經驗，以及經驗發生時他們所具備的認知基模，兩者之間尋求一個平衡：若兒童既有的思考模式和基模足以面對環境的挑戰，那麼兒童便處於一個平衡的狀態；但有時候兒童所接收的訊息與其既有的基模搭不上，導致認知失衡，於是會試圖藉由同化(assimilating)來重建平衡，也就是將新訊息併入其既有的基模之中，是既有知識類推運用的一種歷程；然而，也有可能需要藉由改變既有基模以納入新訊息，也就是調適(accommodating)。這兩種歷程共同作用的結果，賦予個體具有更高的適應性。

青少年期屬 Piaget 所稱的形式運思期，個體在這個階段有思考問題中真實和想像所有可能的原因和結果的能力，可以思考自我，並有強烈的自我意識，出現自我中心主義的特徵，以及自我反省的能力，也相信其他人會如同自己一樣注意到其心中所想的目標，而相信自己是特別、獨一無二的(引自黃德祥主譯,2006)。

(三)、E.H.Erikson 心理社會階段理論

Erikson (1959) 認為社會對個體一生中的不同階段不會期待相同的事情，為了符合不同的需求，自我必須發展不同的能力。他將自我發展的能力分為口腔感覺期、肛門肌肉期、性動力期、潛伏期、青春期與青少年期、成人早期、成人期以及成熟期等八個心理社會發展階段，在每個階段的關鍵期，都有一項發展特定能力的任務和相對應的危機，若個體無法在特定時間內發展出所需的能力，發展仍會繼續下去，但這部份的自我就產生不健康的發展而形成危機。

青少年期屬此理論的第五個階段，主要發展任務為自我認同，角色混淆則為認同發展不順利的危機。在這個時期，青少年對於「真實我」(相信自己是什麼樣的人)與「理想我」(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的感覺有很大的不同，因為當青少年對自己懷疑時，社會也開始對他們要求相關的問題，青少年必須發現他們相信什麼，他們的態度與理想是什麼，伴隨任何角色的意識形態、態度、信仰或價值觀都值得去界定，當知道自己是誰，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就表示知道自己在社會中的角色，且全心全意投入，否則就會產生角色或認同混淆感(引自黃德祥主譯，

2006)。

除了上述理論觀點外，當代學者 Michael Berzonsky 與 Neimeyer (1994) 加入另一新的觀點，認為個體是基於過去、未來、個人與社會關係等特徵來發展自我認同，且自我認同是自我調節(self-regulation)的工具。青少年與社會關係的調節，涉及如何建構脈絡使之適應或改進，以滿足個體的目標。也就是說，青少年可能發現自己嘗試完成一個目標，而不能完全改變社會時，就必須改變自我，找尋達成目標的最佳方法以達到目標，在這樣的情況下，適應是處理達成目標過程失敗或損失的一部分（引自黃德祥主譯，2006）。

綜合以上論點，可以得知自我認同的形成，會隨著一個人在生活環境中所遇見的其他重要對象或團體，如：師長、同儕、社區、社會等，各自對個體的形象進行反映和塑造，甚至進一步賦予某種形象的認可，個體也同時在此過程中，將早期接收與嘗試性的身分，與各方所期待的形象做一比對，隨著他們所覺知的社會適配性經驗決定統合形成自己的內在心理部分，至青少年時期達到一個統合的高峰階段。因此，自我認同是一統合的系統概念和持續的心理歷程，在形成的過程中會陸續受到家庭、學校、同儕以及社會文化脈絡的影響，而呈現多樣性的面貌。

青少年期因具有兒童期所沒有的思辨與統整能力，又正值自我認同塑形的重要階段，當新台灣之子透過與各個社會化機構的互動，形成對自己的看法與期待時，雙族群文化的特殊背景在污名與歧視的社會文化氛圍下，可能影響其對自我認同的發展，而在社會化歷程與經驗中遭遇困難。

二、新台灣之子心理認同的困境

從以上的發展理論可知，自我認同是個體社會化重要的心理歷程，對於新台灣之子因其雙族群文化的特殊背景，可能為他們在初級和次級社會化過程中，帶來相當程度困難的議題，在此提出可能的心理狀態分析。

依前節新移民女性嫁到台灣的背景與現況所提，新移民家庭若為社會的中低階級或經濟弱勢，新移民女性的配偶為維持家計，必須外出工作，所有家務、照顧子女與教育的責任，多是落在新移民女性身上。新台灣之子在家庭中最初社會化的對象理應以母親為主，但這些身為新台灣之子女母親的新移民女性，受到本身語言的限制，再加上家人對她們因經濟文化背景差異、買賣婚姻觀念而生的歧視與偏見狀態下，讓新台灣之子在家庭中的認同發展上即開始出現混亂的情況。

呂錘卿（1987）在其研究中指出，兒童對較能控制目標的父母，或是知覺父母親一方是酬賞者、關愛者，具有較高的認同，也就是兒童容易對擁有「權力」與「身分」的對象產生認同。但被新台灣之子仰賴照護與認同的新移民母親，在台灣家庭中的地位和權力低落，其子女們在家目睹家人對母親的不尊重與不平等，於是產生對母親認同的迷惘（莫藜藜、賴佩玲，2004）。在這樣的情況下，新台灣之子必須轉而認同另一個在家庭中掌握權力或資源的重要他人，但對他們而言，是否該放棄認同被家人歧視的母親？是否該表現出不認同母親，認同父親強勢主流文化的態度？如此一來，便形成認同對象分歧，甚至矛盾的情況。

當新台灣之子逐漸邁向學齡階段，由家庭進入學校另一個社會化場域，他們開始接觸家庭以外的人事物，在學校的系統中，接觸最頻繁的就屬老師和同儕。他們接觸老師的言語和行為，從中建構新的道德標準、價值觀與行為模式，除了老師外，同儕更為青少年時期進行社會參照的主要對象，透過對同儕的觀察、模仿和比較，形成對自己能力與價值的肯定，進而認同並產生團體歸屬感。在這次級社會化過程中，童年時期在家庭中所習得的認知基模會被運用做為參考架構，此時若新台灣之子從老師和同儕處接收到負向的形象回饋，感受到外在環境對自己投以歧視的異樣眼光，則會更加深其是否要選擇對母親進行認同的矛盾感受。

在王聖雯(2006)研究中指出，來自於科任老師對新台灣之子族群身分的刻板印象或輕視的負向經驗，引起他們對自身身分的質疑，便會回歸家庭場域向具外籍身分的母親反應，這樣的負向互動經驗造成跨國婚姻家庭子女心理上的傷害。因此，即使新台灣之子選擇認同父親的主流文化，依然會因為雙族群文化的特殊身分，而無法擺脫社會既定賦予的原罪而獲得完全被接納。

過往研究對於新台灣之子認同行為的發展困境，主要歸因於父母教養方式差異(陳明利, 2004; 劉秀燕, 2002)、婚姻關係失調導致家庭功能不彰(朱玉玲, 2004; 劉秀燕, 2002)、新移民母親適應狀況不佳(劉秀燕, 2002)、家庭社經地位普遍低落(夏曉鵬, 2000; 莫藜藜、賴佩玲, 2004)、語言受限影響同儕關係(莫藜藜、賴佩玲, 2004)等，認為如此文化與經濟不利的因素，帶來新移民家庭的父親對孩子的管教漠不關心，母親則是力不從心，入學後便無法順利學習與適應，經營良好的人際互動關係，形成他們容易出現各種情緒和行為問題，而產生認同行為困難。

事實上，諸多對於新台灣之子認同行為困難的歸因，並不完全屬新移民家庭所特有的現象，即使是一般台灣家庭，父母教養方式的差異、婚姻關係失調，導致家庭功能不彰的情況也屢見不鮮，同樣會帶給孩子在認同行為上產生問題，若要以此歸因實有失公允。再者，新移民母親與新台灣之子因語言受限所帶來學習與適應不佳情形，多半是因為台灣政策仍傾向以學習主流文化語言—國語—為主，在此情境下，新移民母親較無機會對孩子教導母國的語言與文化，使得新台灣之子所擁有的雙重文化優勢無法得以發揮，在這本質上就呈現出一種種族中心主義的氛圍下，新台灣之子必定無法順利地發展認同，而形成心理困難。因此，了解新台灣之子的雙文化認同歷程，才能真正協助新台灣之子、找到培育未來國家人才方向。

第二節、新台灣之子的雙族群與文化認同

個體在一生之中，可能會發展出幾種不同形式的認同：在個人部份有自我認同、性別角色認同；在群體部份有階級認同、政治認同、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及族群認同(ethnic identity)（張春興，1989）。個人自我認同的部分在前節已進行充分的論述，本節將延續個人自我認同議題，進一步擴及社會群體認同的部分，對與新台灣之子雙文化背景有切身關係的族群與文化認同進行討論。

一、族群和文化認同的意義與內涵

族群認同是個人對其所屬族群所產生的歸屬感覺，以及由這個族群身分所產生的想法、知覺、情感與行為。族群認同可視為個人在其所屬族群團體的互動中，透過認同作用，逐漸對族群文化產生深刻的意識與覺醒，進而成為自身的價值觀、人格，與理解事物的基礎（莊家欣，2006）。

文化認同是指個人接受某一特定族群的文化態度與行為，以文化象徵、風俗習慣或儀式等作為認同的基礎，並且不斷將該文化之價值體系與行為規範內化至心靈的過程（吳瓊洳，2009）。

吳瓊洳（2009）指出，文化是區別族群重要因素，文化的取向影響了個人對族群的態度，而族群的結果則相對的決定了文化的價值觀。從個人而言，文化認同影響個人的思考模式及行為，當個人認同所屬的族群文化後，才會產生休戚與共的情感，以身為族群的一份子為榮，進而對這個團體產生愛和信任，並與族群成員緊密結合，為群體奉獻心力，積極參與族群活動；從社會的角度而言，社會成員對族群文化的認同感，除了能提供成員內聚的基礎外，也將彼此融入社會關係的網絡中，藉著這份共存共榮的認知和情感，族群成員得以互相信任與支持，發揮最大的群體力量，以維繫族群在整個社會體系中的地位。

由此可知，族群認同與文化認同往往相結合，透過特定的文化象徵符號來顯示、增強族群認同，藉助文化認同的力量得以完成個體的身分構成，意即文化認

同是形成族群認同的重要核心內涵之一，文化認同程度對族群認同有決定性的影響。文化認同的內涵因學者不同的取向而有不同的歸納，其中有著重在對特定文化歷史與禮俗的認識與了解，亦有強調文化的覺知、投入、行為與態度、文化歸屬等面向（吳瓊茹，2009）。Phinney (1990) 認為文化投入因素是常被用來當作對文化認同程度的重要指標，其中包含了對族群文化認知及參與的表現，提出下列五項指標，可做為從文化認同角度來決定族群認同程度的架構：

(一)、族群知覺：個體為自己所使用的族群認同標記，可為容貌、膚色、血統、宗教、語言等。

(二)、族群歸屬：認為自己是屬於該團體。

(三)、族群態度：對自己所屬的族群團體所持的正負向態度，包括自大、友善、自信和勢利等正向態度，以及對自己的族群不滿意、感覺次等，或有隱藏自己文化認同的欲望等負向態度。

(四)、族群參與：指社會和文化參與，屬於行為層面，包括語言、內團體的友誼、社會組織、宗教活動、文化傳統、政策的意識型態和活動、居住地中內團體成員的比例，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的活動和態度，如：音樂、舞蹈、服裝、食物、休閒活動、慶典等。

(五)、所有行動的互動關係：關心人們說他們是什麼(族群自我認同)，和他們真正在做什麼(族群投入)，或是他們如何感覺(族群自尊)間的關係。

Phinney、Horenczyk、Liebkind 與 Vedder (2001) 更進一步指出，族群認同是一個動態、多面向的建構過程，它包含自我認同感、團體歸屬和承諾感、共享價值感，以及傾向自己所屬的族群團體。一個處於大社會脈絡中的次要民族，會宣稱她有共同的祖先、共享的文化、宗教、語言、親屬關係和發源地，而這也是個體從兒童期經過探索期到達青少年期發展的主要任務，是一個前進的概念。低社會地位和權力的青少年，會特別參與學習與他們種族地位相關的事，主要在宣稱他們團體的價值和合法地位，擁有處理對他們團體感到威脅、不安全、困惑或憤怒的心理能力。

因此，文化認同對一個族群而言，具備個人及社會的功能與重要性。個體自我認同是藉由別人的感知而來的，回應社會心理和脈絡的因素，個人所具有該團體的特徵(行為、信念、價值、規範)，與他人的反映是一起的。低自我概念與不正確的標籤有關，Hogg、Abrams 與 Patel (1987) 以及Ullah (1985) 認為，如果在社會中的主流團體持著對族群團體特質的低尊重，然後族群團體的成員們就會潛在地面臨一種負面的社會認同，認同低地位的團體也許會導致低的自我認定選擇 (引自Phinney, 1990)。

由此可知，在跨國婚姻的脈絡下，新台灣之子對於文化認同程度的高低，將會影響其自尊、自我概念、自我認同的心理和人格發展，也與他們對台灣這片土地的認同程度與國家社會的發展息息相關。就目前國內關於新台灣之子族群和文化認同議題的研究看來，主要是以少數民族(原住民)對應主流族群(漢人)的「我族」和「他族」定義出發，改編原住民族群認同問卷進行調查(莊家欣，2006；黃瓊瑤，2007；龔元鳳，2007)，或結合國外文化認同量表以發展自編問卷(吳瓊洳，2009)，但新台灣之子的雙文化身分似乎無法單純以此標準定義之。

Phinney (1990) 指出，單一族群標記對那些父母是來自於二個或多個團體的人而言是會產生問題的，他們可能會稱自己是混合的，一半一半，或是忽略自己原有的種族傳統，而稱自己為主流族群。對於新台灣之子而言，由於他們置身在兩種不同的族群和文化中，因此他們的身分認同問題就顯得較為複雜與兩難。新台灣之子在台灣社會中，最初接觸到的是父親這一方的主流文化，當他們發現母親的特殊性時，可能會對母親的母國文化產生興趣，但經驗家庭內、學校甚至是大社會環境對母親的歧視，會促使自己轉而認同強大的主流文化，但認同了主流文化，似乎也無助於融入主流社會。因此，研究者認為應視為另一種文化認同的議題為：「在以接受台灣主流文化為主的新台灣之子，被視為是外來、異族，無法在家庭內及社會上獲得尊重與認可的母親母國文化，對他們帶來何種影響？身為該母親的孩子，要如何面對與調適二種文化無法融合的矛盾與衝突？」，這正是

本研究所欲探究的心理層面議題。

二、族群和文化認同之相關理論

當面臨不同文化的交相推拉作用下，弱勢族群對本族文化與優勢文化之間究竟應如何取捨？個體是否必須在兩個衝突的認同中做出抉擇，或是能夠建立對雙文化的族群認同？使得跨文化適應成為需關注的焦點。Phinney (1990) 對「青少年和成人族群認同」議題做相關研究之整理分析後，闡述種族與社會認同(Ethnic Identity and Social Identity Theory)、文化改觀(Acculturation as a Framework for Studying Ethnic Identity)與認同形成(Ethnic Identity Formation)等三種主要的族群認同理論，以下茲就三種理論分別說明之：

(一)、種族與社會認同理論

此理論最早由Lewin於1948年提出，他聲稱個體需要團體的認同感，以維持好的幸福感，這個理念後來由Tajfel和Turner 於1979年發展成社會認同理論，主張為身為一個團體中的成員，將會給予個人的歸屬感以形成正向的自我概念。假如主流團體對一個族群團體的某項特性抱持貶抑的態度，那麼此族群的團體成員可能就會面臨負向社會認同的潛在危機。

綜合Lewin (1948) 和Tajfel (1979) 的論述，Phinney (1990) 認為社會認同論者所關注的議題為：個體在自己和主流團體間，由於態度、價值和行為間的衝突，會為認同的形成帶來問題，造成個體必須在二個衝突的認同間選擇，或是建立一個雙文化族群認同來適應。但是，如果主流文化對於少數族群抱持負面的觀感，則雙文化認同可能造成問題。

Tajfel (1979) 指出低地位團體的成員會以多樣的方式促進其地位的提升，其一是若族群間的界限不明顯，則個體會以放棄或隱藏自己族群身分背景的方式，尋求被同化來「通過」成為主流團體的成員而離開原有的團體，但此種解決之道也許會帶來負面的心理結果，且當個體仍讓主流團體區分出不同，又無法獲得與

自己種族的區別，被歸類為某一族群團體成員時，將會產生族群認同危機。其二就是發展團體內的自尊，重新解釋被認定的「低下」的特質，透過藉由強調自己所屬團體特色的方式，他們就不會再顯得低下，而與主流團體產生區別（引自Phinney, 1990）。

(二)、文化改觀理論

Berry (1986) 從涵化論(acculturation theory)的角度探究少數族群之認同，認為族群認同要放在異質的社會，多個族群團體長時間共同生活的環境下才有意義，其概念是從兩個不同文化接觸間，在文化態度、價值和行為的改變，重點在弱勢族群或移民者的次團體，如何與主流社會產生關係。他提出三種不同的模式，藉以說明當兩種不同的文化相互接觸時，其族群在文化態度、價值觀念和行為上的改變情形（引自Phinney, 1990）：

1、兩極化的線型模式

係指文化認同的概念在一條連續的直線上，一端視為對本族文化強烈的文化維繫，另一端則是強烈的依附於主流優勢文化中。如果個體趨於認同主流優勢文化，那麼就不可能對本族文化擁有強烈的認同。

2、雙面向模式

一個族群遺產文化的保留與主流社會的涵化，這二個概念區分是獨立的，可以從回答二個問題面向是或否的答案，其一為保留某遺產文化被認為有其價值的嗎？其二為與更大的社會發展關係被認為是有其價值的嗎？區分出融合、同化、分離和拒絕等四個做為移民者在處理文化適應策略的方式。以下以表2-1說明由兩種面向產生的四種可能認同形式：

表2-1 文化認同程度的四種形式

	保留某遺產文化被是認為有其價值的	保留某遺產文化被是認為沒有其價值的
與更大的社會發展關係被認為是有其價值的	融合(Integration or bicultural)： 高認同我族文化及高認同主流文化之認同類型	同化(Assimilation，過往的絕對性概念)： 低認同我族文化及高認同主流文化之認同類型
與更大的社會發展關係被認為是沒有其價值的	分離(Separation)： 高認同我族文化及低認同主流文化之認同類型	拒絕(Marginalization，過往的絕對性概念)： 低認同我族文化及低認同主流文化之認同類型

資料來源：出自Phinney (1990)，由研究者自行整理。

3、多元模式

此理論認為個體是否接受主流強勢文化或保留傳統的文化特性，會因其中屬性而變化，如性別或年代差異而有所不同。生活情境中，不同的文化相遇，導致的結果可能是一種新的文化變體，但目前這樣的論述尚未被清楚地闡釋與說明。

(三)、認同形成理論

不論是社會認同理論或是文化改觀理論，皆認為族群認同是一段時間和情境下持續改變的歷程，但二者皆未關注有關個體層面對於族群認同持續改變的歷程。社會認同理論雖在研究上尚無測量族群認同在發展上的改變，但可從Erikson於1968年提出的自我認同形成理論獲得架構。他認為認同是在青少年階段，一段探索和試驗所達成的結果，且形成在職業、宗教和政治方向的選擇和承諾。

Cross (1978) 就非裔美國人對其族群認同發展所經過的重大轉變經驗，將認同態度由最不穩定到穩定，歸納出五個發展階段：1、相遇前期—少數族群學生偏愛主流文化，排斥、貶低自身黑人身分；2、相遇期—個體在社會中遭遇種族主義、歧視與偏見，開始重新評價自身族群，進而尋求黑人身分認同；3、再現期—拒絕所有非黑人的價值觀，開始沉浸於自身族群文化中，對黑人身分感覺強

烈，但內化程度低；4、內在化期—對自我族群產生心靈與內在的安全感，內化族群的價值觀與生活模式，全心投入族群活動，族群認同形成，認同黑人身分；5、內化承諾期—族群認同形成與穩固，反白人的情緒降低，從言詞上的辯論轉向投入社區改革運動。

Kim (1981) 以亞裔美人為研究對象，將族群認同發展分為四個階段，依序為：1、白人認同階段—少數族群認同白人主流文化，不重視本族文化；2、社會、政治的覺醒—開始關注本身族群議題；3、意識自身族群—不再全部認同白人文化，開始看重自身文化；4、團結、結合—將自身族群文化結合、內化，形成本身族群認同。

Phinney (1989) 依據Marcia於1980年對於大學生的研究，再加上檢視許多關於認同形成的文獻後，提出三階段的前進過程模式，分別為：1、未覺察、未檢視族群認同期—在第一階段時，青少年和成人早期都尚未顯露、未開始探索族群認同議題，他們對此議題不感興趣，也不會有太多的想法，處於鬆散的階段。但此階段可能會出現二種情況：(1)、迷失期—對族群議題缺少興趣與關心；(2)、早閉期—個人雖未顯露、未開始探索族群認同，但會從父母親或其他成人處獲得對族群的正、負向態度，由於非出於主動探求，因此不見得會在主流團體中表現出來。2、探索族群認同(未定型)期—第二階段個體開始探索個人的種族特色，可能會由所發生的特殊經驗而有個人族群的覺知。個人會強烈地投入自己團體的文化活動，如，閱讀、和他人交談、參觀種族博物館、嘗試不同的生活方式、參與文化政治事務的活動、變得較有政治觀感等。對某些人而言，也有可能會拒絕主流文化的價值。3、達到認同期—第三階段個體了解、欣賞自身族群的特性，接受自身種族地位和內化所屬的價值體系，為「自己的團體和主流團體間的文化差異」和「在社會中低下和被貶抑的狀態」二個問題提出解答，發展出穩固的族群認同，甚至可以做到不一定要有高程度的參與，或沒有維持自己族群的語言或文化風俗，個人也可以非常清楚對於自我族群的自信境界(引自Phinney, 1990)。

由上各家理論可知，對屬於少數族群的移居者而言，在移入新環境的初期，為了在短時間內成為被主流社會認同的一員，他們會傾向先放棄己族的社會文化，納入主流社會的價值體系、態度或行為標準。但在這全然放棄舊文化以接收新文化的過程中，個體會因為經驗到主流大社會對自己異族身分的異樣眼光，發現自己並無法因此完全融入其中，而感受到強烈心理威脅，繼而回頭尋求部分對己族的穩固認同，以與強大主流體系做抗衡。也就是個體在面對二個不同族群文化時，會透過Piaget所稱的同化和調適歷程，來達到穩定的文化適應狀態，也與當代自我認同理論中的自我調節觀點有異曲同工之處。因此，Berry (2001) 認為文化涵化或適應是一互相的過程，是二個或多個團體經驗相互接觸，形成二者部分文化的改變結果。在文化成員們的接觸中，個體會經驗不同的心理變化，形成心理的涵化(psychological acculturation)，尤其對於非主流團體影響最為顯著，關注的基本面向是態度、行為和內在文化認同，對移民者而言，主要的問題在如何處理這二者相異的文化碰撞。

多數新台灣之子自幼即處在母親的母國文化被父親主流文化社會所隱形、壓抑，甚至歧視的雙文化的家庭中，他們所面臨的處境與單一族群移民者不同，如果站在母親這一邊，怕被歸類為低成就、弱勢或卑微的族群；如果站在父親或台灣社會這一邊，就成了歧視自己母親的人。因此，當他們面臨這二種文化的交相推拉作用下，剛開始為了期待能夠被強大的主流社會所接納，其文化認同型態可能會出現直接認同父親的主流文化，而捨棄母親的母國文化，在兩個衝突的認同中做出全然認同主流文化的抉擇，否認所知覺到的族群線索，甚或與母親關係形成疏離或衝突的狀態。然而，當他們年紀漸長，發現自己如此行動的結果，與主流成員的差異仍明顯存在時，經驗到內心的掙扎後，也有可能促使他們回頭去欣賞母親和自己的不一樣，將原先捨棄的母親母國文化納入，進而建立對雙文化的族群認同，找到自己在社會中的獨特位置。

三、新台灣之子族群和文化認同之相關研究

目前多數關於族群和文化認同的研究，主要以Berry和Phinney所提出的模式為理論依據。在對理論有所認識後，以下針對國內外的相關研究進行整理，並探討與文化認同具關連性的面向。

(一)、雙文化認同狀態

莊家欣(2006)和龔元鳳(2007)的研究指出，就讀於國民小學階段的新移民子女，他們對於父母雙方族群的認同程度皆屬於中等以上程度，也都能接受與承認其來自於母族的身分。不過，這些新移民子女對屬於漢人主流文化的父族認同顯然高於對母親原生國文化的認同。再者，這些新移民子女對父母雙方之族群認同愈高，則其自我概念愈佳。

吳瓊涵(2009)的研究指出，就讀國民中學階段的新移民子女對母親原生國文化在情感上多表認同；對母親原生國文化感興趣，唯在實際活動的投入方面較少；對母親原生國文化以及台灣兩種文化的統合情形十分良好；對母親原生國文化認同與文化統合間，具有高度正相關。

(二)、性別

關於性別面向，在國內研究方面，莊家欣(2006)和龔元鳳(2007)分別抽樣台南縣市，國小三至六年級新台灣之子所做的問卷調查顯示，族群認同會因為性別而有所差異，且女生高於男生。他們對於父母雙方族群的認同程度皆屬於中等以上程度，也都能接受與承認其來自於母族的身分。不過，這些新台灣之子對屬於漢人主流文化的父族認同，顯然高於對母親原生國文化的認同。這些新台灣之子對父母雙方之族群認同愈高，則其自我概念愈佳。

在國外研究方面，Singh Ghuman(1997)針對在英國的亞洲青少年所做的雙文化認同態度研究結果顯示，由於女性較接受在英國社會中的規範或性別平等實踐，因此，女孩對於文化涵化較有利，且較傾向同化於主流文化。但在族群界限較清楚的族群團體內，女性被視為是維持族群傳統的角色，傾向持續保留傳統家

庭價值觀，而在雙文化認同態度上呈現分離的狀態 (Phinney, 1990；Singh Ghuman, 1997)。在Abu-Rayya (2006) 的研究中也指出性別與族群認同和心理健
康因素互動間有正相關，但在Eyou、Adair 與 Dixon (2000)，以及Martinez 與
Dukes (1997) 的研究中，性別變項則呈現不顯著的結果。

(三)、年齡(級)

關於年齡(級)面向，在國內研究方面，車達 (2004) 的研究指出，學童隨年
齡增長逐漸意識母親的異國特質，年級越高的兒童，對自己的家庭和週遭同學的
家庭會加以比較，進而對自己的身分產生疑惑，也感受到同儕對母親的好奇而不
自在，甚至不願承認母親的特殊性。龔元鳳 (2007) 的研究也指出族群認同會因
年齡而有所差異，但在莊家欣 (2006) 的研究中則呈現不顯著的現象。

國外研究方面，在Phinney於1989年所提出的族群認同三階段前進模式中，
認為族群認同是一移動的過程，過程中自我概念、意義和自信將增加。他雖指出
許多青少年在這期間尚未探索種族地位，但若在這之前內化負向社會刻板印象，
將導致低自尊、低自信，難以找到生命的意義。因此，他認為有進行種族地位探
索的青少年，其生活和族群意義來得較好，且隨著年齡增大，會增加對族群認同
的預測 (引自Phinney, 1990)。Quintana (2007) 也提出青少年發展族群團體意識
過程中，會有「擷取觀點」的能力。但在Abu-Rayya (2006)，以及Eyou、Adair 與
Dixon (2000) 的研究中則呈現不顯著的現象。

(四)、外表特徵

關於外表特徵面向，國內趙佳慧 (2006) 針對新台灣之子青少年外表形象、
自我概念及族群認同的研究指出，外表特徵會影響其揭露族群身分的經驗與方式，
具有明顯族群外表者，較無彈性選擇族群身分界定與揭露方式。特別是對女性而
言，明顯的族群外表特徵容易降低她們對外表的自信。由此可知，他人對於擁有
明顯族群外表特徵的新台灣之子的評價，會顯著地對其自我概念產生雙重影響。

在國外研究中，Berry (2001) 和Singh Ghuman (1997) 也指出因生理特徵所帶來的歧視和偏見，會影響文化適應和自我認同混淆。

(五)、場域

關於場域面向，新台灣之子所處家庭的社經地位，與其在家庭中與母親的互動關係中，從母親身上的學習到對母親的認同，會影響他們對自己的認同(李維純，2007)。在家庭以外，國內王聖雯(2006)和龔元鳳(2007)的研究指出，學校場域中的班級是族群、文化議題最突顯的情境，班級內的關係網絡對族群身分的反應，會影響新台灣之子對族群身分的認同。

除此之外，移民者也會傾向選擇自己熟悉的成長環境進行認同。國外學者Phinney、Horenczyk、Liebkind 與 Vedder (2001) 指出，學校適應被認為是移民家庭中，兒童和青少年從家庭到學校，初始發展社會文化任務的重要議題。學校適應對族群與國家認同二者都重要，但與國家認同的關係強於族群，透過學校教育進行同化，比其他機構或社會脈絡來得多。對於在主流社會中出生及接受教育的移民者，也有較高的文化適應態度 (Singh Ghuman, 1997)。

(六)、政策

Phinney、Horenczyk、Liebkind 與 Vedder (2001) 認為，移民認同的選擇與該國家的政策互動有關，國家政策支持多元文化，移民者就能形成雙文化和好的心理狀態。融合是最好的文化調適模式，對移民者最有助益的福祉，是族群保留和進入新社會的調適同時發生，以達到雙文化認同，而排斥是最差的。研究發現雙文化和融合所帶來的心理健康高於其他指標，種族認同對弱勢和移民團體成員有其重要性，施壓去同化和要他們放棄族群認同，會引來生氣、憂鬱和暴力。除此之外，還需考量國家內部的差異性，亦即政府關心種族認同是否大於移民者的需要獲得、殖民的影響，以及二種文化和價值的差異。

根據上述相關研究發現，在不同的背景變項中，性別、年齡二變項對於新台

灣之子族群認同的影響，各研究針對不同的樣本呈現不同的結果，而在外表特徵、場域與國家政策三個變項方面，則與族群認同呈現顯著正相關。除此之外，家庭社經地位、母親原生國籍、主要照顧者、主要照顧者所使用的語言等變項，對新台灣之子的族群認同，均有一定程度的影響(莊家欣，2006；龔元鳳，2007)。

Phinney、Horenczyk、Liebkind 與 Vedder (2001) 指出，特定族群的分散或聚集、家庭或同儕個人化的關係、學校或鄰里居住地的活動設置，甚至是宗教信仰，也會影響移民者的族群認同。因此，在對新台灣之子進行雙文化認同探究時，若能以情境脈絡的系統觀點切入，方有助於全面性地了解現象的真實性。

由上述的理論和相關研究整理可發現，文化認同與族群認同通常被合併論述，同時因二者是互為主體，在定義的界定上也無法將其獨立分開看待，因此在文獻探討的內容上，會將族群認同的概念一起放入。但由於本研究關心「新台灣之子在母親母國及父親台灣社會主流文化間，如何知覺和學習二種文化的行為方式、觀念態度、價值標準，會經驗什麼樣的心理衝突，認同狀態如何，以及帶來何種行為反應和調適」之雙文化認同心理歷程，而國外學者Hill (2004) 在關於文化與自我認同二者間相關關係的研究中也指出，文化認同能預測積極正向的心理表現，包括學業成就及自我概念(引自吳瓊淑，2009)。因此，本研究所採取的立場係從文化認同的面向，來探討新台灣之子在面對父母親雙方二種不同文化時，差異整合過程的心理歷程，以及這樣的歷程對他們所帶來的認同影響為何。

第三節、族群與文化認同的社會心理機制

歸結現有相關文獻，我們可以發現主流文化主體容易對於外來的移民者，或者是原先存在的少數族群，抱持著主優客劣的觀點來看待不同文化間的差異，如此的主觀價值形塑一種污名，也充分影響移民者或少數族群的自我價值與認同感。而移民者或少數族群在面對主流文化的不友善對待時，會有其賴以生存的相對因應之道。本節接下來將以 Goffman (1963) 污名的觀點，來探究社會刻板印象對污名的看法，以及被污名者回應大環境時可能採行的策略。

一、社會刻板印象與污名

所謂刻板印象是指對一個團體成員的概論，將相同的特徵援用在團體每一個成員身上，無視他們之間的實際差異，是我們簡化世界的一種方式（李茂興、余伯泉譯，1995）。社會刻板印象的形成，存在於我們社會認知過程中，對一些人或社會現象形成的一種籠統而固定的看法，是產生在社會認知的一種心理現象，不只是對他人，更甚至於對整個群體的心理特徵採行一種固定不變、概括籠統的評價現象。社會刻板印象形成後，會影響對他人的看法有僵化性的認知，也會妨礙人們在社會互動中，進行錯誤的屬性歸類，影響一連串的人際互動與認知。而這樣的認知，會進一步衍生成對這一群人具敵對或負向態度的偏見，以及不公平或傷害性的歧視行動。

Goffman (1963) 指出，在社會刻板印象的影響下，受其社會文化影響，對污名的看法是建構在所謂壞的、危險的、意志薄弱的、缺點的、障礙的、不恥的，幾乎都是以具有深刻恥辱的屬性來看待，當個人無法符合社會所謂的「正常」情境，或是偏離「社會期許」，將加諸於個人一種負面評價，並且建構了一個污名理論(stigma-theory)，一個意識型態，去說明被歸類為污名者，都是具有粗略的特質和有危險性的，更在日常社會交談中，利用隱喻或表徵來貶低這群被污名者，降低其生存的空間，認為那是一種惹人厭的屬性。在提到污名時，他提到其中一

種為人種、民族及宗教上的「部族污名」，並認為此種污名可能隨世代而被延續傳承。

基於東南亞國家在全球體系的邊陲位置，加上台灣媒體與官方論述經常採用「社會問題」的建構方式，把他們視為降低人口素質的元凶，呈現台灣優於東南亞國家的族群階級化思考，在台灣存有負面刻板印象的東南亞新移民婚姻和家庭，其成員可能承載負面的期待，進而做出符合期待的舉動，且透過具體的人際關係一再地被複製和強調。



二、被污名者面對社會處境的因應策略

依照 Goffman 的看法，被污名化的個體能夠繼續與他人互動，通常他們的心理特徵就是「接受」(acceptance)。當污名個體學習必需去接受他人眼中的自己時，會感到矛盾，自己也不再是原先的那個正常人，具有一些連自己也無法適應的特質，個體依附在其污名範疇模糊不清，可能發生擺盪的情形。於是，身處在這樣的社會脈絡下，為求生存及適應所在的社會處境，Goffman (1963) 認為個體往往會運用各種方式來隱藏自身的污名，小心地不讓自己處在不利的處境下，如：

- (一)、隱瞞(conceal)：Goffman 認為隱瞞經常代表對污名的默認，也就是內化污名的感受，這是最簡單的方法，只要將其缺點隱藏即可。
- (二)、遮掩(cover)：把缺點用其他方式掩飾，不讓人發現其缺點。
- (三)、讓渡(pass)：把呈現失敗或缺點的污名訊息讓渡於另一訊息，那另一訊息在意義上是較少或較低的污名感受。另外，保持各種距離也是 pass 的一種策略，如：減低及避免與他人發展親密關係、保持身體的距離、切斷與過去的連結等。
- (四)、區分成兩種生活模式(double life)：這是屬於較危險的策略，把生活區分為無所謂的大團體，以及自己依賴的小團體。
- (五)、揭露(discolse)：個體願意顯現他自己，將本身的污名公開，一旦如此，有可能從控制訊息者轉變成適應困難情境者，但卻可能因開放自己而降低被發現的焦慮感。
- (六)、掩蓋的(covering)：是策略中最為公開的一種，他們準備好承認自身所擁有的污名，但還是要盡很大的努力去讓污名不被看見。他們的目的是減少緊張，意即使自己與他人輕鬆地從污名的關注中退出，並維持互動的正常進行。

Goffman 認為被污名者除了運用讓渡(pass)來做為社會化過程的階段，以及改變本身道德生涯的方法外，他們也可能進一步超越。被污名者能接納並尊重自我，他們將感覺不再需要隱藏本身的缺陷。當被污名者不確定我們將如何指認他，並且接受他，而我們同樣也不確定如何對待他，在這不確定的過程下，被污名者

可能會在退縮、隱瞞、過分的虛張聲勢中擺盪，二者會在社會互動中互相猜測雙方的想法，新台灣之子所具有的雙國文化身分，本是開啟多元視野的利基，卻因其母親來自於東南亞國家，而必須承受社會刻板印象所帶來的污名，為終止這樣的循環，必須要打破一般社會刻板印象行為的對待。



第四節、新台灣之子在多元文化下的新面貌

一、多元文化的意義與內涵

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除了台灣的原住民之外，其他的族群均屬於外來移民。在這樣的脈絡下，隨各族群移入所帶來的文化多元與文化多樣性，成為一必然發展的趨勢。由於眾多族群需要在同一個國家、社會內一起生存，而單一性質的族群與文化認同已不適用，因此有了「多元文化」這個詞彙和概念。「多元文化」的理念在於肯認文化差異與強調社會機會均等，文化方面肯認弱勢群體的文化差異，使人們認識、了解、接納與欣賞不同群體的文化差異，在權利與資源分配上，每個人都有均等的機會（黃尚文，2006）。

Berry (2001) 認為多元文化意識型態的先決條件是，對多元文化的社會價值有廣泛的接受程度，低程度的歧視和偏見，對非主流族群持有正向的態度，個人和團體對大社會有安全依附和認同。因此，Phinney、Horenczyk、Liebkind 與 Vedder (2001) 認為，雙文化或融合的認同是一個等質的概念，指一個人同時具有種族團體與大社會的一部分。但台灣一直以來對於外來移民，傾向採取以學習主流文化為首的同化政策，塑造新移民為勤於學習台灣文化的外國人，對新移民存有弱勢、不識字的刻板印象，讓新移民女性處於性別、族群、和社會階級的邊緣位置，漠視其中所存在的階級矮化問題(陳美芝，2011)。在這樣的環境下，對具有雙文化背景的新台灣之子而言，其建構文化豐富性的助力反成為阻力，而形成我們長久以來所認為的適應困難與行為問題現象。

二、多元文化對新台灣之子雙文化認同的重要性

由前述關於多元文化的內涵可知，多元文化觀點對具有雙文化背景的新台灣之子來說，是建構其文化豐富的助力，更可以讓他們在雙文化認同的發展過程中，擁有良好的心理適應，進而增進對國家的認同。Ward (2006) 也認為將二種文化納入的雙族群，其心理狀態的形成是值得關注的。

在尊重多元文化的前提下，關於文化融合對移民者所帶來的正向作用，於諸多實徵研究中皆可印證。在Eyou、Adair 與 Dixon (2000) 針對移民至紐西蘭的青少年，進行雙文化認同與心理適應的研究結果指出，屬於融合類型的青少年，較分離和邊緣類型的青少年，在負面自我形象變項中，呈現高度負相關，意即融合類型的青少年有較正面的自我形象，以及較佳的心理適應；而同化類型的青少年雖在自尊上呈現樂觀、外向、自信的情況，但卻有身心症狀的心理適應問題。

Abu-Rayya (2006) 針對住在以色列的阿拉伯—歐洲青少年，所做的雙文化認同研究結果呈現，融合和同化為主流文化者，與滿意的幸福感(自尊、與他人有正向關係)有高相關連結，而與不滿意的幸福感(憂鬱、焦慮)有低相關連結。同化為非主流文化者，雖也有高自尊和低憂鬱程度，但卻有高焦慮和低程度的與他人發展正向關係。而疏離者則傾向有持續性的低心理健康。

Phinney、Horenczyk、Liebkind 與Vedder (2001) 在研究中指出，在美國加州融合政策的做法是，透過提供雙語教育、家務和經濟支持等特定策略進行；在荷蘭則是採用補助移民兒童教育基金、提供經濟和醫療支持、母語課程、教會學校等特定策略進行。流利的雙語，可以促進移民者在學校有較好的表現，傾向施壓快速同化移民者被認為會產生問題。

由此可知，當接受移民的國家能夠肯認移民者的外來文化，尊重雙方的文化差異，讓移民者能夠在學習和適應主流文化的同時，仍可保留自身的傳統文化，形成一種融合的狀態時，個體方能發展良好的文化認同與心理適應。但若接受移民的國家雖在政策上採融合理念，但實務上卻執行同化，其結果容易在移民者間注入一種永久無意願的邊緣化 (Phinney、Horenczyk、Liebkind & Vedder, 2001)。

如同上述研究結果顯示，同化類型的青少年雖在自尊上呈現最高的情況，但卻有身心症狀的心理適應問題。

新台灣之子來自於二個不同族群的結合，在他們身上自然有著兩種文化的傳承，雖不同於上述研究所稱的移民者，但所面臨的核心議題卻有其相似性。由於他們的母親是移民者，且主流社會對這些新移民母親有著貶抑的評價，在強大的主流論述下，使得他們必須讓自己認同主流文化，好成為主流族群中的一員，這其實是一種強迫同化的過程，因而讓這些新台灣之子出現如前述許多研究結果所呈現的適應問題。因為台灣主流社會的本位主義過重，無法真正欣賞和肯認新移民母親所帶來的文化，新台灣之子在無法獲得社會對多元文化學習支持的情況下，也就無法發揮因不同族群結合所擁有的優勢。

每一個體需要一種穩固的群體認同，藉以維繫一種身心的幸福感與歸屬感，倘若個體自我認同與所屬的族群文化之間產生關聯，個體將朝向正向、積極自我概念的建立。相對的，如果社會主流文化對待某一族群之文化是抱持不尊重的態度，那麼這個族群的成員便存在著負面認同的危機。當台灣社會不能善意對待新移民女性，或對其原生國文化採取歧視的態度時，對處於青春期的新台灣之子而言，不僅將會影響其對母親文化認同的程度，他們台灣社會主流文化的態度也可能因而受到影響。新台灣之子雙文化身分是一種優勢，它具有學習多種語言、擁有不同文化生活習慣等彈性選擇的能力，而此種利基唯有在主流社會尊重差異的前提下方能被看見，也或許可成為台灣社會未來發展的新契機。

第三章 研究方法：進入敘說的世界

本章旨在闡述研究所採取之方法學內涵與研究流程，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研究方法學的選擇；第二節為研究資料蒐集，包括研究工具的形成與使用；第三節為如何進行資料整理與分析；第四節為研究倫理，以下分別予以敘述。

第一節、研究方法學

從前一章文獻回顧內容得知，文化認同是一動態變化的過程，重要他人、重要事件、社經背景、生理特徵、個人與社會環境因素，均會影響其認同過程中的心理反應。本研究的主體為新台灣之子，他們在雙文化認同形成過程中的心理反應，與外在社會環境有著高度的連動關係，二者的互動構成一經驗整體。本研究探究新台灣之子在尋求雙文化認同過程中，如何看待自己？如何定位自己？如何透過理解他人、環境和自己的需求，以形成一有意義的整體？以及這樣的經驗帶給自己的影響為何？因此，在眾多質性研究方法學中，選擇以「敘說探究」作為研究方法。

Polkinghorne 認為，「敘說研究」(narrative research)是使用故事來描述人類經驗和行動的探究方式，人們透過正確描述那些詮釋性的故事，為其生命經驗賦予意義。在敘說研究的過程中，參與者和研究者都是敘事者，而敘事者本身就是一個故事，透過敘說、傾聽、書寫及閱讀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故事，可以更瞭解根植於敘事者個人所處的文化、語言、性別、信念和生活歷史的脈絡(吳芝儀,2003)。當我們敘說故事時，透過個人描述其在過去和現在的時間和空間所發生的事件，我們將會和他人及自身的歷史相連結，並對於我們未來的生活方式提出藍圖。

在敘說研究中，個人被看成是活過的故事之具體化身，其生活一方面形塑了社會、文化的敘事；另一方面，也被社會、文化的敘事所塑造。教育學者杜威提到：「人的經驗是連續性的，由過去而生，發生於現在並形塑未來」。這說明了經

驗同時是個人的，也是社會的，個人與社會的層面是同時存在，人不能只被當成個體看待，也必須以個體的方式被瞭解，因為人總是存在於關係，存在於社會情境當中（引自蔡敏玲、余曉雯譯，2003）。吳芝義（2003）指出：「敘說者藉由述說故事，整理與組織自己過往的經驗，由於聽到自己的故事，讓他們有機會去深思『為什麼？為什麼會如此發生？為什麼會如此反應？為什麼會如此影響著自己？』」這樣的論述觀點充分顯示經驗應以敘說的方式被研究，且透過故事的敘說會對自己的生命經驗重新活過，並帶來新的力量，及改變的可能性。

所以，綜合來說，敘說探究所處理的是個人、社會和時間的議題，是反映、重新活過、重新建構、重新詮釋我們的生活經驗，讓研究者和敘說者在聽故事和說故事互動當中找到自己，在敘事過程中產生根本改變。新台灣之子生活在對於東南亞新移民母親有著歧視眼光的環境下，雙文化的身分較單一族群移民者顯得特殊，個體與環境交織而成的生命故事，可視為尋求自我與父母二方文化認同的真實生活經驗描繪。

第二節、研究資料蒐集

一、研究參與人員

(一)、研究者

1、 研究者的背景與專業訓練

研究者在修讀諮商專業前，於醫療體系與社福機構從事多年的社會工作，所服務的對象均為社會中低階層的個案與家庭。近三年致力於婦女與兒少社區工作，有機會服務新移民女性和新台灣之子，從與他們的接觸經驗中，了解新移民家庭因婚姻組成的特殊性，讓新台灣之子背負著許多負面的評價，並一味以弱勢族群的身分認定投注資源，但卻少有人關心二種文化的衝撞帶給他們的生命經驗和影響為何。身為一位想持續投入社區工作的諮商人員而言，個體在情境中的議題是重要的關注面向，了解新台灣之子的生命經驗，將有助於開啟研究者對多元文化認識的視框，並可在互為主體中協助他們發展屬於自己獨特的生命。

研究者在諮商專業領域的求學期間，已修習過諮商與心理治療相關基本課程，對於諮商理論與技術均有一定程度的認識，並在諮商實習與社區實務工作中有實際接案的諮商經驗，研究期間也正好參與吳熙瑀老師的敘事治療初、進階專業訓練課程。除諮商專業課程外，在研究方法學上曾修習過質性研究法，且於實務工作和人類性學所論文寫作上，均使用過以敘說的方式帶領團體，以及文本、論文之撰寫，結合諮商談話的基本訓練，對於以敘說做為研究方法進入訪談，可以有足夠之能力。

2、 研究者的立場和位置

研究者近幾年雖致力於社區工作，但僅是從短期的團諮或個諮互動中，形成對新台灣之子生命經驗如第一章所述的片段理解。新台灣之子的雙文化認同是其個體在所處的社會脈絡下所共構形成的，由於他們在成長過程中，很少向外人提及雙族群身分對自己的意義與影響，因此透過讓他們敘說在其生活脈絡下，如何主觀經驗與詮釋的過程，不僅可以做為研究者更全面理解和貼近他們的工作起點，

同時透過他們與研究者二種截然不同生命故事的碰撞，更可讓研究者重新與自己原來對他們的觀點做對話，滋養出更多的故事。

(二)、研究參與者

1、 研究參與者的選定指標

本研究所關心的面向是處於青少年時期的新台灣之子，身處父母親二種不同國籍身分、文化背景的差異脈絡下，如何經驗和詮釋在成長過程中的生命與心理衝突歷程。基於此前提與質性研究著重個體現象呈現的內涵，故本研究採立意取樣，所邀請新台灣之子的背景條件為目前正就讀國中或高中，且有機會從與東南亞籍母親的互動中認識母親母國文化，有意願分享自己接觸父親與母親二國文化經驗者三位，進行生命故事敘說。

2、 研究參與者的選定過程

在碩一研究發想階段，研究者曾經造訪新竹市外籍配偶家庭(現改稱為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了解該中心對於新台灣之子的服務與年齡層分布情形，得知該中心主要以家庭結構不穩定的新移民家庭為服務對象，新移民女性配偶多屬剛到台灣不久，故新台灣之子多於小學階段，且並無全面性的資料管理；後再造訪二處位於新竹市郊區，主要服務弱勢、新移民家庭的協會，了解其所服務的新台灣之子也全屬於小學階段，感覺要找到適合的研究對象似乎有其困難性。

研究計畫口試通過後，研究者首先與永和南洋姐妹會進行聯繫，持簡版研究計畫書向該會提出研究申請，但該會期待任何想進入會內的研究者，能以融入組織的方式進行，待時機成熟後再展開研究，研究者也釋出極大的誠意表達可撥出時間參與該會活動，以及提供相關專業服務，但仍獲得會內青少年子女數不多的拒絕回覆。

正在擔心找不到研究參與者之際，同年暑假研究者受新竹市一服務新移民家庭的協會之邀，到社區帶領多元文化兒童暑期團體，正巧協會安排內政部移民署的人員來做宣導活動，透過專員的引薦，得知隨行的一位志工媽媽正好是馬來西

亞的新移民配偶，研究者向她說明研究計畫後，她表示她的大兒子目前正好在國中青少年階段，之前有不少因媽媽是新移民身分而發生衝撞的事件和經驗，後來跟著媽媽投入新移民團體認識新移民文化多年後，想法和觀念也跟著改變，母子關係也更靠近，應該可以分享很多故事。經研究者主動連繫，透過家庭拜訪進行研究說明，應邀成為前導性研究的訪談對象，後列入正式的研究參與者之一。

基於曾以新台灣之子為研究對象之研究者多被學校輔導室拒絕、不予回應，再加上需要公文往返耗時的前車之鑑，因此研究者採直接與在地社區組織連繫，以及請各縣市從事助人工作或教師的友人引薦的方式，來達到尋找研究參與者的可近性，暫不考慮與學校輔導室連繫。幾經等待後，透過一位於南台灣擔任教師的性學研究所同學引見，認識關心當地新移民家庭議題的教會傳道，透過他的協助，找到有意願接受訪談的二個新移民家庭中的子女，同樣經研究者主動連繫，南下拜訪並進行研究說明，應邀成為另外二位受訪對象。

在邀請研究參與者參與研究時，由於研究參與者未成年，研究者會以「研究邀請函暨同意書」（參照附錄一）解釋研究內容與過程，讓研究參與者、家長了解進行方式、可能所花費的時間與次數，並針對研究倫理與研究參與者的權利做說明，於家長和研究參與者同意下方開始進行訪談。

3、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研究參與者一共三名，二女一男，二名女研究參與者就讀南部私立高職，一名男研究參與者就讀本市公立國中，此位為前導性研究的訪談對象。

其中一位女研究參與者於第一次受訪時，因弟弟正好從寄宿學校返家，故邀請他一起參與訪談，但後續訪談時，適逢弟弟時間無法搭上而未能參與，故研究者將弟弟的訪談內容併入該名女研究參與者的文本，做為豐富文本的材料。而另一位女研究參與者其家中也有一位就讀國中的弟弟，符合本研究的研究參與者條件，但因需要補習的因素而無法參與。

基於研究倫理考量，以下表 3-1 省略足以辨識身分的部分，僅列出與研究相關的基本資料：

表 3-1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代稱	性別	年級	母親國籍	訪談次數	訪談時間
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I1)	男	國二	馬來西亞	2(前導性研究訪談)	1.5 小時
					2 小時
				2	1.5 小時
					1 小時
尋找另一片天(姐弟)(I2)	女	高二	印尼	2	2.5 小時
					2 小時
	男	高一		1	2 小時
不一樣的 我(I3)	女	高二	印尼	2	2.5 小時
					2 小時
				1(書信)	0.5 小時

資料來源：由研究者自行整理

(三)、協同分析者

敘說探究著重研究者與敘說者在研究過程中，二者透過協商和互為主體的歷程，所建構出的生命經驗再現，重要的意義在於這些過去經驗，如何對敘說者的現在和未來發生作用。同時，為增加資料分析時的多元視野，除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共同建構文本外，研究者尚會納入研究日誌內容、與指導教授共同討論，以及二位口試委員的觀點，進行協同分析。

在訪談進行階段，研究者在每次訪談後都會撰寫研究日誌，紀錄訪談環境、氣氛、研究參與者的表情與情緒，以及對他們生命故事的體會與思考，以做為分析時的輔助資料；在下次訪談時，研究者先就前一次的故事文本與研究參與者一同閱讀與討論，讓研究參與者補充、修改，並就不足與疑問之處發問，讓研究

參與者有更多的敘說。

在資料分析階段，研究者將研究日誌置入於文本脈絡中建構，在不斷地持續比較及反覆閱讀文本中進行，嘗試將參與研究者所敘說的生命經驗，放置在社會脈絡下，尋找出研究文本的核心概念。而後再將這樣的文本及分析結果與指導教授進行討論，讓所分析出的資料在詮釋上能更為適切。

最後，在本研究完成後，透過口試的程序，邀請二位相關領域的教授，針對同一份文本與資料分析進行重覆審查，期經過此一分析者多元測定的過程，增加分析資料的周延和多元。



二、研究歷程

(一)、訪談大綱的發展

敘說探究是使用故事來描述人類經驗和行動的探究方式。敘事即如同故事，一般包括了一個「開端」(a beginning)、中段(a middle)和結尾(an end)，它是由稱為情節(plots)事件，以及個體在當中的角色所組合而成（吳芝儀，2003）。說故事是一個敘事者自我探索和尋求在經驗脈絡中重新定位的過程，MacIntyre (1981)將敘事的探索比喻為一個人一生所會經歷的歷程，這個歷程就會有如故事般，由每一個獨立又有相關連的情結構成起、承、轉、合，而這每一個階段都必須加以深入的探問，他也依據此概念，發展出一套訪談綱要架構為（引自朱儀玲、康萃婷、柯禧慧、蔡欣志、吳芝儀譯，2004）：

問題一：生活章節—將生活歷程想像成一本書，至少分成二到三個章節，並為每一個章節下個標題，簡述各章節的內容。

問題二：關鍵事件—詢問八項關鍵事件，協助釐清生活中具有意義及特定時刻，並請參與者詳述事件、行動、想法及感受。此八項關鍵事件分別為：

- 1、高峰經驗—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刻。
- 2、低潮經驗—生命中最壞的時刻。
- 3、轉捩點—重大改變的事件。
- 4、最早的記憶。
- 5、兒時的重要記憶。
- 6、青少年時期的重要記憶。
- 7、成年時期的重要記憶。
- 8、其他的重要記憶。

問題三：重要他人—在生命故事中最重要的人物及其所造成的影響面向。

問題四：壓力與難題—在生命故事中主要的衝突、棘手難題及必須克服的挑戰。

問題五：個人意識型態—個人基本信仰和價值觀。

問題六：生活主題—透過回顧生活故事察覺到貫串整個生活故事的核心主題。

問題七：未來藍圖—對未來整體的計畫及創造。

由於敘說探究是以時間軸為出發點，著重個體在此軸向上與重要他人所發生的重要事件。因此，本研究採用 MacIntyre 所提出的訪談綱要架構，發展出家庭生活經驗、人際互動經驗、文化學習經驗與文化認同經驗等四個主要的研究面向：家庭生活經驗面向關注新台灣之子於家庭內與家人相處，所感受到的互動氛圍，以及對新移民母親的感受與關係經驗；人際互動經驗面向關注新台灣之子在家庭外的人際互動過程中，重要他人們在社會文化的脈絡下，如何影響與形塑他們的自我意象，以及在過程中的心理歷程；雙文化學習經驗面向關注新台灣之子在面對父母親雙方身分、文化差異的經驗與心理歷程；雙文化認同經驗面向關注新台灣之子在父母親二種不同文化中，認同狀態如何，以及帶來何種行為反應和調適，形成初步的訪談綱要，並先邀請一位研究參與者進行前導性研究。

(二)、前導性與正式研究

在前導性訪談結束後，研究者就該研究參與者對於訪問問題的回應內容，與研究待答問題進行比對，將問題進行更能貼近新台灣之子經驗的修正，形成一正式的訪談大綱（參照附錄二）進入正式研究訪談。

敘說探究的目標在於理解經驗，並創塑經驗的意義，而對自身於所存在之世界中的體驗所做的詮釋性記錄，即為現場文本（蔡敏玲、余曉雯譯，2003）。在敘說探究中，建構現場文本的方式有很多種，其中深度訪談是一種普遍被使用的方式，研究者依據前導性研究修正後的訪談大綱，採用深度訪談的方式進行，全程訪談時間為 2~4 次，每次 1~2.5 個小時，依研究參與者的個別差異而有所調整，若有需要則再以補訪進行之。

正式進入訪談過程中，研究者發現研究參與者有他們說故事的方式與順序，訪談大綱主要目的在於提醒研究者是否有疏漏，研究者雖會發問，但研究參與者才是故事敘說的主體，保持未知的好奇詢問，方能跟隨研究參與者的脈絡，建構屬於他們自己的故事。

(三)、轉錄逐字稿與編碼

每次訪談結束，研究者會先將訪談內容以逐字稿的方式謄錄出來，然後再次聆聽錄音檔，進行校正、補充，以確認研究參與者所敘說的內容都被完整無誤地轉錄。

在確認每次訪談逐字稿謄錄均正確後，研究者開始進行逐字稿句數編碼的工作。逐字稿中以 R 代表研究者，I 代表研究參與者，以 I1-1-079 為例，I1 代表第一位研究參與者，中間碼 1 是第一次訪談，最後一碼 079 代表第 79 句對話。而後依逐字稿所呈現的意涵再進行開放性編碼，以利故事敘寫與資料分析之用。而訪談中研究參與者的各種反應，均紀錄於研究日誌中，以做為文本分析時的輔助資訊（參照表 3-2）。

(四)、研究日誌

研究者在每次訪談結束後，會針對錄音無法留存的細節另行紀錄，包括：訪談環境、訪談氣氛、研究參與者的情緒、回應的語氣和表情、訪談者當下或訪談後的思考與體會，以及疏忽需特別留意之處，以做為後續訪談和文本分析的輔助。

除此之外，研究者與前導研究的研究參與者由於距離的可近性，有更進一步的互動，有幾次到家中接送研究參與者的同時，有機會看到研究參與者居住與生活的客觀環境外，也有機會與其父母親互動，了解研究參與者的家庭氣氛、親子互動模式、父母雙方傳遞二國文化的方式，讓研究者更能理解研究參與者口中的生命故事，都以研究日誌的方式紀錄，成為輔助分析的材料之一。

表 3-2 逐字稿編碼、研究日誌紀錄範例

內容	開放性編碼	研究日誌
<p>R：怎麼說很光彩？</p> <p>I1-1-079：外國人啊！那時候我一直把媽媽想像成美國片裡面的警察，很會打仗的那種，特別崇拜媽媽的國家。</p> <p>R：什麼時候開始有這個想法？</p> <p>I1-1-080：小時候有看一些卡通，都把外國人看畫得很酷、很強，在化學實驗室裡的外國人都可以打敗原生塚，像是外星人侵入地球，顯現他們的能力，以為外國人都是這樣子的。</p>	<p>對母親和母親國家的崇拜</p>	<p>談及此經驗時，開心的表情溢於言表</p>
<p>R：那你們小時候經驗到的是什麼？你們小時候有印象的，在家裡面媽媽跟阿嬤怎麼樣相處？</p> <p>I2-1-009：就差不多天天都在吵架，就是我媽沒做什麼事，阿嬤就一直嫌，找麻煩。</p>	<p>對母親婆媳關係的認知：婆媳關係衝突</p>	<p>談及此經驗時，帶有生氣的情緒口吻</p>

資料來源：由研究者自行整理

第三節、研究資料分析

一、分析的軸向

Lieblich、Tuval-Mashiach 與 Zilber (1998) 將分析單位分為整體(holistic)與類別(categorical)取向，整體取向將個體與敘說資料視為一整體，每一個部分的敘說情境脈絡都用來理解整體的故事意義，每一個文本中的段落與字句都在整體脈絡中被詮釋；類別取向根據意義將整體故事切割為段落或句子，再把段落或句子分別歸類到被命名的類別分析中。在閱讀、解釋和分析敘說材料時，整體(holistic)/類別(categorical)、內容(content)/形式(form)這兩個主要特徵會在歷程中顯現，依分析單位與文本閱讀方法，此二向度可以將分析方法分為「整體—內容」、「整體—形式」、「類別—內容」和「類別—形式」四類。

Riessman (1993) 指出：「敘說研究的分析，開啟了訴說經驗的形式，而不僅僅是語言所指涉的內容而已。我們要問的是，這個故事為什麼是這樣說的？敘說分析希望得到的是『主角是如何解釋、理解事件的？』」(引自王勇智、鄧明宇譯，2003)。由此敘說分析的精神，本研究依想要關心的四個面向為主軸，以「整體—內容」的分析方式分析新台灣之子的生命故事，了解其對生命歷程中的事件、經驗及社會文化脈絡之主觀詮釋，並以「類別—內容」的分析方式分析認同在時間流動裡的心理歷程，用整體、脈絡、循環建構及互為主體的觀點進行敘事資料分析。

對於訪談所轉譯出來的大量文字資料，研究者將其分成二部分來進行：

(一)、故事敘寫

在故事敘寫的部分，研究者主要以時間為脈絡，將逐字稿依時間序撰寫成生命故事文本作為分析文本，並於分析進行前交予研究參與者校對，確認完全依據研究參與者敘說的經驗撰寫，以增加資料的嚴謹性和豐富度。

後研究者反覆閱讀個別研究參與者的訪談內容，理解其故事發展的背景和脈絡，依重要事件發生的時間序，將生命故事分為「出生至幼稚園時期」、「國小(或

至國中)時期」以及「中學時期」，並分別寫下每一個時期二國文化生活經驗的整體內涵，訂立主標題及次標題，形成每位參與者的雙文化認同生命故事，也就是替代(過渡)文本。後研究者反覆閱讀故事，再將各關鍵事件，以及所帶來的各層面影響，放進整體印象中檢視，形成歷程發展圖，再依歷程發展圖進行資料分析(參照表 3-3)。此部分之資料分析成果書寫於第四章第一節。

表 3-3 故事敘寫與歷程發展圖相互建構範例

逐字稿中重要關鍵事件文本敘寫	時期	雙國文化生活經驗整體內涵	歷程圖發展進程
<p>小時候我看一部影集後很喜歡俄羅斯，那時候會想說媽咪是俄羅斯來的，一直把媽咪想像成美國片裡面很會打仗的警察，特別崇拜媽咪的國家，也有看一些卡通，都把外國人看畫得很酷、很強，在化學實驗室裡的外國人都可以打敗原生種，像是外星人侵入地球，顯現他們的能力，以為外國人都是這樣子的。從幼稚園開始，回外婆家時都會去有名的名勝古蹟玩，當時因為年紀還小，就會把那些名勝古蹟當成是自己外星人的基地，想像自己和媽咪是同一國人(II)。</p>	<p>出生至幼稚園時期</p>	<p>主標題： 二國聯姻的充實童年</p> <p>次標題： 雙國文化初體驗</p>	<p>4歲時生活型態轉變： 1.隨時可以去馬來西亞 2.爸爸回台灣時會帶出遊</p> <p>看國外影集、卡通，想像媽媽是從很強的國家來的，特別崇拜媽媽的國家，有能力打敗入侵者</p> <p>文化風俗： 單純旅遊到訪，尚未發覺差異，但把名勝古蹟當成是自己和媽媽同一國的</p> <p>幼稚園時期： 認同母親國家，以此身分為榮</p>

資料來源：由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敘說分析中的「整體－內容」和「類別－內容」分析方法

在對替代(過渡)文本與歷程發展圖進行「整體－內容」和「類別－內容」的敘說分析，以發展出研究文本部分，研究者使用以下方式分析新台灣之子雙文化認同的心理歷程，分析結果將於第四章第二節以跨個案分析的形式呈現：

1、「整體－內容」的分析方法

(1)、決定跟隨的內容焦點或主題，標示故事裡的不同主題，分別並反覆閱讀：

研究者從每位研究參與者的故事中，對照訪談大綱，選出四個反覆出現、貫穿整體敘說的主題：「家庭生活經驗」、「人際互動經驗」、「雙文化學習經驗」以及「雙文化認同狀態」，將這四個主題用不同顏色的筆標示，分開重覆閱讀。

(2)、記錄結果：

①追隨貫穿整個故事的每一個主題，依研究參與者的敘說內容分門別類。

②注意一個主題最初與最後出現的樣子、主題間的轉換、每一個主題的脈絡和他們在文本裡相關的特點。

③特別注意依據研究參與者的內容、情緒或評價，與主題矛盾的情節。

研究者依時間軸重新整理、安排每個主題，以縮排小楷字體標示引用研究參與者敘說文本內容的部分，以做為研究參與者者和研究者的區辨。後以適當的文字連接、鋪陳每一個主題，為主題下簡短標題，以提示整段內容，呈現三位研究參與者雙文化認同的過程經驗，對每一分離部分理解是對三位研究參與者故事所做的第一層詮釋。

2、「類別－內容」的分析方法

接下來，研究者將每一個主題的內涵，再次置入整體故事，將對每一分離部分的理解，整合故事整體意義，找出該主題內含彼此連結的方式，形成第二層詮釋。

(1)、定義類別內容：

類別是用來切割替代(過渡)文本的主題或觀點，提供將意義單元分類的方法，可透過反覆閱讀替代(過渡)文本與歷程發展圖，從內容裡挑出主要類別有：

「知覺母親的差異」、「對二國文化傳承的經驗與回應」、「學校與社區的污名經驗」、「在二國文化間心理的衝突與回應」、「雙文化認同狀態與定位的心理歷程」、「雙文化下的優勢」等類別，以得認同在時間歷程中的轉變。

(2)、將材料分類放進類別裡：

將字句或語詞分派至各個類別，同一類別裡會呈現不同研究參與者的敘說內容(參照表 3-4)。同樣以縮排小楷字體標示引用研究參與者敘說文本內容的部分，以做為研究參與者和研究者的區辨。

表 3-4 跨個案同類主軸彙編範例

三位參與研究者的敘說文本內容	定義類別內容	整體敘說主軸
<p>在小學四、五年級時我都會跟特定要好的同學們說我的身分，有一些同學聽到之後回去跟家長講，他們都以為只要從東南亞或其他地方來的配偶都是被買賣來的外籍新娘(I1)。</p>	<p>學校與社區的污名經驗</p>	<p>人際互動經驗</p>
<p>三年級之前就有老師開始問說：「誰是印尼外籍的孩子？」，我就舉手，結果班上就只有我一個，然後就又聽到別人說我是印尼馬，動不動都會用這句話來罵我或開玩笑，很難聽，聽起來很像是罵女生很髒、印尼來的雜種的感覺(I2)。</p>		
<p>國一的時候，有一次我們老師要調查班上外籍小孩的人數，就在班上很大聲地直接問說：「我們班有誰是外籍生？」，我本來想說我私底下再去找老師說我是，結果她立刻說：「○○○妳不是好像是嗎？」，那時候我就站起來，然後叫我去下課去找他(I3)。</p>		

資料來源：由研究者自行整理

(3)、從結果中做出結論：

每一類別彙集的內容可以描繪出特定文化或群體中的人的圖像，並在此階段測試特定假設。研究者將同一類別的語句反覆閱讀、綜合分析，進行跨個案的異同比較（參照表 3-5），並輔以文獻進行討論。

表 3-5 跨個案異同比較彙編範例

三位參與研究者的敘說文本內容	相同	相異	比較分析
節慶、節日或有空的假日，台北的家人會來新竹，或是我們會去台北找他們，所以舊照片中很多都是我們和二邊家人一起合照的照片，一半是在馬來西亞照的，另一半則是爸爸回台灣時帶我們或和台灣家人去玩的照片(I1)。	I1 與 I3 父母的婚配方式是自由戀愛，家庭成員間和睦相處，互相尊重	I2 父母的婚配方式是婚姻仲介，家庭成員對母親有刻板印象，致婆媳關係衝突	本研究中尋找另一片天的母親是透過婚姻仲介的方式成為台灣媳婦，阿嬤因此對母親的身分持刻板印象而產生婆媳關係衝突，使得母親在家庭微視系統內無法被接納和平等的對待。但從另外二位新台灣之子的經驗中也發現，他們的母親是以自由戀愛的方式與父親結合，台灣家人對其母親的身分則是予以尊重，可見婚配方式會影響東南亞新移民母親在家庭中如何被看待和對待，但並非全然呈現被歧視的狀態。
我阿嬤經常到處亂講話，說她的子女有多麼孝順，但是卻講媽媽哪裡不好，她就覺得印尼這個地方就是不好，瞧不起媽媽，對媽媽的國家有刻板印象(I2)。			
爸爸還有爸爸這邊家人的態度都很好，都是尊重媽媽的，不會因為他說她是印尼的身分，頂多會因為他們(父母)常去教會做禮拜，唸說又要去教會了，教會有什麼好的，就是去那邊吃飯的就是了(I3)。			

資料來源：由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分析的信效度

Lincoln 和 Guba (1985) 提出可信任性當作質化研究的效度重點，並提出正確性、可轉換性、穩定與一致性、可靠性等標準，作為質化研究中可信任性的參照點（引自潘淑滿，2003）。本研究從訪談資料轉為文本故事中，採取以下方法作為提高可信任性的要項：

(一)、將每位參與者所陳述的敘說資料完整地謄錄為逐字稿後，將逐字稿書寫成故事文本，讓零碎、片段的訪談資料形成有情境脈絡的故事整體，並請參與者確認與校正，以提高文本內容的「正確性」，也可稱為「可信賴性」。

(二)、在每位新台灣之子生命故事的分析進行中，以上述四個面向做為敘說分析的層次，充分呼應「經驗同時是個人的，也是社會的；個人與社會的層面是同時存在」的敘說探究本質，用不同且可替換的詮釋觀點來看同樣的歷程，以增加「可轉換性」。

(三)、對於每位參與者的生命故事，尋求故事間的「相關性」與「連續性」，期使故事達到完整的圓融性，以具備「穩定性」及「內部一致性」。

(四)、在訪談進行階段，研究者在每次訪談後都會撰寫研究日誌，紀錄訪談環境、氣氛、研究參與者的表情與情緒，以及對他們生命故事的體會與思考，以做為分析時的輔助資料；在下次訪談時，研究者先就前一次的故事文本與研究參與者一同閱讀與討論，讓研究參與者補充、修改，並就不足與疑問之處發問，讓研究參與者有更多的敘說。因此，可達到將分析觀點與每位參與者進行建構過程的相互對話、溝通、協商與統整，確定該現象重現的是其個人生活經驗故事，雙方進而達成共識，以在此歷程中形成「可靠性」。

在資料分析階段，研究者將研究日誌置入於文本脈絡中建構，在不斷地持續

比較及反覆閱讀文本中進行，嘗試將參與研究者所敘說的生命經驗，放置在社會脈絡下，尋找出研究文本的核心概念。而後再將這樣的文本及分析結果與指導教授進行討論，例如，研究者當初在進行資料分析時，對於尋找另一片天(弟弟)所述：

「朋友是不會講啦，他只會說你印尼喔，我說對啊不行喔，然後他說你去過印尼嗎?沒有，就他們會一直連問一些有關印尼的事情，然後他就會問我說為什麼你不去印尼?我就說我小時候看過鬼啊!」(I4-1-031)

並沒有特別納入定義類別內容中，經與指導教授討論後，詮釋此敘說內涵為「被同儕正向接納」，並將其歸到「在二國文化間心理的衝突與回應」類別下進行資料分析，此一討論過程讓所分析出的資料在詮釋上能更為適切，亦能充分達到「可靠性」。

最後，在本研究完成後，透過口試的程序，邀請二位相關領域的教授，針對同一份文本與資料分析進行重覆審查，經過此一分析者多元測定的過程，可增加分析資料的周延、多元和可靠性。

第四節、研究倫理

凡是研究的進行，皆會涉及研究倫理的問題，敘說探究是一種與人切身相關性極高的研究方法，晚期的敘事探究關心研究者和敘說者之間的合作關係，並認為敘說探究是一個二者之間「共享故事」(shared story)的歷程，涉及彼此相互說故事和重述故事，以及雙方對於共享敘事的建構和再建構（吳芝儀，2003）。因此，面對這個共同創作的歷程，倫理議題有被高度關注的必要性。范信賢（2003）表示：「以深入訪談為基礎的敘事探究需要特別注意參與者的傷害性、分析者詮釋的權威與研究作品擁有性等倫理課題」。因此，以下從研究的三個進程來說明在本研究中倫理議題的處理方式。

首先，研究前期，在知後同意倫理方面，研究者研擬了訪談邀請函暨同意書（參照附錄一），透過親自遞送邀請函暨同意書，將研究計畫及訪談內容做充分說明，重視研究參與者參與研究與否的自主性，並告知他們在過程中若有任何擔心或疑問均能有討論的空間。在保密倫理方面，研究者會與研究參與者充分討論錄音問題，所有錄音皆在徵得他們同意後進行。在以不傷害研究參與者為原則的前提下，研究者會與他們充分討論隱私權問題，詳細說明訪談所得的資料僅作為研究使用，對於錄音資料會謹慎收藏，訪談內容的轉出皆以匿名方式處理，逐字稿謄寫也由研究者一人完成，以維護研究參與者的權益。

在研究中期，開始進入敘事的訪談，雖然敘說探究對於研究者和研究參與者之間的關係一直強調需建構一種協作、共享及平等的關係，但一旦敘說的過程啟動，研究者和參與者的位置就會在說故事的過程中不斷地流動，並在個人和社會的思慮的幅度之間徘徊，又因為每一個人先前的思考模式是不一樣的，所以雖共同身處其間，每個人對故事的詮釋還是會不一樣。由此可見，研究者個人價值觀無法中立，為避免過快以研究者的主觀視框進行詮釋，影響到參與者對生命經驗的敘說而扭曲原意，同前所述，研究者會以撰寫研究日誌、與個案一同討論現場文本內容的方式進行敘事的共構過程。

同時，研究者也會更加重視訪談過程中對研究參與者的主觀感受，對於過程中研究參與者可能因特殊因素不願深入分享故事時，被引動的負面感受，除進行自我反思，思考自己在訪談過程中所呈現的姿態，以感覺作為一種分析工具來時時提醒自己外，後續也會視研究參與者的情況提供個別諮商服務，以協助研究參與者調適因自我袒露所引發的心理和情緒困擾。

最後在研究後期，研究者要對敘說分析的故事、研究文本負起責任。在故事文本的撰寫過程中，研究者均會用研究參與者原始的話語來呈現事件的原委，並將完成的稿件一一拿給研究參與者過目閱讀，邀請他們給予意見並再次澄清研究者誤解之處，盡可能將生命故事忠實地呈現，同時也讓研究參與者擁有故事保留不願呈現片段和修改的權力。

關於所創作出來的故事其真實性是如何的議題，Kelly 認為：「人類所面對的開放性論題，並非真實是否存在，而是我們如何理解它（真實）」（引自吳芝儀，2003）。因此，在研究文本分析方面，對於研究參與者的敘事內容，作為一個敘說探究研究者而言，應著重在所處的社會架構和文化脈絡來理解它，重要的是他們如何說，而非他們說了什麼，避免只針對研究參與者個人或群體做批判，以降低研究者詮釋的權威性。

第四章 故事敘寫與文本分析：傾聽新台灣之子的生命交響曲

本章主要呈現研究參與者敘事的故事文本與文本內容分析二部分。第一節以生命故事的方式，呈現三位新台灣之子雙國文化認同的生命經驗脈絡，並以時間序的方式進行歷程分析，讓每個人生命中獨特的雙國文化接觸經驗自然展現清晰輪廓。第二節以「整體－內容」、「類別－內容」的分析方式，進行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循環建構及互為主體觀點的敘事資料分析。

第一節、故事文本與歷程分析圖

根據訪談逐字稿轉譯結果，本節要呈現的內容是研究參與者的故事與歷程分析，故事文本採用第一人稱。故事的標題分別由研究參與者自行命名為「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尋找另一片天」和「不一樣的我」。

一、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故事文本

因為我很喜歡玩電腦的線上遊戲，「ShenHu」是神乎其技的意思，每次照鏡子時都覺得自己很帥，所以就給自己取了這個名字。我覺得馬來西亞媽咪住的那一塊地方和台灣二個國家的形狀長得都很像地瓜，二個國家可以用愛心連在一起，手牽手當好朋友。

(一)、故事的源起

我是家裡的老大，現在就讀國中二年級，家裡有爸爸、媽咪和一個弟弟。爸爸是命理風水師，常往返大陸、香港幫人看房子；媽咪來自馬來西亞國家，現在在移民署工作當翻譯；弟弟小我4歲，現在10歲，讀小學三年級。我們原本和阿嬤、大姑姑、小姑姑一起住在台北，阿公因為工作的關係住在桃園道場，偶爾

會回來和我們聚一聚。約 10 或 11 年前我 4 歲時，爸爸媽咪因覺得新竹老家周邊有公園活動空間大，清大、交大學區也在附近，所以就決定搬回新竹生活。由於爸爸經常出國到大陸工作，所以小時候我和弟弟主要交由家庭主婦的媽咪照顧，爸爸一個月會回來一次和我們相聚。

我念幼稚園的時候，因為課業少，只要訂得到機票，隨時都可以去馬來西亞，通常是一年或半年回去一次，印象中只要回馬來西亞，媽咪就會說她是從馬來西亞來的，我那時候對爸爸媽媽來自不同國家感到好奇，我曾經問過爸爸為什麼他常在大陸，我和媽媽常去馬來西亞，然後又住在台灣，為什麼不住在大陸或馬來西亞，爸爸跟我說他是因為工作的關係在馬來西亞和媽媽認識的，我也因此知道媽咪是來自不同的國家。

(二)、出生至幼稚園時期：二國聯姻的充實童年

1. 濃厚的家人情誼

在一、二年前剛上國中，學校每學期都會要我們找一些照片，貼在聯絡簿封面、輔導課的記錄本，以及其他冊子上，或是寒暑假想回憶，想看看自己以前樣子的時候，就會去找以前的照片。小時候因為很常回去媽咪的國家，節慶、節日或有空的假日，台北的家人會來新竹，或是我們會去台北找他們，所以舊照片中很多都是我們和二邊家人一起合照的照片，有一半以上是在馬來西亞照的，另一半則是爸爸回台灣時帶我們或和台灣家人去玩的照片。其中有一些照片是我還是小嬰兒的時候，坐在嬰兒車上，媽咪跟我一起找照片時跟我說，我剛生出來四個月她就把我帶去馬來西亞了，這時我才知道原來更早的時候我就已經開始到媽咪的國家了。

小時候每次想到可以坐飛機、搭臥鋪火車回外婆家玩，或是去探望外公、外婆、姨婆、阿姨、表兄弟姐妹等親人，一次回去都會住十幾天，我就開心極了！在外婆家我常和三個表姊、二個表哥、一個表弟一起玩一些男生愛玩的玩具，像是戰鬥、怪獸的玩偶，就是電視上演的鹹蛋超人、蝙蝠俠卡通人物，把它變成是縮小版的模型，關節可以移動，就可以和他們打來打去。在那裡我們也常玩在台

灣也會玩的鬼抓人之類的遊戲，或是聊天、講話，講卡通裡的東西，玩遊戲王卡片，一起吹牛說誰可以打敗誰，也會在家裡庭院前玩盪鞦韆。我在台灣和弟弟一樣玩人偶、機器人，因為我最愛玩車子，所以在台灣的玩具就多了車子模型，有幾台較高級的車子現在還收藏著。在馬來西亞玩的遊戲和台灣差不多，很少玩那裡當地的遊戲。

2. 雙國文化初體驗

小時候我看一部影集後很喜歡俄羅斯，那時候會想說媽咪是俄羅斯來的，一直把媽咪想像成美國片裡面很會打仗的警察，特別崇拜媽咪的國家，也有看一些卡通，都把外國人看畫得很酷、很強，在化學實驗室裡的外國人都可以打敗原生種，像是外星人侵入地球，顯現他們的能力，以為外國人都是這樣子的。從幼稚園開始，回外婆家時都會去有名的名勝古蹟玩，當時因為年紀還小，就會把那些名勝古蹟當成是自己外星人的基地，想像自己和媽咪是同一國人，同時也開始發現媽咪國家和台灣不一樣的地方。

馬來西亞的語文和台灣非常不一樣，那裡使用很多語言，中文、英語、廣東話、印度語、馬來語都有，主要是廣東話、英語和馬來語。剛開始回去的時候，媽咪和那邊的親人都講馬來語比較多，我一句話也聽不懂，但因為在台灣都講中文，而且他們也有學華語，有時候講一講他們也會用中文講，我也都跟馬來西亞的家人講中文，所以感覺和在台灣沒有多大差別。

但出了家門以外的地方，很多商家不是華人，而是馬來當地人或印度人，如果我說華語或用比的他們都還是不了解的話，我就需要靠媽咪的幫忙，覺得很不方便，如果沒有媽咪的協助，就很難在家裡以外的地方自由活動。看到馬來西亞家人的語言能力非常好，令我刮目相看，所以一開始我會想要學當地常用的語言，也想要讓自己變得像馬來西亞家人那樣厲害，但媽咪並沒有特別教我，我也只是偶爾回去時有機會聽他們怎麼說，逐漸地我可以聽得懂一些簡單的話，但不太會說。

因為生活在台灣，學校老師會教國語，加上媽咪在馬來西亞使用的華語拼音

和台灣不一樣，她也會一邊看我功課，陪著我一起學ㄅㄆㄇㄏ，學台灣國語的拼音法，所以國語自然而然就會了。比較特別的是，以前我們跟阿嬤一起住台北時，阿嬤跟媽咪在家裡都講客家語，爸爸是台商，常跑大陸廣州，所以大陸的方言都可以說，當爸爸和媽咪有時候講一些私人的話，或是他們在講一些不能告訴我們的話，就會用廣東話取代國語。因此，客家、廣東話從小聽到大，聽久了大概也會聽了，但他們也沒有特別教，所以我就不太會說。

小時候和阿嬤、姑姑一起住的時候，主要是阿嬤和姑姑煮飯，她們都會經常做絞肉，絞肉加滷汁去燉，拌飯很好吃，但比較油膩，有時候會吃到酸掉的東西。當我回去馬來西亞時，發現馬來西亞有很多好吃的美食，有咖哩、肉骨茶，我最喜歡吃咖哩，和台灣加辣椒的辣很不相同；特別的水果有山竹、紅毛丹、榴槿，紅毛丹很像台灣荔枝，但它比較大顆，山竹剝開來裡面的果實長得像蒜頭，榴槿我以前不敢吃，慢慢的就比較敢吃，紅毛丹和山竹在台灣沒有，我最喜歡吃山竹。但是在喝的方面我就不喜歡，他們那邊很常喝綠豆泥，很噁心、有腥味，而且有些飲料沒有台灣好喝。

搬來新竹之後，媽咪經常煮咖哩，10天當中就有2、3天會煮一次，占1/3(20%~30%)，偶爾會有肉骨茶。但媽咪煮的是健康咖哩，她不加味精，鹽加一點點，只加椰奶、咖哩粉那些東西而已，和馬來西亞吃得不太一樣。我們偶爾也會去吃住家後面夜市裡的一家新加坡咖哩小吃店，裡面有賣很多食物，譬如說肉骨茶、印尼炒麵、咖哩雞飯等東南亞食物，因為這一家小吃店煮得很好吃，我們經常去吃，媽咪在家也常煮咖哩，所以我就比較喜歡吃。

現在有回去台北的時候，都還會吃到小時候愛吃的絞肉拌飯，他們都會為我們準備，去夜市逛街的時候會吃到臭豆腐、魯肉飯、肉圓、摳丸、棺材板這些台灣本土的食物，我覺得還不錯，也喜歡吃台灣的荔枝、芒果。二國食物各有好吃、多樣的地方，但我覺得台灣好吃的東西都是西方引進來的，很多都是國外食物的餐廳，像義大利麵、麥當勞。台灣開餐廳都不會開臭豆腐餐廳，作成多元化像草莓、巧克力臭豆腐，或把摳丸發揚成巧克力口味。

除了語言和食物很特別，我也觀察到馬來西亞的房子和台灣不一樣，台灣都蓋高樓大廈，那邊幾乎都蓋一層樓、平房或二樓平房；因為天氣熱，那邊的人都在喝汽水、涼水、冰水消暑，台灣這裡四季會有下雨，所以比較涼；那邊印度人很多，有華人、馬來人，很多不同種族的人，台灣以漢人居多，其他都是一些原住民、觀光客、留學生或外勞。

(三)、小學時期：雙國文化再認識、衝擊與震撼

1. 雙文化認識新視野

幼稚園時，非常崇拜媽咪的國家，但印象中我 10 歲時，在馬來西亞吉隆坡看到有個地方很噁心，煙蒂丟了滿地都是，一大片，看到地上髒髒的，我就覺得好髒、好噁心，人也沒有特殊功能，因為觀光客多，他們大多都在做餐廳、生意買賣，不能在天上飛，後來知道真相後，回馬來西亞就覺得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好，感覺失望很大。

逐漸長大後，回馬來西亞看到一些東西時，媽咪就會開始跟我說一點點風俗民情，我對馬來西亞印象較深刻的是吉隆坡的雙子星塔，那是馬來西亞的地標，就和台灣的 101 一樣；還有一個印度和馬來西亞共有的特殊節日叫大寶森節，是慶祝牛的節日，是由人拿針刺在自己背上進行的。馬來西亞的宗教回教和佛教都有，馬來西亞和台灣的家裡一樣都拜觀音，東西拜拜後才能吃，但儀式不太一樣，台灣要點香、參拜、點燈一連串的儀式，需要 20~30 分鐘，馬來西亞那邊只需要點香拜一拜就好了。台北和新竹家裡都設有佛堂，每到節慶拜拜，都是依循台灣的儀式，阿公、阿嬤、爸爸都會教媽咪，有時候也會教我，但是我覺得太複雜了，也很懶，所以就沒有學起來。

台灣文化是學校老師教的比較多，在家裡爸爸也會跟我講一些風俗民情，像七月開鬼門、清明節掃墓、九九重陽、教師節的故事，爸爸回國時也會帶我去一些社會課本上有出現的重要景點，讓我更認識台灣。印象較深刻的是淡水，老街附近有一家賣童玩和古董的店，裡面有劍球、橡皮筋槍、彈弓，還有一些空氣槍。我們偶爾會去童玩店，看到不曾看過的玩具問媽咪或店員，他們就會跟我說這是

什麼東西。另外還有一位叔叔，是爸爸的朋友也會跟我說，有一次我們去基隆玩，回來經過一家童玩店，他就買給我一個劍玉(球)，然後教我怎麼玩，這些都是在馬來西亞沒有玩過的。

2. 非自願接觸母親母國文化

在我小學五、六年級時，媽咪開始加入外籍配偶中心，那裡會舉辦很多活動，媽咪都會主動幫我報名，要我也一起去。我一開始不喜歡那裡，因為很少和我一樣年紀的朋友和我一起玩，覺得很無聊，想說在家裡可以玩電腦為什麼要去，但因為不去媽咪會生氣，所以我也從那時候開始跟著媽咪接觸更多東南亞各國家的文化活動，有唱歌、表演、美食，還有一些傳統節日。

我記得當時媽咪知道桃園有一個國小舉辦寫文章，獎品是一張機票讓你回媽咪自己的家鄉，有很多人參加，要通過考試才能獲得，考試的項目是聽、說、讀、寫母親家鄉的語言，我媽咪來自馬來西亞，所以就考馬來語，因為我說和寫全都不會，所以我沒有通過。後來到校長室去審核時，教授跟媽咪講：「妳沒有把妳兒子教會妳家鄉的語言是妳的錯、妳的疏失」，他說：「妳不要在意別人的眼光，國光石化未來會跟馬來西亞合作，下一代很重要，要教會他妳自己國家的母語」。那一次考試沒有考過就覺得怎麼會那麼難呢？有二個小朋友也都沒有過，他們的心情和我們一樣，就覺得在台灣就是要適應這裡的環境，沒有人覺得自己家鄉的語言、文化是重要的。

從此之後，媽咪就知道原來自己家鄉的東西很重要，隔天立刻就寫一大堆馬來基本語：早安、午安、晚安、請、謝謝、對不起那些，一個一個慢慢教，大概七、八個單字，就教了一個月，然後要我全部都背下來。那時候我媽咪要我再多學馬來語時，我覺得很煩，我的數理比較強，學校課業大致上還算不錯，但英語學得不太好，想到要學二種語言就覺得很麻煩，英語已經不好了，幹嘛還要再學一種語言，應該加強的是英語，但當時媽咪很積極要我學會馬來語，所以我就較不理英語，因此我現在英語很差。後來因為我功課越來越多，也較少有時間回馬來西亞，媽咪漸漸忘記這件事，就沒有再叫我背了，然後我也很久沒有講那些話，

就漸漸忘了，現在也不太會講，但我可以聽得懂基本語。現在想起來雖覺得很可惜，為什麼這些我都沒有學會，但後來覺得將來回馬來西亞的時間又不多，二、三年才回去一次，而且英文是國際語言，還是先將英文學好比較重要。

3. 現身後的窘境

由於入學都要填資料，所以學校老師很早就知道媽咪是外國人，老師們都對我很好。小學三、四年級時，學校開始會發一些新移民活動的單子，像是中秋節晚會、姐妹聚會等，要我們回家問媽咪要不要參加。當初拿到時不知道那是什麼，只知道是新移民之子才有，當時對新移民的概念不會太多，就是外國人，跟美國人差不多，不會想太多覺得自己身分很特別，老師也沒講什麼，就說這回家交給家長就好了，我看上面沒有家長需要簽名的回條，覺得那是一般老師交給我們要跟媽咪說什麼話的紙，不覺得有什麼，所以就不會特別認真保管，而且那時候我們都會折紙飛機射來射去，比誰折得比較好，可以射得遠，當時覺得那些紙沒有用，只是多一張紙來折紙飛機，所以拿那些紙來折紙飛機，然後就不見了，回家都沒有交給家長。有一次是老師看到我這樣子，然後他就用信封裝好親自交給媽咪，那一次之後媽咪就加入學校志工團，擔任我們學校的說故事媽媽，也擔任過很多次懇親會班級代表，開始常常到我們學校。

一開始我知道媽咪是不一樣國家的人時，我覺得比較酷，可以炫耀，因為我可以跟著媽咪回外婆家，到台灣以外的國家玩，看不同的東西，吃好吃的食物，聽很多種語言，一切都覺得很新鮮，而別人都只能待在台灣。因為我喜歡炫耀，所以在小學四、五年級時我都會跟特定要好的同學們說我的身分，有一些同學聽到之後回去跟家長講，家長可能也不知道什麼事就回答他們的問題，他們的家長都比我們更老，他們都以為從國外來的，只要從東南亞或其他地方來的配偶都是被買賣來的外籍新娘，就跟他們講錯話、亂講話，我沒想到他們會這樣講。我們這群朋友都是男生，聽到他們對我罵一大串英文加中文加閩南語的髒話，像是海灘的英文，還有很多很多，我有時候會跟他們吵架、互罵；有時候要理不理的，因為他們也會罵別人，我們也經常因為朋友間的派系猜忌互相吵；有時候我會跟

他們打架，如果他們再講我就繼續打，打到他們不講為止，嚇阻一下，不打不相識。後來我也有問媽咪，媽咪跟我講她不是他們說的那種情況之後，我就有跟他們解釋，或是跟他們說我可以經常出國，那裡有多好玩，一直說一直說到他們懂為止。

到小學五、六年級時，有一些人原本和我是朋友，後來知道我的身分後就不太想理我，以前我得罪他他會原諒我，到最後我得罪到他的時候，他反而回過頭來噙我，在遊戲中也不肯和我同一組。更有幾個算是很賤的人，喜歡開別人玩笑，有一次我去福利社，就有一個人說要請我吃東西，我就拿一瓶飲料說好啊，就後來他付完自己的就立刻跑掉，結果我出來之後他就說有人亂拿東西，邊跑邊大聲喊說我是小偷，我就趕緊把東西放下，很生氣地衝回教室要打他，嘴巴說要請我，到最後卻把我丟在旁邊，然後就亂宣揚，不但騙我，還說我壞話。那個同學在五年級的時候跟我很好，後來我才知道，他媽咪都會跟我媽咪聊天，但不知道聊到什麼東西，她們到最後反而是吵架，他也因此很不喜歡我媽咪，可能有一點連累吧！現在回想起那一段日子，我其實是很受傷的，覺得他們開我玩笑開得太過火了，我也因為這樣不喜歡媽咪到學校來。

在那段期間我不喜歡我媽咪到學校來，一半是因為媽咪是外國人的身分，會被誤會、被亂講話，還有一半是她的個性會在學校亂講話。曾經就是老師說家長可以來學校看小朋友上課情形，媽咪來教室看我上課情形時，她就在老師面前叫我趕快舉手，我說我不要參加，後來回去就被罵，感覺她在我旁邊會礙事；還有一次是她跟老師聊天聊很久，丟我一個人坐在旁邊很無聊。我記得還有二次算是難堪的事，一次是我媽咪跟我五、六年級老師經常聊天，有一次就被人說閒話，有人就說什麼我媽咪都會巴結那個老師，所以那個老師才會對我很好，後來老師澄清說她對我不好，她跟大家一樣好，就感覺在同學面前講我一個，有讓我出糗的感覺，就覺得那個同學為什麼要亂講話，在這之後，我就叫媽咪不要到學校來，媽咪就有半年沒有去找老師。我一開始是不會計較這些東西，但是講久了就會覺得生氣，所以現在即使不是身分的問題，我也沒有很喜歡媽咪到學校來。

後來六年級社會課老師教到新移民的單元時，提到台灣一直是個移民社會，從早期的閩南、客家兩大族群，到光復時期的外省人，到近年來的婚姻新移民概念，剛開始老師向班上同學介紹我媽咪的身分時，我當時覺得那一、二個同學，可能會因為之前所發生的一些事情，對我投以異樣眼光，但和其他同學相處的過程中，發現還是有一些同學會覺得我很特別、很幸福，每年都可以出國玩，並不是每個同學都用異樣眼光看我，否則我應該就不會想要去學校了。

當同學們知道新移民的概念之後，我和幾個原本要好的同學又和好了，我也過得不錯，我媽咪才比較常去學校。現在想起來覺得那時候大家都很幼稚，或許當初我不要炫耀會比較好，就不會因為身分不一樣而引來同學的誤會和衝突，而且還是要好的同學，讓我那一陣子覺得很不開心，我覺得這是個誤會，事情講清楚就好了，但也感到很有趣，別人沒有這種記憶。

(四)、國中時期：震撼後文化認同挪動

近幾年因為我媽咪在移民署工作當翻譯，我也一直持續被拉去參與很多活動，前年我去當小志工，去年國一時，我、弟弟和媽咪去參加一個表演唱印尼、馬來兒歌的比賽，還有新移民家庭攝影比賽，今年升國二的暑假我是去當夏令營小隊輔，也完成南洋姐妹會所辦的多元文化講師訓練，獲得多元文化講師資格。小時候在馬來西亞很少玩那裡的遊戲，也因為活動需要，近幾年媽咪每次有回去馬來西亞時，會帶點童玩回台灣來，或是請別人幫她帶過來，然後就教我們玩，印象最深刻的有撿棍枝，是桌上型遊戲；快樂一家人，是牌類遊戲，幾個人聚在一起玩；風箏很大，長得奇形怪狀。我覺得兩個國家的童玩都不難玩，感覺還可以，也沒有特別偏好，就是多認識一些不同的遊戲，可以在帶活動時用得上。

剛開始接觸這些活動都是被媽咪拉去的，更在今年參加南洋姐妹會多元文化講師培訓時，先是因為年齡太小被拒絕，後來在媽咪的極力爭取下我獲得參與資格，受訓過程中又因為帶領的課程準備不理想而被指責，我當時哭得非常難過也很生氣，不知道為什麼自己要去，後來我因為不服氣，就傳簡訊給媽咪說我一定要完成訓練，或許可能是去習慣了，或是我覺得多學一些東西也是不錯的，所以

就和媽媽一起完成訓練，拿到證書有一種開心、得意的感覺，因為從一開始有 20 多個人去，都爆滿，中途有很多人都放棄，然後最後不到 10 個，原本有很多都是台北人、屏東人，最後拿到證書的都是新竹人。

由於四、五年級開始，媽咪就會要我上台唱歌，也有上台領獎說話，以及帶活動的經驗，我有經歷過面對台下一堆人的訓練過程，所以上台不會緊張。國一、國二時一堆課程都需要報告，特別是每次地理報告完後，老師就說我很厲害，可以講得很清楚，不會像平常一樣結結巴巴，每次分數都是最高分，且學校每次講到馬來西亞時都會由我來介紹，只要講到馬來西亞大家就會說那是我的媽咪，我就覺得很光彩，所以現在越來越覺得這個身分還不錯。但這些經驗有時候卻也是個麻煩，因為那些都要準備，有時候我就不想準備，幹嘛要拉我，而且會被認為我很喜歡表演，如果表現不好就會很丟臉，因為全部的人都在看我，會讓我想到多元文化講師培訓時不想再提起的那段經驗。

(五)、定位：雙文化認同移轉與融合

我從小就可以在台灣、馬來西亞二個國家到處玩，也發現二個國家在語言、飲食習慣、居住環境、風俗習慣等方面有不一樣的地方。在語言方面，我會聽客家、廣東話和馬來語，這些語言是聽久之後學來的，感覺回馬來西亞比較有影響，我就可以比較聽得懂他們說的，但不會講還是沒有用，在台灣就沒什麼影響。在吃的方面，和台灣比較起來，馬來西亞吃的東西比較多樣化，一樣東西可以做成很多種料理，且搬來新竹後經常在吃，也比較合我的口味，因為我比較重視吃，所以如果以吃來說，我會選擇去住那裡，不會選擇住這裡。

因為和媽咪相處的時間多，在吃的方面比較喜歡吃馬來西亞的食物，也參加過很多活動，比其他人認識更多台灣以外國家的文化，可以介紹給別人知道。去年和幾個朋友一起玩一個名為「彈彈堂」的網頁遊戲，玩法是拿東西互相丟對方，成功者就可以升級，遊戲過程中發現裡面有一樣裝備叫做「馬來西亞寶箱」，裡面有很多禮物，要拿錢去儲值購買鑰匙來打開，打開之後可以抽獎，我就趕緊叫媽咪過來看，媽咪也覺得很驚訝，都沒有什麼越南寶箱、泰國寶箱，就只有一個

馬來西亞寶箱，就覺得馬來西亞還真偉大呢！

爸爸雖然一個月才回來一次，當爸爸回來時，都會教我一些工具修理東西的事情，講一些做人處事的道理、態度，介紹台灣的風俗節慶，以及帶我們到處去玩。在我小時候的印象中，我們去馬來西亞都要過海關，本國人跟外國人不一樣路線，所以媽咪沒有辦法幫爸爸跟海關說英文，爸爸說他就靠了 yes、no，和一些簡單的東西就可以過去了，所以我一直很羨慕我爸爸，他英文跟我一樣很菜，還可以出國去工作。還有一件令我感到不可思議的事是，我最近拿了我七個同學的名字給他，要他說這些同學的個性是怎樣，結果他說的個性都符合，讓我覺得爸爸很強。

我記得曾經在國一時，馬來西亞的家人來台灣找我們玩，回來後我在週記上畫一個圖是，將馬來西亞媽咪住的那一塊地方和台灣二個國家的地圖都畫出來，然後再畫手牽手，再畫一個愛心連在一起，因為我覺得二個國家的形狀長得都很像地瓜，可以當好朋友。最近才知道大家說新移民的小朋友是腦殘，我覺得會發生這種事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家裡有個語言天才的媽媽，我又聽得懂一些馬來西亞當地的語言，我雖然英語不太好，但是我對科學有興趣，所以我曾經有想過說先把英語學好，有機會再學馬來語，打算以後假如有辦法的話，可以去馬來西亞幫別人看房子。

現在的我已經可以接受自己的「一點」與眾不同，心打開了，腳步踏出去，想到我因為媽咪是新移民，使我的生活比其他小朋友多了些不同的體驗，我是台灣人，只不過到外婆家要坐飛機而已，幸福就多了一點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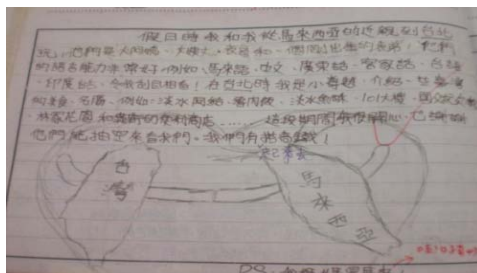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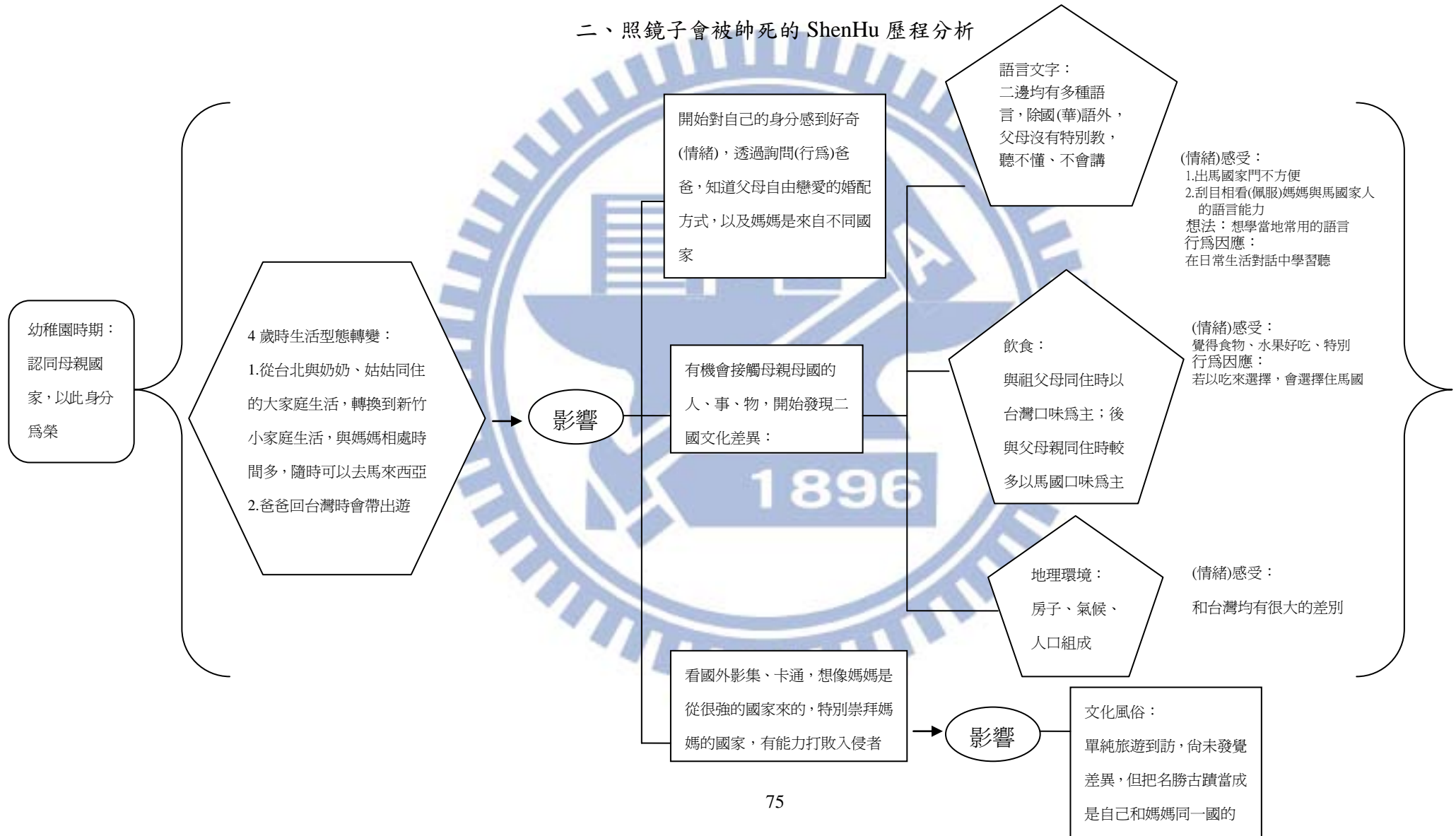


圖 4-1、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對雙文化認同的意象圖

圖示說明：□ 成長階段認同狀態、◡ 關鍵事件、▢ 關鍵事件帶出的影響事件、◡ 雙國文化差異面向、▣ 現階段認同狀態

二、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歷程分析



父母持續帶出遊；爸爸與學校開始傳遞台灣文化

小學時期：認同的轉變
以此身分爲榮→受傷，不喜歡媽媽到學校，不要凸顯自己的身分→接受自己的身分→強迫接觸母親母國文化後的抗拒與矛盾

開始知道二國文化、風俗的差別，主要仍依台灣習俗來過節慶

一、二年級：
媽媽開始教母國常用三種語言

三、四年級：
1.發現馬國環境髒亂
2.沒有太多新移民概念
3.因活動通知單事件，媽媽開始進入志工團、擔任幹部，活躍組織

四-六年級：
1.因炫耀致同學對母親身分的誤解歧視
2.被同學罵難聽的話
3.同學不肯一起玩遊戲
4.故意惡作劇
5.媽媽的個性

五、六年級：
1.老師對新移民概念的教導
2.非自願接觸母親母國文化：參與母親母語考試、考試未通過後的語言學習、參與新移民組織活動、當小志工、認識馬國童玩

影響
具有聽懂多元語言的基本能力

影響
對馬國印象
稍微改觀

影響
同儕人際、親子關係衝突
對馬國文化認同鬆動
對自己的雙文化身分感到衝突

影響
同儕人際關係修復
被動參與馬國文化學習，對馬國文化重新定位
發展雙國文化身份優勢

(情緒)感受：
對馬國感到失望，對媽媽國家的認同感覺稍微鬆動，但仍覺得媽媽是外國人是很酷、可以跟別人炫耀的事

(情緒)感受：錯愕、生氣、受傷
想法：
1.受主流價值評價，衝撞對自身身分、媽媽母國文化的認同感，引發認知鬆動與不確定
2.不想要媽媽到學校，凸顯自己的身分行爲因應：
1.相應不理
2.言語和肢體反擊
3.詢問媽媽真實情況，予以解釋，或說自己出國的正向經驗

(情緒)感受：特別的、幸福的；不開心、無聊、煩、挫折、可惜
想法：
1.建立同學與自己對新移民概念的正確認知
2.區辯對自己的異樣眼光是少數，多數同學還是羨慕自己的(發展正向認知)
3.覺得很少有同年齡的朋友，想要在家玩電腦
4.對於原先所認爲「移入者要適應當地文化」的認知有所挪移
5.學習基本語後認爲不實用，所以沒繼續學，認爲學好英文較重要
6.覺得媽媽已是語言天才，想發展自己所擅長的數理和昆蟲科學
行爲因應：
1.學習內斂，不太展露光芒
2.爲了不讓媽媽生氣，有時被動參與
收穫：
1.過程中培養自己穩健的台風
2.累積對母親母國文化的知識，成爲日後的資源
3.有第三外語學習的基本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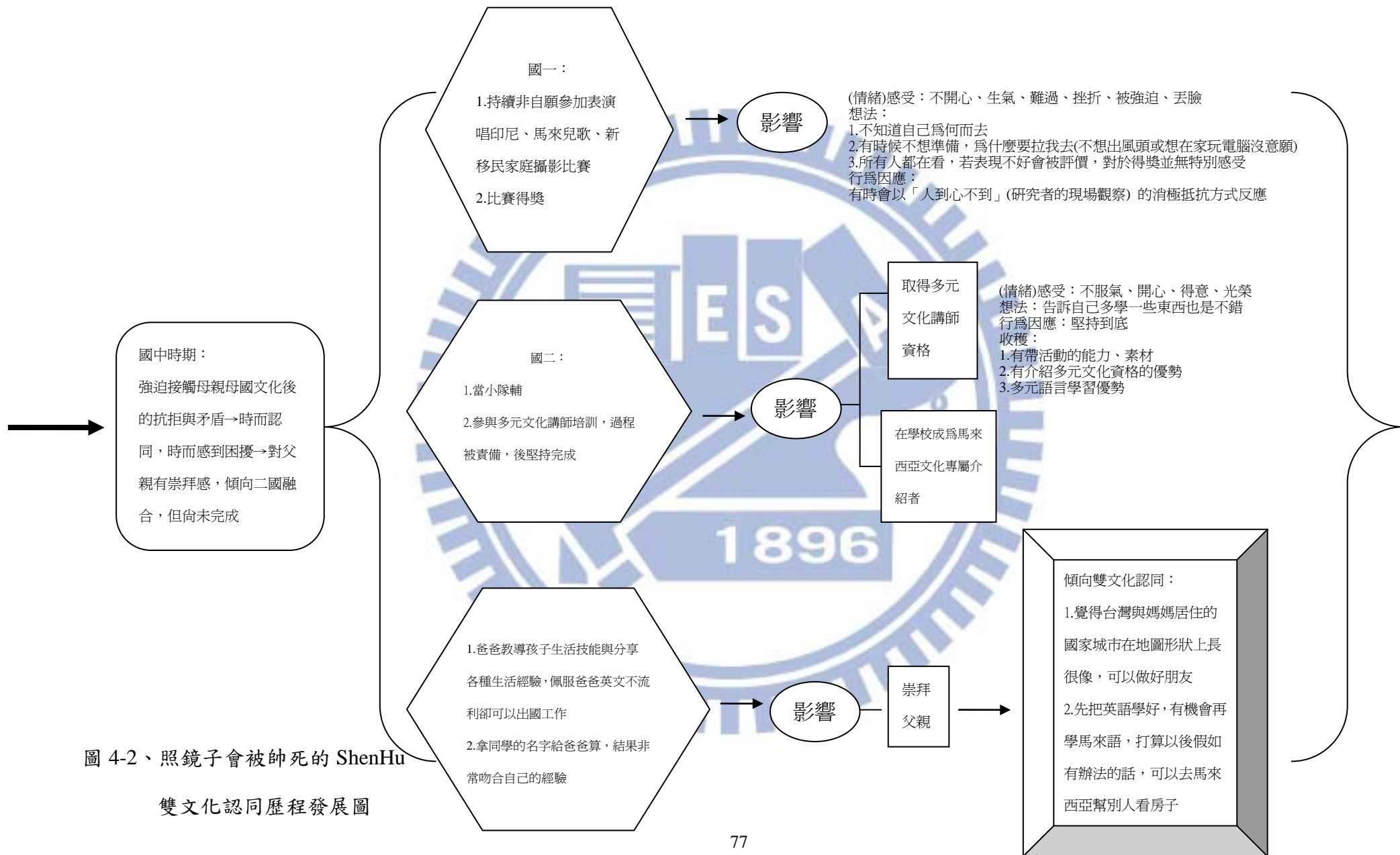


圖 4-2、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雙文化認同歷程發展圖

三、尋找另一片天故事文本

「尋找另一片天」是我為這篇故事取的名字，雖然習慣生活在台灣，說實在話台灣是比較好，但印尼的文化是一個未開發地區，畢竟也是媽媽的家，因為沒去過也沒有認識過，所以就是蠻想去看看的，也覺得值得去認識它、開發它。

(一)、故事源起

看著爸爸年輕時的照片，在高雄美濃務農的爸爸，20幾歲的時候長的還不錯看，聽說他30歲以前好像都很風流的樣子，但不知道為什麼30幾歲都還找不到老婆，所以就在阿公、阿嬤的建議下去印尼相親，看中我媽媽，於是媽媽就從印尼跨海嫁到台灣來。爸媽第一年結婚後，第二年就生了我，是家中的老大，現在就讀高職農場經營科二年級，第三、四年就懷了我們家大弟，現在就讀高職汽修科一年級，原來的家庭成員還有爺爺，後來爺爺約在我2歲、大弟1歲的時候就過世了，在我5歲時，媽媽又生了小弟，現在讀國一，所以我們家現在總共有奶奶、爸爸、媽媽、大弟、小弟和我6個人。

媽媽從印尼嫁來我們家後，前幾年因為懷孕和照顧我們不能出去工作，然後好像是第六、七年之後才開始工作，生活上和爸爸的相處得還算和平，但與阿嬤的相處就有非常多的衝突，學校和鄰居也會拿我們的身分開玩笑，我和大弟的生活經驗故事也就是從此展開。

(二)、出生～幼稚園時期：不平靜的家庭，奇怪的事物

一直以來，我們家裡都是吵吵鬧鬧的，大姑姑是看到我阿嬤不是逃的跟什麼一樣，不然就是怕的跟什麼一樣，然後伯父更誇張，幾乎很少回來，要寫信才肯回來。從小我就開始感受到媽媽與阿嬤的衝突，我看到阿嬤和媽媽幾乎天天都在吵架，媽媽沒做什麼錯事，阿嬤就一直嫌、找麻煩，明明菜還有很多，她就是偏偏一直要講沒有菜，不然就是說她身體不舒服，一堆小理由、小事情都要吵，不知道為什麼，不懂阿嬤為何要一直嫌媽媽。

常常看到媽媽會跟著阿嬤學煮菜，約莫在我4歲、大弟3歲時，媽媽有時會煮一些奇奇怪怪的料理，吃起來很辣，因為小時候不吃辣，所以不辣的菜就會吃，太辣的菜不敢吃就選擇不吃。除了偶爾煮很奇怪的菜以外，媽媽講電話時也會講一些莫名其妙的語言，和我們平常和爸爸媽媽講的國語、跟阿嬤講的客家話，以及偶爾講的台語很不一樣。媽媽說客語的語調就是尾音拉高音、蹺很大，一直不解為什麼要拉高音，要不然就是很低沉，例如講說你好一般不就是你好嗎，她就是你好那個好為什麼要加強口氣，就是尾音的部分都會加，就是念很長的時候就會溝低溝低溝低。還有另一種從沒聽過的話，它的發音每句話後面就會出現很像古，要不然就是魯這兩個音，講什麼都古，真的很奇怪。可能是電視上聽太多客語、台語、國語這三種語言，那時候又還沒有教英文，媽媽當時又蹦出一堆奇怪的話，因為講話的方式很奇怪，就覺得媽媽很厲害。後來我問媽媽說為什麼要講這個莫名奇妙的語言，也會煮很辣的菜，媽媽就說她是從外國來的，然後就講她嫁來台灣的事情，我們從那時候起知道媽媽是來自不同國家的人。

聽媽媽說，她一開始嫁過來的時候，就被阿嬤嫌很嚴重，因為她是印尼人，喜歡吃重辣口味，也不清楚台灣的口味，結婚後第一天就煮了印尼的東西，無法討好婆婆的胃，還有因為媽媽當時不會講國語，只會講印尼當地的客家話，和這邊又有些不一樣，語言上無法完全溝通，悲劇就從此展開。由於媽媽一直都蠻肯工作的，且爸爸好不容易娶到一個太太，所以阿公很疼媽媽，在他還沒過世前，會幫媽媽說話，也買過一台機車送給媽媽，因此現在每當清明節或阿公的忌日，媽媽雖然信奉基督教，但都會願意拿香拜阿公。阿公過世後，阿嬤在家裡就最大了，情況就開始變得很糟。我小時候看見媽媽很常哭，有時候會情緒爆發，聽媽媽這麼說，開始有點知道為什麼阿嬤常常和媽媽吵架。

後來在房間裡翻閱照片，看到不少我一副很生氣給人家抱著，或是拿著一個榴槤擺著一副臭臉的照片，覺得很奇怪，詢問之下，媽媽說差不多在我二歲的時候，由於是第一個生出來的孩子，所以有和媽媽回去過印尼一次，那些我覺得很奇怪的照片都是在印尼家中拍的。從照片中知道印尼那邊的家人超多，多到數不清，我外婆好像一口氣生了12個還是13個，好像原本是15個，然後一直夭折變成13個，真的生的超多，不知道為什麼印尼人都是這樣子很會生耶！但他們感情都很好，媽媽常常都可以跟他們講電話

一講就是 2 個小時，講講笑笑然後又哭了一下又繼續笑，真的很令人羨慕。

大弟出生後，由於印尼動盪不安，所以就沒有機會回去，長大後我和大弟也就沒再回去過，反而是小弟回去的機會較多。我印象中的印尼，好像是一個很熱的地方，吃的東西都是辣的，其他對印尼的認識都是後來透過與媽媽在日常生活中相處知道的。

(三)、國小時期：混血兒的印記

1. 家庭衝突白熱化

因為媽媽和阿嬤還是一直會吵架，記得我國小一年級時，媽媽只要難過就會來跟我說她現在很累，一直說她很想離婚，或想搬出去，可是又不行，因為她有我們這些小孩要照顧。當時聽到媽媽說要離婚，從學校學到這個名詞知道就是要分開，感覺很難過也很恐怖，會希望媽媽不要走，爸爸媽媽不要分開，你們就好好的在一起就好了啊，長大之後才發現，其實並不是我想像中的那麼好，還是離一離比較好。

阿嬤除了在日常生活上挑剔外，也經常到處亂講話，說她其他的兒子、女兒有多麼孝順，不然就是我表哥怎樣又如何的，但是卻講媽媽哪裡不好，她就覺得印尼這個地方就是不好，瞧不起媽媽，對媽媽的國家有刻板印象。我聽了會很不高興，媽媽明明沒有做這種事，阿嬤就很愛就跟旁邊的人講、打電話到處亂講，雖然講到太過份的時候爸爸會出來阻止，且她們婆媳之間的戰爭，我們小孩子也插不上手，但我覺得媽媽很委屈、壓力很大，所以就會跟媽媽比較好，會去安慰她，有時候會想跟阿嬤吵起來，可是又覺得這樣對老人不尊敬，如果這樣做的話應該會被打，愈長愈大就在課本上知道說老人愈老就愈像小孩子，到最後就無視她講話啦！

2. 學習母親母語後心生佩服

媽媽平常都是用國語跟我們講話，但是當她跟和她一起嫁過來的阿姨朋友們、印尼家人講話或講電話時，大概會用超過四種語言，國語、台語、客語，然後是印尼、廣東話，還有其他的，我覺得媽媽很厲害，超強的，會很多喔！媽媽很常講印尼話、國語，國語再換閩南語，要不然就客家話，要不然就講一小句話，然後就全部串在一起，一整個很帥這樣子。大概是從小學開始，媽媽偶爾會教我們一些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印尼話，

例如，她會說吃飯叫做什麼，洗澡怎麼說，然後跟我們說去夜市或去哪裡怎樣講，希望我們長大後可以自己回去印尼，就這樣一直講講講。

但我們在學習過程中感覺比英文還要難，英文是還有一個字，它是全部就黏在一起，就聽完什麼就古古古，講完一句還是古古古，令我們完全聽不懂，由於媽媽和阿嬤的關係不好，我阿嬤只聽得懂國語跟客語，所以每次我媽媽都會用印尼話跟我們說要「去夜市」，然後就帶我們出去，因此到現在我印象最深刻、聽得懂的就是「洗澡」和「去夜市」這二句。雖然媽媽有教我們講，最後頂多只能聽得懂最常用「洗澡」和「去夜市」的兩句話而已，其他的還是聽不懂，所以大概在我五年級的時候，媽媽就放棄不教了。國語的話則是學校會教，客家話和台語在家裡就沒有特別教，所以簡單的我們會聽會說，太難的就沒辦法，就要請爸爸跟阿嬤講。

聽媽媽說話，知道印尼有很多語言，覺得媽媽很厲害，但對我們來說轉換得太快，根本就聽不懂。印尼的文字也很奇怪，以前媽媽寫信時，有拿給我們看過，我們看到一長串的字黏在一起，像你好、我現在過得很好，中文只有兩個字或幾個字，印尼文就很長，一排好長啊，很像英文黏在一起，但又不是英文。除了太難學以外，另一個學不起來的原因其實是沒興趣，就是我們很少去會去印尼，所以真的用不到，若到時候聽不懂、看不懂再問就好了。

3. 浮上檯面的異樣眼光

聽媽媽說，在我們一、二歲的時候，外面的人知道我們是印尼人生的孩子，就已經開始叫我們印尼馬(女生)和印尼古(男生)，剛開始聽到時感覺很像在諷刺，但當時和我們一樣是外籍的孩子比較多，而且幼稚園時比較天真不會 care 什麼，所以對自己的身分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與差別。一直到上小學後，小一的時候有分班，分忠班跟孝班，然後四幾年級之後就合班，三年級之前就有老師開始問說：「誰是印尼外籍的孩子？」，我就舉手，結果當時班上就只有我一個，然後就又聽到別人說我是印尼馬，動不動都會用這句話來罵我或開玩笑，很難聽，聽起來很像是罵女生很髒、印尼來的雜種的感覺，諷刺的感覺又再度上來。聽到同學們這樣說，我會很生氣，覺得他們明明自己這麼墮落，又沒有比我好，憑什麼有資格講我們。

有些鄰居也會看不起我們，在完全沒有做什麼事的情形下，他們就說我大弟印尼古怎樣怎樣。在大弟國小五、六年級的時候，曾經發生我們去倒垃圾，我們家就只有一包，我大弟丟進去了，那個鄰居就突然拿一包過來說，印尼古你怎麼沒有幫我丟，他和他的家人就知道我大弟的名字叫做什麼，還是故意講那一句話，那時候我們就生氣回嗆他。大弟對於別人這樣叫他，都會直接回嗆，只要對方講一句話、一個字，他就馬上嗆，不給他講第二句話的機會。

國小社會課本裡新移民概念的教導，我沒有什麼記憶，印象中老師只有提到是外面來的增加的人，人口增加數，然後她們要學習的東西，就很簡單的照課本講，課本寫什麼，她就講什麼，就是從外地移民來的不是台灣人，他們就只會直接念過去。所以當別人知道你是印尼人生的孩子，好像就只能用那個字來形容，久而久之大家就以為只有那個字可以講而已，有很深的刻板印象。

剛開始我會很生氣，有時候我們姐弟會在睡前互相亂聊天、發洩，久了之後就直接不理他。我有時候就想說混血兒其實也有好處，混的漂亮的話其實也不錯，有些人我跟他們講說我是混血兒，他們有點嚇到說真的假的看不出來，如果真要辨識的話，會說是頭髮顏色較明顯偏褐色，有點像是染髮的感覺。現在每次別人罵我什麼，我都會說：「你剛剛說我什麼東西啊？」，笑一笑不在乎它就沒事，因為停留太久也沒用，停得愈久反而愈麻煩，不如什麼都不要想，快樂的活就好了，也有可能因為這些事情養成我很多容易健忘的個性吧！

4. 彈性、務實的精神傳承

爸爸是高中畢業，他的哥哥功課很好，而他功課不好，就覺得很難過、自卑，所以他會希望我們功課可以好一點。我是大姐，小學的時候成績不好，因為爸爸農田工作忙，功課方面他就沒辦法教，媽媽覺得還可以救，她就會打我，但從沒有教的那一刻起，我的成績就已經敗掉了，愈補愈大洞，可能一直都不理想，之後爸爸媽媽也就放棄我們三個的成績了，後來他們轉為也可以接受其實成績也不一定要要求的這麼嚴格，就變成說你品性好就好，不要抽菸喝酒，不要在不該的年紀做不該做的事情，只要行為正正當當就好。我其實還蠻慶幸的是，雖然成績算是不太好，但我實作比較強，所以後來媽媽也

可以接受按照我的程度來發展。

媽媽只念到國小畢業，她大概從小學就開始工作，所以我小六的時候就被帶出去工作，去餐廳洗碗、送餐，從早做到晚。剛開始會覺得很累，直呼簡直是虐待童工，但媽媽說這是磨練，她小時候也都是這樣做，後來我就開始跟媽媽比，比媽媽那邊的教養，比媽媽那邊什麼階段該做什麼事，感覺跟媽媽比起來自己比較爛，就會提醒我要比媽媽做的好，做久了就習慣了，就會想說玩久也會玩膩，反而努力工作的話比較好一點，因為抗壓性會比較高。

(四)、國、高中時期：新發現心體會

1. 異中求同，欣賞多元

除了和媽媽一起到外面工作，國中時候的我，有機會跟媽媽一起煮飯，發現媽媽煮菜方式非常特別，喜歡做得很鹹，可是我煮的就很清淡，所以兩邊吃起來味道就很奇怪。媽媽若覺得不好吃，自己會去拿辣椒配料加，或是自己另外煮一鍋她自己要吃的，我們觀察她幾乎每道菜都會加辣椒，有些菜也會加白醋、檸檬，很辣、很酸，醋味道很重，我們都不敢吃，就看著她吃下去，有些看起來很噁心，真不可思議媽媽還吃得下去。

雖然有些偏重鹹、辣、酸的東西我們不敢吃，但有時候媽媽和其他阿姨聚會或有材料時，他們就會做一些很好吃的印尼食物，我們可以吃到像炸雞、老椰子的肉弄碎包成水餃、白蘿蔔絲跟一個不知名的東西當水餃裡面的餡料，做成炸餃子，這些外表看起來很普通，可是很好吃的食物。

現在家裡的飲食仍是以台灣口味為主，媽媽煮的台灣菜還可以，雖偶爾還是偏重鹹、辣、酸，但只要不要太過重口味，我們都會跟著吃，吃久了也就習慣了，沒有特別的影響。有些印尼的東西雖然沒有那麼重口味，像炸香蕉，外皮酥但裡面很澀，口感不佳，或是印尼道地重口味的食物，我們還是無法接受，還是習慣台灣的飲食。

因為媽媽是同時跟很多人一起來，所以我們也認識很多阿姨，她們一聚起來就在那邊呱呱啦啦，很吵喔！晚上邊打牌邊聊天，不然就是講出莫名其妙的髒話。媽媽和阿姨們聚會或平常在家時，常常用手機聽印尼歌，也會要我們從網路 google、youtube 幫她

下載歌曲，因為我們看不懂印尼文，所以我們都會打上印尼歌這三個字，或是叫媽媽來 key，然後再選擇她要的歌曲，之前也有聽、看過媽媽的唱片，發現印尼歌的發音真的很奇怪，都有一種很妙的感覺，聽起來很像英文，可是它偏偏就是不是英文，真是很怪！所以我們平常其實不會特別去聽印尼歌，也不太會加入媽媽和其他阿姨的活動。

在找歌的過程中，無意中連結到印尼的 MV，發現它很特別，跟台灣拍的不一樣，台灣拍的 MV 很奇怪，就是愛情的，可是印尼他們的影片就是有包含愛情、友情，一堆雜七雜八的東西，比較寫實。前一陣子公視有播一部有關印尼的連續劇，描寫關於青春、愛情、友情、親情那一類的，比台灣好看多了，印尼其實也有比台灣還不錯的地方。

2. 對雙國家人與文化的新理解與認同

爸爸是一個非常安靜的人，平常跟他講什麼話大部分就回答欸、啊，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很少話，要不然就是講話問到一點點，他就講出一句話，然後就沒了就繼續欸到底，但只要一喝酒他的話就超多，人生大道理講 10 幾分鐘都還講不完喔！我們三個人很少跟爸爸講話，他也不會主動跟我們講話，除非有重要的事情，不然就是要到田裡工作時，會跟我們說一下。因為工作的關係，爸爸帶我們出去玩的機會很少，所以我們都是透過學校課程、校外教學旅遊或電視上的介紹，來認識台灣文化。台灣也就那幾個節日，自然而然時間到了，或看月曆就知道要做什麼了。我們家所信仰的宗教有二種，爸爸和阿嬤這邊的家人是民間宗教，有拿香拜拜的，媽媽是信奉基督教，我和大弟也會參與教會的活動。有時候家裡拜拜時，比較特別的也會說一下，像前一陣子好像是 10 月還是 11 月那個時候，媽祖到我們家作客，我就坐在那邊，不知道幹嘛，阿嬤就會說今天要拜誰，要怎麼拜，我就跟著拿香拜拜，久了好像應該也知道是誰了吧！

因為對媽媽國家好奇，所以有時候會問媽媽一些問題，像過年就會問她說印尼那邊有沒有過年，知道好像跟我們這邊差不多，一樣是穿新衣服到處亂晃、放煙火，但好像沒有拜拜這個習俗；看到榴槤，就會問媽媽說妳們那邊有種榴槤嗎？那邊榴槤好不好吃？然後她就說晚上不要去偷榴槤，不然被砸到就會死掉；看到電視、報紙上常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島名，好像是爪哇島之類的，然後就看下面標印尼兩個字，就問媽媽是不是住這邊，媽媽就說不是，是住哪裡…，諸如此類的，就感覺還蠻有趣的。

阿嬤和媽媽的衝突情況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太大的改變，因為我和大弟成績沒有很好，阿嬤就看別人家，不然就從別人家聽來的，就講說別人家很好啊，讀上什麼好學校啊，其實事實上也是爛學校而已，她只是把他想像的非常非常好而已，不然就是說別人家裡讀大學，然後你們現在只有讀高中，一開始聽到就很無奈，我就很想跟她講說我最好這麼快可以晉級到大學啦！後來就轉個方向想說，反正又不關我們家的事情就不想理它，她就永遠什麼都最好吧，還有聽到什麼東西都最好吧，就是沒主見。

因為阿嬤會這樣比較，而且爸爸媽媽的學歷不高，生活得很辛苦，我覺得他們是看重我們書讀完再去工作就好了，所以我會想大學讀完去工作，因為現在社會就是學歷比較高錢比較多。而大弟的想法卻和我不一樣，因為媽媽很容易被人家瞧不起，全部的人就看她說印尼窮嘛，就是有這樣的觀念，且媽媽現在餐廳的工作每個月薪水才一萬多而已，小時候沒有能力，現在他想高職讀完，學到一技之長就馬上去工作，他甚至說乾脆高職也不要讀完就直接去工作就好了，他想要讓媽媽過好日子。

(五)、定位：待開發的雙文化認同

在台灣生活習慣了，我們其實一點都不會想去印尼，因為去那邊語言不通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完全不會講印尼話，如果迷路就完了，再者，對於那邊的家人也都不熟悉，飲食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吃不慣印尼又辣、又酸、又鹹的食物。

即使如此，我不會對這份血緣感覺到很丟臉，現在聽到別人說「印尼來的喔，外籍新娘生的」，我就會說對啊怎樣，比你行比你好多了怎樣，就多了這個血緣，我就比你好多了，總比不是平埔族加混中國的來得好，我比你混的更多怎樣，中國的血洗掉啦，就一副很無聊的對話。然後就說你們說印尼文化很不好嗎，不會好不好，比你們台灣好多了，意思就是說顛覆你的想像，你也沒有那麼差啊，其實你也很好好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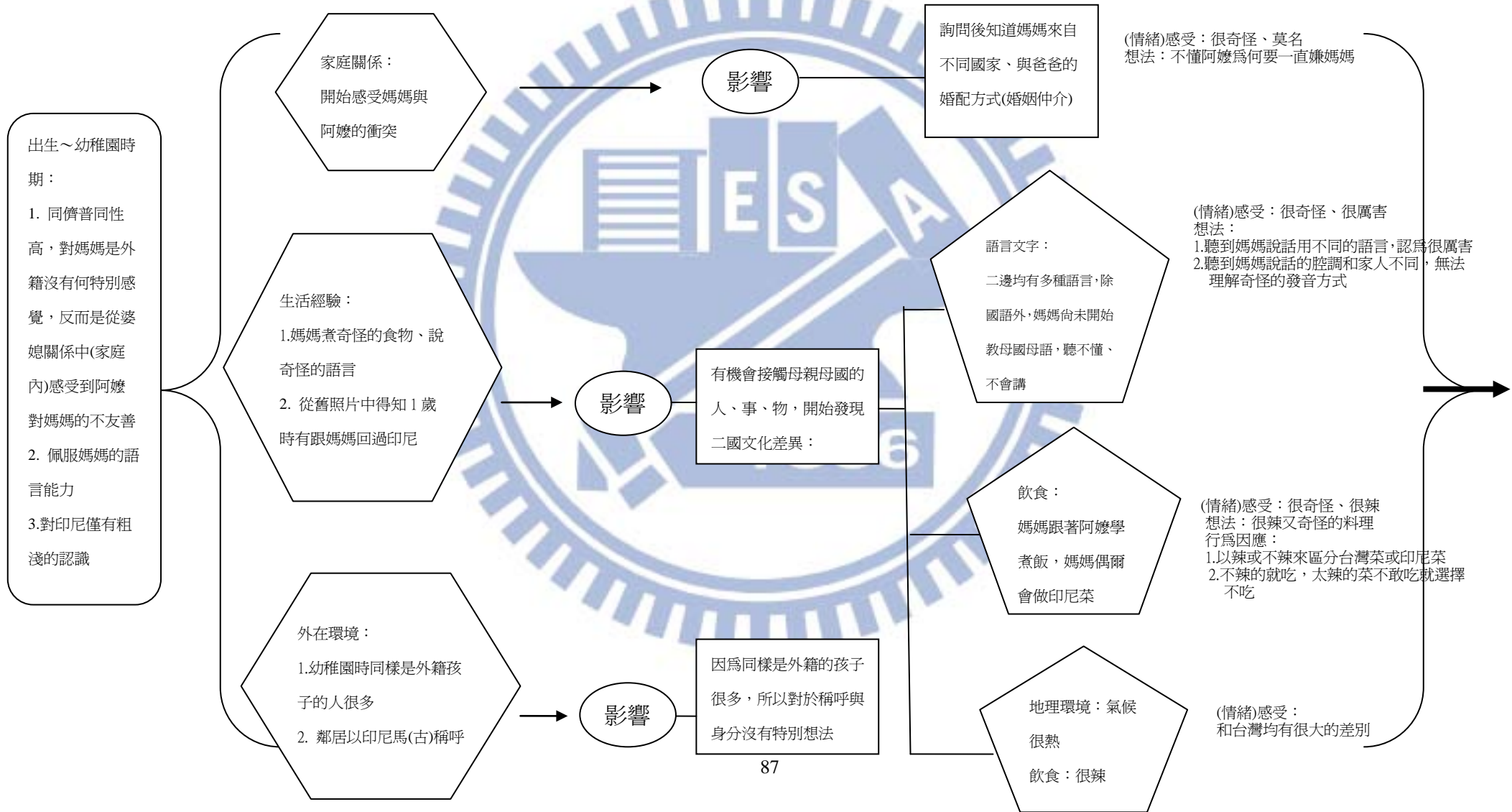
其實我跟大弟兩個人從小就蠻獨立的，應該也是家庭因素的關係，不獨立很難生活。因為每次不是別人家中傷我們，不然就是看不起我們，所以從小就會跟自己說，凡事不能依賴別人，要獨立、心智要成熟一點，要乖不要怎樣、不要做怎樣，要比他們還要好，就是要做的比他們好。現在想起來，要能這樣做的確很難，因為如果有一個人就是長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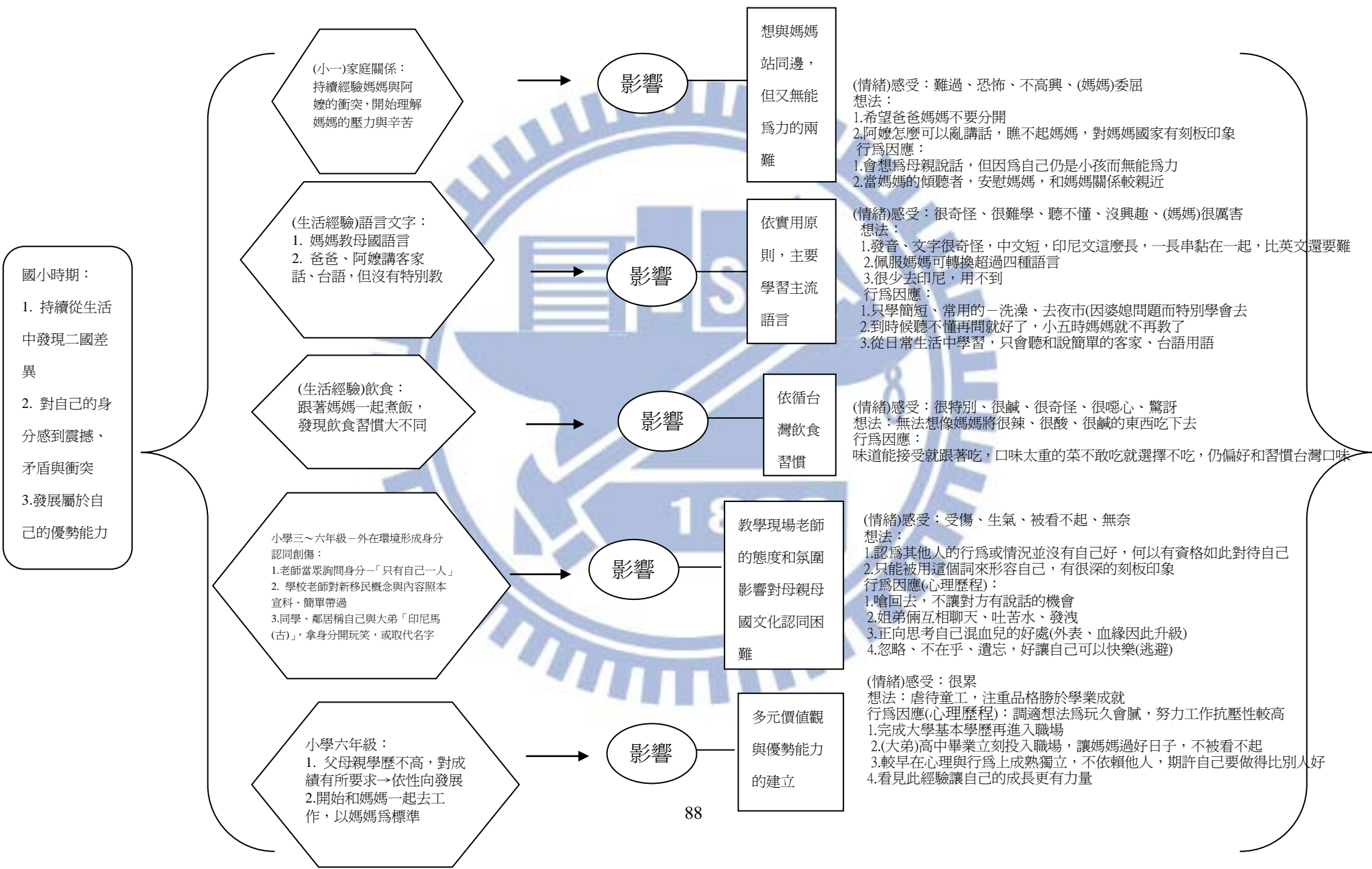
的中傷你，要能做到這樣其實也蠻難的，感覺還蠻不可思議的，可以熬過這一切，可以活到那麼大的歲數，很謝謝他們攻擊我們，我們才可以成長變得比他們還要成熟。

我覺得印尼的文化是一個未開發地區，因為沒去過也沒有認識過，只有從媽媽的口述中認識，生活在台灣其實都習慣了，說實在話台灣是比較好，但是畢竟那也是媽媽的家，所以就是蠻想去看看的，也覺得值得去認識它、開發它。



四、尋找另一片天歷程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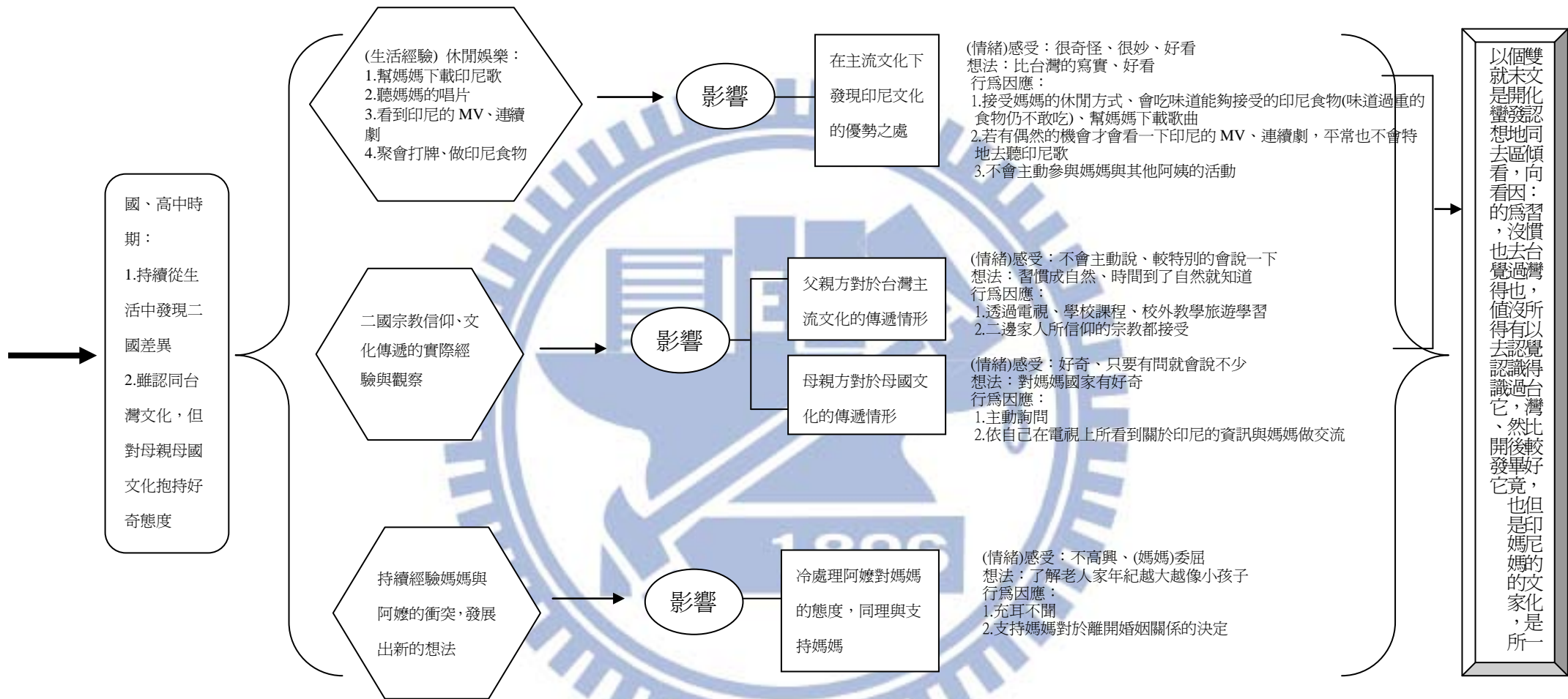


圖 4-3、尋找另一片天雙文化認同歷程發展圖

五、不一樣的我故事文本

「不一樣的我」是我為這篇故事取的名字，我覺得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但是我這個不一樣的身分，有時候讓我覺得蠻光榮的，有時候卻也讓我覺得很羞愧。對於能夠身為台灣人我感到很榮幸，但如果有人用異樣的眼光指指點點，就會提醒我說還有一半是印尼的血統，被認為外籍配偶生的孩子是不好的感覺，就會覺得這樣和別人不一樣的雙重身分很丟臉…

(一)、故事源起

我出生於高雄美濃，一個純樸的鄉鎮，一個和別人「不一樣」的家庭，這個「不一樣」來自於爸爸和媽媽二個不同國家的結合，也帶給我一段很「不一樣」的生活經驗。

關於爸爸是如何與不是台灣籍的媽媽結婚的，我印象有點模糊，印象中好像曾經聽大人們提到，在政府單位擔任清潔人員的爸爸，十八年前，在一次印尼旅遊中與媽媽相識而交往，於是媽媽就從印尼跨海嫁到台灣來。爸媽結婚不久後，我就出生了，是家中的老大，現在就讀高職護理科二年級，2年後又生了弟弟，現在就讀國三，所以我們家總共有阿公、阿嬤、爸爸、媽媽、弟弟和我6個人。

(二)、幼稚園～國小時期：平常中的特別

1. 特別的語言與印尼家人

從小在台灣的家裡，會聽到很多不同的語言，爸爸、我和弟弟大都講國語，阿公、阿嬤主要講客家話，爸爸、媽媽偶爾也會跟阿公、阿嬤講客家話，媽媽和我們講話時雖然用國語，但是當她講電話，或是和其他家阿姨講話時，常常講了一下就換成好幾種我不曾聽過的話，一整個都聽不懂，當時的我只覺得奇怪，怎麼媽媽講的話有時候和家人講的不一樣，但小孩子只知道玩，所以當時就沒有特別去問什麼。

當時我還小，媽媽沒有外出工作，主要照顧我，和我們相處的時間很多。看著我小時候的照片，我回憶起3~6歲的時候，有二次和爸爸媽媽一起出國回媽媽娘家，我想我大概在那時候知道媽媽是來自台灣以外的國家。回去印尼家裡，媽媽跟我說到外婆生了10個孩子，5個男的5個女的，所以印尼那邊的家人有四個阿姨和五個舅舅，以及他們所生下來的眾多表兄弟姐妹，人數非常多。原來，常常在電話那端與媽媽說話，一講就講超久，1個小時以上，讓媽媽一下說奇怪腔調的客家話，一下又換成印尼話，一下又換成廣東話的人，都是媽媽印尼這邊的家人。國小一、二年級的時候，媽媽常帶我們跟她的朋友們(其他家阿姨)的小孩一起玩，在她們的聊天中講到她是來自印尼，我當時年紀還小，而且那時候和媽媽同一時間從外國嫁來台灣的人很多，從小在我認識的人當中，很多都是外籍媽媽的小孩，幼稚園時和我同樣是外籍媽媽孩子的人也很多，我也因為回去過媽媽娘家，所以聽到的時候感覺很平常，沒什麼。

從幼稚園到國小上學開始，學校主要教國語、英文，平常我們說話主要是用國語，阿公、阿嬤雖然講客家話，但是他們並沒有特別教我們講，因為常常聽阿公、阿嬤講，勉強會聽和說一點簡單的，太難的就不行了。媽媽在這個時候也有開始慢慢教我們印尼語，我也看過媽媽寫的信，但覺得印尼的發音和文字很奇怪，中文才幾個字，怎麼印尼用的文字就很長一排，一長串黏在一起，像英文又不是英文，因為實在太難學了，所以只知道「謝謝」而已，聽到或看到很長很長的時候就沒辦法了。

2. 特別的飲食

媽媽剛嫁過來的時候，阿嬤都會教她煮台灣口味的菜，偶爾去其他家阿姨的家裡玩，或平常在家心血來潮時，媽媽就會買材料來做印尼菜，看媽媽和阿姨們做菜，我才知道說印尼人都很會做菜，原來媽媽還沒嫁過來時就很會做菜，只是因為印尼和台灣飲食習慣不同，來台灣就要學習適應這邊的環境，所以阿嬤才要教媽媽。我們雖然會跟著吃，但印尼的食物很辣、很酸、很鹹，還有媽媽都會拿印尼醬油拌飯來吃，飯是甜的帶點鹹鹹的，很奇怪也很特別，剛開始我每次看到

印尼的東西就都不太敢吃，像媽媽有時候心血來潮，突然有材料，她就會把前面有兩個鬍鬚的鱈魚，把它通通剁來做咖哩鱈魚，我不知道她為什麼要做這種奇怪的東西，然後又酸又辣根本就不敢碰啊！後來就挑味道能接受的吃，口味太重的菜不敢吃就會選擇不吃。

媽媽生完弟弟後，就開始到外面去工作，由於媽媽工作時間的關係，所以阿嬤和媽媽會輪流煮飯，有時候阿嬤會於媽媽不在時，就會問我說：「阿嬤煮得很好吃對不對，有沒有比媽媽的好吃？」，有時候媽媽也會說：「我煮的好吃，比阿嬤好吃」，兩個人有時候就會爭這個。小時候不知道她們為什麼要這樣問，慢慢長大後知道她們都想要得到我們的認同，所以我都會回答好吃，她們就都很開心。

3. 大相逕庭但彼此尊重的生活環境

小時候二次到訪印尼，因為語言不通，就很少和那邊的家人說話，且我看到「美少女戰士」卡通都會很開心，字幕看不懂、說話聽不懂也沒關係，只要有聲音就好，所以很多時間都待在家裡看卡通。對印尼印象最深刻的是氣候很熱，在那邊洗澡、洗衣服只能洗冰水，如果要洗熱水就要自己燒，是很大的痛苦，不像在台灣洗澡洗熱水，熱水的取得也很方便，還有當地的人大多都是騎腳踏車或三輪車，不像台灣有很多摩托車或汽車，非常不一樣，所以很不習慣。

媽媽與台灣家人間的相處算和平，阿公、阿嬤與爸爸、媽媽的宗教信仰不同，頂多會因為他們常去教會做禮拜，唸說又要去教會了，教會有什麼好的，就是去那邊吃飯的等等，其他沒有太多的爭執。爸爸還有台灣這邊的家人對媽媽的態度都很好，都是尊重媽媽的，不會因為她是印尼的身分而輕視她，也因為我的外表看不太出來和其他人有何不同，印象中好像沒幾個人知道我是混血外籍，所以童年生活對我來說是快樂的。當時我很佩服媽媽自己一個人隻身來到台灣，說話、飲食、宗教都不一樣，還能夠和阿公、阿嬤相處得很好，希望我之後嫁人了也能夠和媽媽一樣，跟對方的家人相處的如此融洽。

(三)、國中時期：混血兒的美麗與哀愁

1. 雙國文化共融的美麗時光

上了國中，我開始會幫忙媽媽做菜，因為小時候對印尼食物的重口味印象深刻，和媽媽一起做菜時都會跟她說不要這麼酸和辣，她都會聽我的意見來做，久而久之我們家裡在吃的方面，也慢慢習慣在台灣口味中，融入有些許印尼風味的飲食。由於媽媽是跟很多阿姨們同時一起來的，所以她們感情很好，小的時候，媽媽就經常帶著我們到阿姨家串門子，我們越來越長大，她們也越來越常有時間聚在一起，有時候坐我家，有時候到別的阿姨家，我常常可以看到她們一聚起來就在那邊呱呱啦啦，說一些我們都聽不懂的話，說得很開心，一起打牌、聽印尼歌曲、做印尼的東西來吃，都是她們聊天休閒的方式。我們小孩子都會玩我們自己的，偶爾會吃一下媽媽和阿姨們做的，口味可以接受的印尼菜，也有機會吃到印尼的泡麵，小包包裝，拌醬是甜甜的，很特別，跟台灣的不一樣，覺得很好吃。

2. 身分被迫揭露後的哀愁

然而，在快樂的時光中，總是會有一些令人意外的小插曲，國一的時候，有一次我們老師要調查班上外籍小孩的人數，就在班上很大聲地直接問說：「我們班有誰是外籍生？」，我本來想說我私底下再去找老師說我是，結果她立刻說：「○○妳不是好像是嗎？」，那時候我就站起來，然後叫我下課去找他。很巧的是，當時班上就只有我一個人，當老師這麼問的時候，全班同學就用那個很奇怪的眼神看著我，我的身分就在那一瞬間被大家知道，我當下就有一種很自卑的感覺。

在這件事情發生後，我的身分很快地被傳開來，後來有些同學、朋友、鄰居很幼稚，尤其是男生，有時候突然講到我，就會開我玩笑叫我「印尼馬」，或是玩遊戲時故意說：「不要碰我，妳這個印尼人」之類的，出現嫌惡的表情，當時就會有一種被瞧不起的感覺，心裡面會很受傷，感覺丟臉自卑，也會感到很生氣，會覺得他們也有被其他人排擠，憑什麼這樣子講我，看到、想到他們的嘴臉就有一股氣想扁下去。自從被這樣講之後就覺得外籍的有這麼討人厭嗎？當時心裡面就有一連串的疑問，一直不斷地問自己：「為什麼我是混血兒？為什麼我是外籍

的小孩?為什麼他們不可置信?為什麼他們要嘲笑我?」，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很多的為什麼，會覺得他們也有被排擠吧，他們有什麼資格可以講我們，就會變得有點怨天尤人，想要逃避這種身分。

我爸爸、媽媽的學歷不高，爸爸是高中，媽媽是國中，他們對我其實蠻嚴格的，從小就會要求我要念書，不要跟別的五四三的朋友走來走去，希望我不要比別人差。我國小階段都在玩，成績很爛，尤其是數學，有一次爸爸就看到我成績單，然後他就叫我跪著，睡前禱告跟上帝懺悔之類的，那時候開始對爸爸就感覺有點恐懼。後來國中階段也在混，我國一很好，國二、國三因為國一全部都不知道，就覺得好害怕，墮落了一個月。有時候我媽會說妳看那誰考得超好，每次考不好都會說我有補習，然後我弟也有補習，為什麼我補習還是這種成績，要努力一點，但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覺得很煩，別人這樣講我的身分，而且國中課業很重，那些東西我都不喜歡，反正就是還不想念書，所以就會覺得無所謂。

因為想逃避自己的身分，所以對於這些事情，我大都是悶在心裡不會講，如果想講的話，也只會找家人說，但講出來也不太可能激勵多少，因為現況就是這樣，家人知道了也不能改變什麼，所以慢慢就告訴自己說不要講，這種中傷的事情不要講太多比較好，就會想說悶在心裡一下，自然會隨著時間慢慢淡忘。但有時候不經意想起來時還是會難過，當我難過時，我就會找開心的事情去做，和好朋友在一起玩，盡量不要去想它。

(四)、高中時期：轉念與蛻變

1. 創傷經驗再現後正向思考

好不容易藏好自己不想提的身分一事，高一時，有一次我跟幾個女生同學圍在一起，每人分享自己曾經去過什麼國家，有一個人問到我，我就說有啊我出過國，那時候那一群同學中只有我出過國，她們就好奇問說我去過哪裡，我那時候覺得印尼就是一個台灣以外的國家，說出來應該不會怎麼樣，我就說我去過印尼，然後她們就大笑，並且說以為我講出來的會是日本、美國之類的國家。當下我很

不解的是「印尼」有錯嗎?當她們說出日本、美國時，我感受到有一種被比較的感覺。

那個時候我情緒有一點不爽，我的臉隨著她們的笑聲沉了下來，受傷、難過的感覺又捲土重來，當下我跟她們說小時候曾經受過傷害，不要這樣歧視我，後來她們雖然有跟我道歉，但我仍舊不解的是印尼就是低賤的國家嗎?不知道他們為什麼到現在還這麼認為。再一次發生這樣的事情，雖然心裡很難過，但我仍就會找開心的事情去做，和朋友在一起玩，盡量不要去想它，就讓時間沖淡一切。後來我就在心裡告訴自己，我媽媽這麼好也不會覺得很丟臉，這個身分就這個身分，我也不能怎麼樣啊，就好好做自己就好。

同年我和媽媽、弟弟回印尼幫外婆祝壽的時候，第一次到印尼使用印尼鈔票，每次拿出去都好多張，動不動就一萬、一萬多，快被嚇死了，可當時拿好多錢在手上卻也感覺好爽，但後來媽媽跟我說這才沒有幾百塊，「幾百塊」好可憐的數字，我才知道跟台灣比起來，印尼那邊的鈔票很小。從那時候開始，我覺得媽媽賺錢很辛苦，她做的是看護工作，班常常都不穩定，因為我現在念的是私立學校，學費比較多，我不想讓我爸爸、媽媽負擔太重，花那麼多錢，看到媽媽這麼辛苦，更覺得媽媽很好，所以就告訴自己護理的專業科目很重要，要振作好好的學習，要努力的給它學好，這樣就可以比人家好一點。現在想趕快考到執照去工作，趕快把第一份薪水給媽媽，只想快點獨立，也期待自己要比其他在溫室裡面長大的花朵來得好得多。

2. 再訪印尼依舊生疏

第三次到訪印尼，從參與外婆的祝壽活動中，發現印尼那邊替愈年長的人過生日，就會辦得越盛大，像請客一樣，我們這邊阿公、阿嬤生日都很少在請，甚至不知道，就只有父親節和母親節會跟阿公、阿嬤說父親節、母親節快樂，送一朵花什麼的就這樣，不然就買個蛋糕一起慶祝，生日的話就一個小蛋糕唱生日快樂歌，沒有像印尼那麼隆重。平常媽媽有時候想到就會跟我們說那邊家人的近況，像是阿姨或舅舅結婚、生小孩等這些事情，而且也會要我加幾個阿姨的facebook，

共同分享她們上傳的照片，每次講到這個她都很開心，從這次過程中我也感受到媽媽和她家裡的人感情都很好，讓我有一個印尼的家庭相處都超好的圖像。

那一次回去，媽媽也有跟我說印尼其實還蠻多元化的，我在那裡聽到他們有說印尼話、客語、閩南話，甚至英文也有，但對我而言，除了國語外，其他語言都不太會講。還記得我當時去印尼電影院看了一部貓狗大戰 2 的電影，電影的發音是英文，可是出現的字幕是印尼話，因為畫面還蠻好笑的，所以還能看畫面聯想，但完全聽不懂啊！心裡想這是什麼世界，看也看不懂，聽也聽不懂，說話整個黏在一起。因為語言還是不通，所以我回去印尼就很少跟那邊的家人說話，如果要說話，都是透過媽媽幫我做翻譯，媽媽會跟我說印尼的家人講什麼，然後我再請媽媽翻譯我的回應，所以感覺很無聊，每天都不知道做什麼，電視也看不懂，也沒有電腦，度日如年，我跟我弟都快發瘋了，我們只能湊在一起玩牌。有一次舅舅有帶我們去附近遊樂園的鬼屋玩，可是好爛，沒什麼，一點都不可怕，就會很想回來台灣。

(五)、定位：雙國文化的認同選擇

除了可以到印尼認識媽媽的國家外，爸爸很常在暑假寒假、過年的時候帶我們出去玩，北中南都有，可是都很無聊，也沒有介紹什麼，因為我爸不知道怎麼玩，他只會開到一個定點之後走一走，然後再開到下一個定點，他很少聽人家的意見，有點大男人主義，有時候我們跟他出去就會覺得不是很開心。因此，台灣的節慶、文化多是從電視或學校知道什麼節慶該做什麼事，像過年領紅包、清明掃墓、端午吃粽子、中秋節烤肉啊，台灣就幾個節慶，平常都在過，到了這個時間點就過，都已經很習慣了。

媽媽在台灣很少跟我們提到印尼的文化，我想如果我們主動問，她應該會講，但我們連問都不想問，因為太麻煩啦，知道也不能說什麼啊！我不太了解印尼或其他國家的節慶活動，比較熟悉的是泰國著名的潑水節，台灣有些地方會舉辦泰國北部很盛行的潑水節活動，但在南部幾乎很少看到，我覺得就算到了這邊還不

是一樣沒有什麼用，因為大家常常都在說要節約用水，所以你噴水人家會說你浪費水。

因為生活在台灣被同化了，更由於不常接觸，然後也不常用，所以就覺得對印尼那邊的語言、文字、音樂等，甚至家人都很生疏。像前幾天我媽不知道在看我那一個阿姨結婚，他們會寄光碟過來，然後我媽都會很興奮一直叫我們趕快來看，有時候我就覺得很無聊不想看，因為我都不認識，她就自己一個人去看。她也會要我上網路的 google、youtube 幫她下載聽起來很像英文，可是它偏偏就不是英文，而是很奇怪的印尼歌，我會幫她下載，但我並不會特別去聽。

飲食上雖然可以吃到和台灣不同口味的東西，但我並不會因為這樣而感到開心，每當我被問到吃不一樣食物的感覺時，我知道同學們會這樣問並沒有惡意也只是好奇，可是當下心裡就會有不喜歡的感覺出現，不喜歡太多人問我這種問題的感覺，又會讓我想起別人看我的眼光。其實就只是說偶爾可以吃到比較新奇、道地的東西，就很習以為常，沒有特別偏好，沒有不一樣，也沒什麼特別的感覺。我不會討厭媽媽國家的文化，都可以接受，但也不到喜歡的程度，因為在台灣土生土長，已經熟悉、習慣台灣的習俗文化了，對台灣的認識、感覺比較深，如果印尼跟台灣讓我選，我會選擇台灣。但這並不是說印尼不好，其實媽媽本身很好，印尼國家和文化也沒有什麼不好，一直以來，都是因為別人的關係，在別人的眼中，媽媽是從印尼來的，我是印尼媽媽生下來的小孩，我們被認為是不好的。因為我是生活在台灣，還是比較喜歡台灣，覺得台灣比較好，認定自己就是台灣人。

(六)、後言：內在的聲音

這篇故事的名字我會把它稱為「不一樣的我」，是因為我覺得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但是礙於我的身分有印尼和台灣人，這個不一樣的分身，有時候讓我覺得蠻光榮的，有時候卻也讓我覺得很羞愧。羞愧來源是小時候的那種眼光，讓我覺得大家都會感覺外籍配偶生的是不好的那種感覺，就會在意別人說是不是這個身分不好。現在是平常沒有怎麼樣的話不會覺得羞愧，對於能夠身為台灣人我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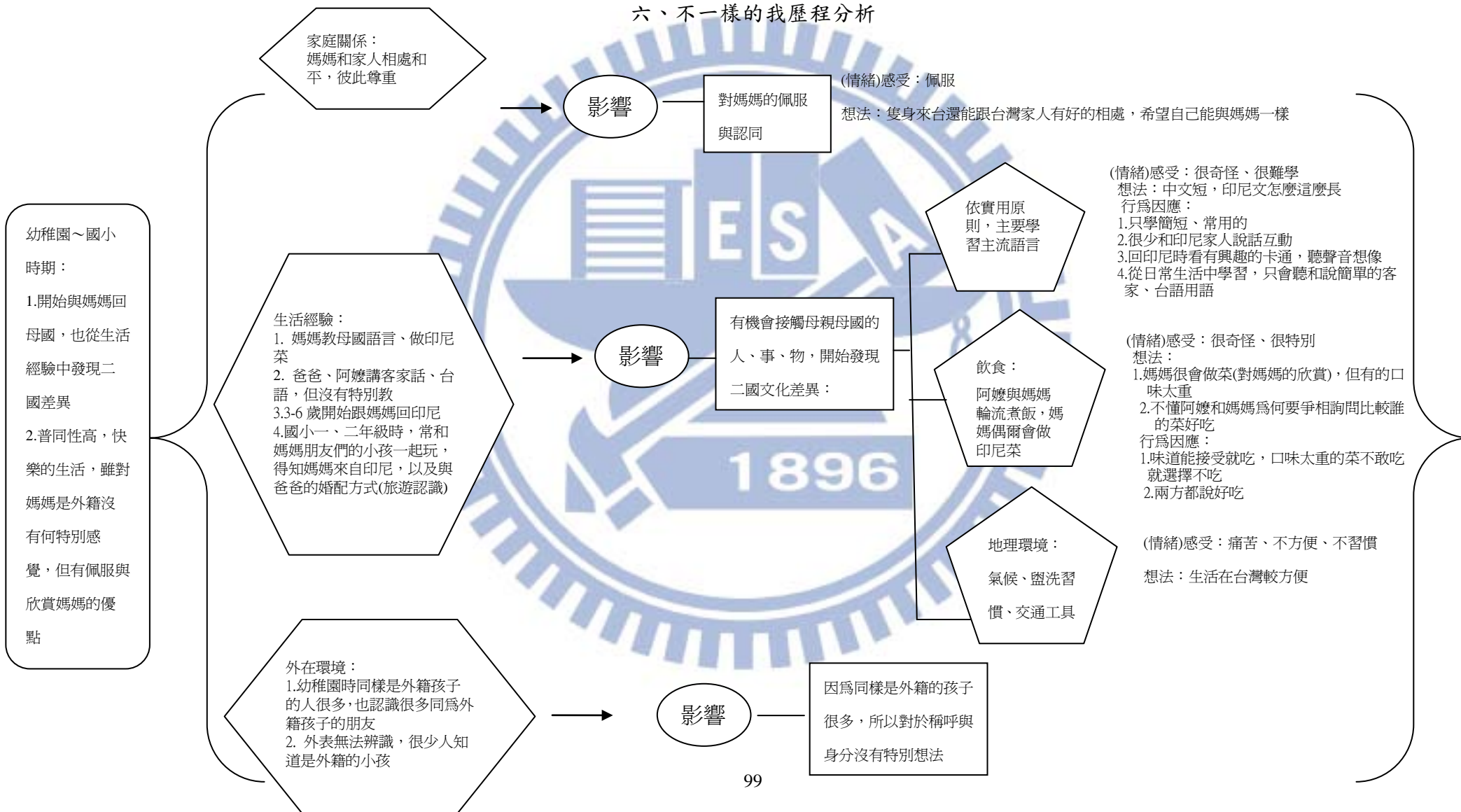
到很榮幸，但有時候別人用異樣的眼光跟語氣指指點點的時候，有這樣子的雙重身分就會提醒我說還有一半是印尼的血統，被認為外籍配偶生的孩子是不好的感覺，就會覺得很丟臉，還是會覺得很羞愧，所以這二種感覺都會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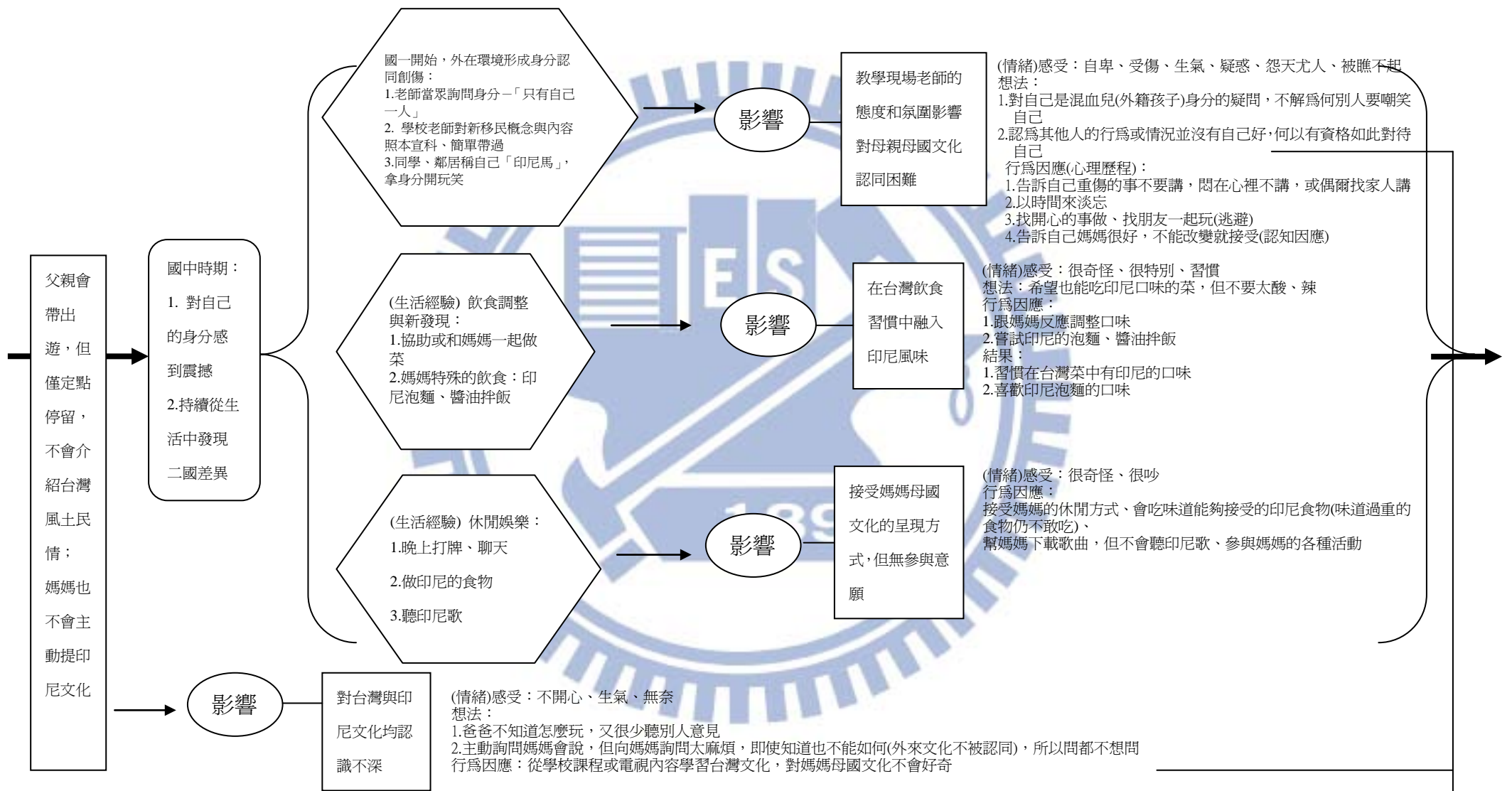
現在回想起當時國小社會課本裡新移民概念的教導，我沒有什麼記憶，印象中老師只有提到現在台灣娶外面的人愈來愈多，然後還有她們會去學習什麼課程，講這樣子就帶過了，講完就帶過換下一頁，就很簡單的照課本講，課本寫什麼，他就講什麼，直接照課本念過去。我覺得不是因為媽媽本身的身分帶給我們覺得不好，都是因為別人的關係，是他們為什麼會覺得我是印尼媽媽生下來的小孩，用這樣的身分來看我。

這個「不一樣」陪伴了我走過十八個年頭，未來將會以「比溫室裡的花朵長得好」的信念繼續陪我走下去。



六、不一樣的我歷程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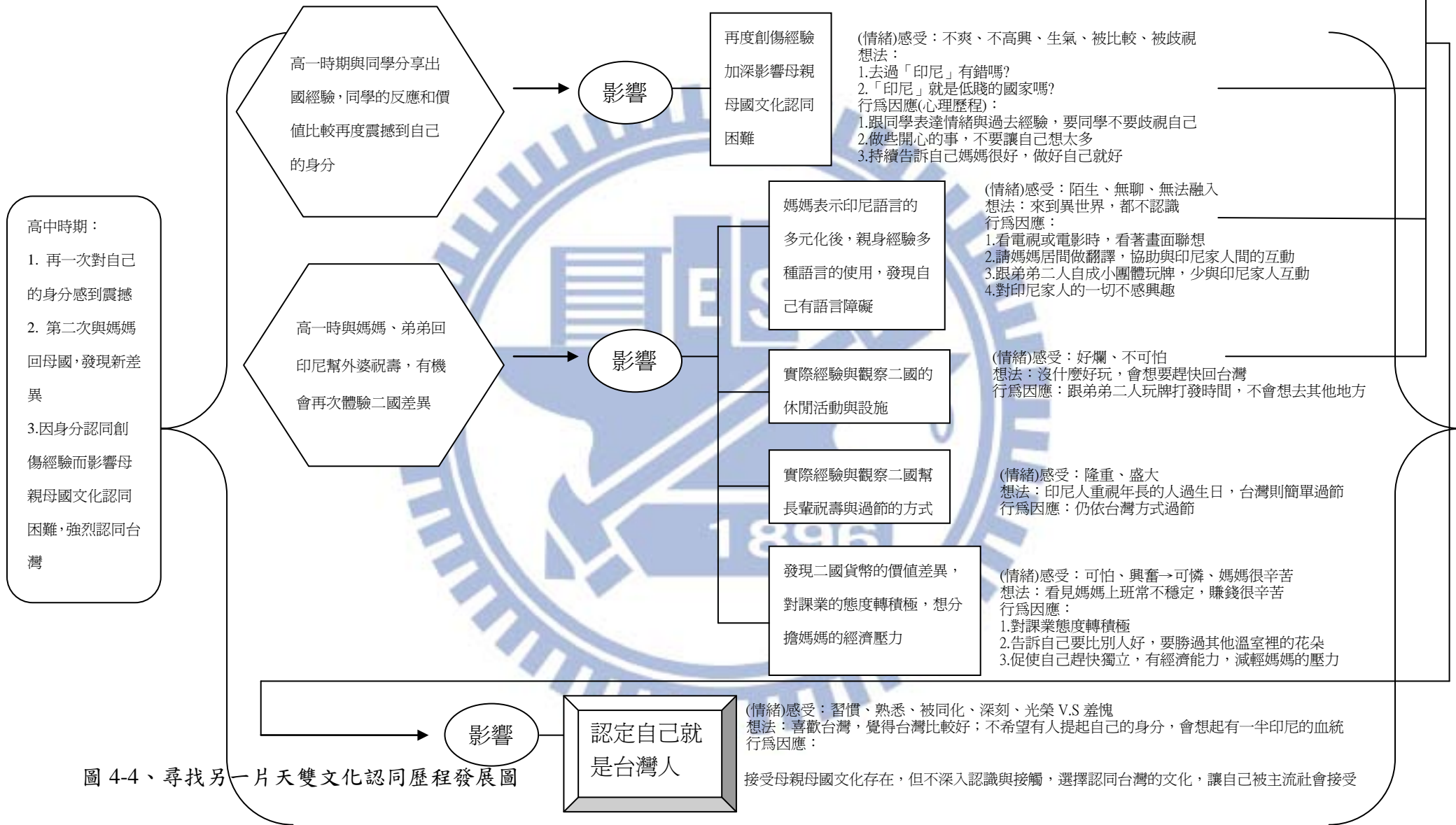


圖 4-4、尋找另一片天雙文化認同歷程發展圖

第二節、敘事文本分析

本節依據故事文本與歷程分析圖，以「整體－內容」的分析方式分析三位新台灣之子的生命故事，了解其對生命歷程中的事件、經驗及社會文化脈絡之主觀詮釋，並以「類別－內容」的分析方式分析認同在時間流動裡的心理歷程，用整體、脈絡、循環建構及互為主體的觀點進行敘事資料分析。

壹、新台灣之子在母親母國及父親台灣社會主流文化間之生活經驗

一、我們這一家：外國媽媽在我家

家庭是孩子最早產生經驗的地方，故事中三位主角最初的主要照顧者均為新移民母親：

「由於爸爸經常出國，小時候他都把我們交給媽媽照顧照顧」(I1-2-020)

「媽媽因為第一年嫁來，第二年就生了我，第三、四年就懷了我們家老弟，前幾年因為懷孕和照顧我們不能出去工作，然後好像是第六、七年之後才開始工作」(I2-2-065)

「當時我還小，媽媽沒有外出工作，主要照顧我，我也不知道她從什麼時候開始工作，可能是生完我弟弟吧」(I3-2-098)

透過家庭生活朝夕相處的過程中，他們開始發現媽媽與其他家人的差異之處，從好奇中知悉媽媽非台灣籍的身分，從特別中油然而生對媽媽的佩服，以及從家庭氛圍中認知到媽媽在家庭中的位置。

(一)、我與外國媽媽的初次相遇

1、媽媽講著和家人不一樣的話

「語言」是讓我們學習了解他人與表達自己的重要工具，當我們從襁褓中只會由哭、笑來表達情緒的嬰兒逐漸長大，我們開始跟大人們學習說話，用他們慣用的語言來和他們互動，認識這個世界。尋找另一片天和不一樣的我，從小在家裡日常生活中，經驗到媽媽有時說話的腔調、用語和其他家人很不一樣，令他們

聽不懂，在他們的心中於是開始產生一種很奇怪的感覺：

「我們平常和爸爸媽媽講國語，跟阿嬤講客家話，偶爾講台語。應該在我幼稚園那個時候，媽媽講電話時會講一些莫名其妙的語言」(I2-1-074、I2-2-031)

「媽媽說客語的語調就是尾音拉高音、蹺很大，一直不解為什麼要拉高音，要不然就是很低沉，例如講說你好一般不就是你好嗎，她就是你好那個好為什麼要加強口氣，就是尾音的部分都會加，就是念很長的時候就會溝低溝低溝低」(I4-1-048)

「還有另一種從沒聽過的話，它的發音每句話後面就會出現很像古，要不然就是魯這兩個音，講什麼都古，真的很奇怪」(I4-1-051)

「在家裡，爸爸、我和弟弟大都講國語，阿公、阿嬤主要講客家話，爸爸、媽媽偶爾也會跟阿公、阿嬤講客家話，媽媽和我們講話時雖然用國語，但是當她講電話，或是和其他家阿姨講話時，常常講了一下就換成好幾種我不曾聽過的話，一整個都聽不懂，當時的我覺得奇怪，怎麼媽媽講的話有時候和家人講的不一樣」(I3-2-054、I3-2-059)

不同於尋找另一片天和不一樣的我，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的媽媽，由於來台灣時就已經會講華語了，也可以和阿嬤講客家話，和爸爸講大陸的廣東方言，所以對他來說，在台灣的生活，就沒有特別奇怪的感覺出現，反而是跟媽媽回到馬國後，聽到媽媽跟馬國的親人說自己聽不懂的話，而感到有明顯的差別：

「剛開始回去的時候，媽咪和那邊的親人都講馬來語比較多，我一句話也聽不懂」(I1-1-035)

雖然馬國的家人會用華語和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說話，但出了家門以外，因為馬來當地人或印度人商家不會說華語，處處都需要媽媽的協助，感覺生活上非常不方便：

「後來他們會跟我說華語，但出了家門以外的地方，很多商家不是華人，而是馬來當地人或印度人，如果我說華語或用比的他們都還是不了解的話，需要靠家人的協助，覺得很不方便」(I1-1-035)

2、南洋風味飲食初體驗

除了奇怪的語言以外，三位新台灣之子也因無意間吃到和台灣不一樣口味的飲食，再度令他們感覺到媽媽和其他家人不一樣之處。

(1)、令人不敢碰的食物

尋找另一片天和不一樣的我，在他們上幼稚園階段，因著媽媽心血來潮或與其他家阿姨們的聚會，而有機會品嚐到印尼當地的食物，但結果不僅無法接受，更讓奇怪的感覺加深一層：

「幼稚園那個時候，有時候媽媽就會煮一些奇奇怪怪的料理」(I2-2-031)

「因為我媽跟很多人同時一起來，所以他們一聚起來就在那邊呱呱啦啦，不然就是一直做印尼的東西，我每次看到印尼的東西就都不敢吃，覺得很辣」(I2-1-102)

「我媽媽有時候心血來潮，突然有材料她就會做，就是妳知道那個鱸魚嗎？就是前面有兩個鬍鬚那種魚，她就把它通通剝來做咖哩鱸魚，我不知道她為什麼要做這種奇怪的東西，然後又酸又辣根本就不敢碰啊！」(I3-2-092)

對他們而言，因媽媽的飲食與家中慣有的口味相差太大，所以不一樣的我較偏好台灣的飲食習慣，或者像尋找另一片天選擇自己可以接受的食物吃：

「因為台灣的吃比較多次，媽媽是偶爾才會做印尼的，當然吃起來還是台灣的會比較習慣」(I3-2-025)

「知道哪個比較辣，那個比較不會辣，就這樣分。因為小時候不吃辣，就這樣分那個不是我們可以吃的」(I2-2-006)

(2)、愛上媽媽國家的美食

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就和他們很不一樣，他雖然覺得小時候阿嬤和姑姑所做的絞肉拌飯很好吃，但因為搬到新竹來住之後，媽媽常煮咖哩，再加上幼稚園階段常和媽媽回馬國，發現很多好吃的食物，所以就比較鍾愛媽媽國家的食物，甚至會想要因此住在馬國：

「媽媽平常在家煮咖哩，占 1/3(20%~30%)，10 天當中就有 2、3 天會煮一次」(I1-2-054)

「那邊有很多美食，台灣的辣都加辣椒，我不喜歡吃，我最喜歡吃咖哩、山竹、紅毛丹，紅毛丹很像台灣荔枝，但它比較大顆，山竹剝開來裡面的果實長得像蒜頭，榴槤我以前不敢吃，最近比較敢吃，紅毛丹和山竹在台灣沒有，我最喜歡吃山竹」(I1-1-023、I1-1-027)

「那邊吃的比較多，我會選擇去住那裡，不會選擇住這裡」(I1-1-023)

這樣奇怪和不方便的感覺，就在他們各自的心中埋下對母親與父親因二個不同國家結合，而帶來不同風俗民情的理解種子。

3、 媽媽，原來妳從國外來

多樣化的語言，以及特殊的飲食，是三位新台灣之子在家庭中最先體驗到的事物，這樣子新奇的經驗，讓尋找另一片天姐姐好奇媽媽的來頭，並加以詢問之：

「可能應該幼稚園那個時候就知道了吧，有時候媽媽就會煮一些奇奇怪怪的料理，然後就講她的事情，不然就是某一天看著我媽媽在講電話，就講一些莫名其妙的語言，問我媽媽說為什麼要講這個莫名奇妙的語言，她就說媽媽從外國來的」(I2-2-031)

不一樣的我是在媽媽與其他阿姨的聚會中得知媽媽的身分：

「也是她印尼的朋友，她那時候有跟她朋友帶小孩一起，就玩在一起，然後就一起聊天講到的」(I3-2-009)

而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則是每次有回馬國機會時，媽媽就會提及：

「從四個月的時候就會回去，幼稚園的時候，只要回馬來西亞的時候，媽媽就會說」(I1-1-063)

不論是透過何種方式得知母親與父親的異國聯姻，由於尋找另一片天和不一樣的自我，當時所處的環境同為外籍媽媽的小孩很多，同質性高，且外表與其他人並沒有明顯的差異：

「因為幼稚園的時候就是外籍的比較多」(I2-1-036)

「我們這個年齡的很多啊！我有認識也有就是蠻多人都有就是外籍喔！」(I3-1-009)

「有些人我跟他們講到有點嚇到說真的假的你看不出來，頂多只是因為我頭髮是偏比較褐色，就有點像是染髮的感覺，有人會問說我是不是染髮」(I2-1-044)

「因為外表看不出來」(I3-1-022、I4-1-030)

或者是像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覺得自己年紀那麼小就有機會出國，覺得很炫：

「比較酷。可以去別的國家玩，別人都只能待在台灣，可以炫耀」(I1-1-064~065)

三位新台灣之子雖然覺得媽媽說的奇怪的話令自己聽不懂，奇怪的飲食有些也吃不習慣，但均不會對於媽媽或自己的身分與他人不同，而有任何不舒服的感受，甚至還有一種優越感。

4、好厲害的媽媽，真是佩服

當三位新台灣之子們知道媽媽是來自國外後，聽聞著媽媽使用多種自己沒聽過也不會說的語言，觀察到媽媽有好的做菜手藝，以及媽媽能夠融入不同國別的家庭，他們開始欣賞媽媽身上所具有的獨特能力，甚至也結合卡通對外國人塑造的英雄形象，在心目中對媽媽建構起一股佩服和崇拜感。

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和尋找另一片天姐姐，因為媽媽和媽媽母國的人會講自己沒聽過的語言，而覺得媽媽很厲害：

「看到馬來西亞家人的語言能力非常好，令我刮目相看」(I1-1-035)

「媽媽好像很厲害的樣子，可能是因為講話的方式吧！然後要不然就是電視上聽太多客語、台語、國語這三種語言，又沒有教英文，然後媽媽那時候又蹦出一堆奇怪的話，就覺得很厲害」(I2-2-032)

不一樣的我則是看見媽媽的廚藝，以及一個人從國外嫁來台灣，在不熟悉生活環境的情況下，還能跟台灣家人相處融洽，由衷感到佩服並將媽媽當成是自己未來努力的方向：

「我媽媽其實還沒嫁過來就很會做菜，印尼的人都很會做菜，外婆教他的吧！」(I3-2-022)

「我很佩服媽媽自己一個人隻身來到台灣，還能夠和阿公、阿嬤相處得很好」(I3-1-059)

「希望我之後嫁人了也能夠和媽媽一樣，跟對方的家人相處的如此融洽」(I3-1-059)

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很喜歡看卡通和影集，所以想像自己有一個超能力的媽媽，也因此很崇拜媽媽的國家：

「我小時候看一部影集很喜歡俄羅斯，那時候會想說媽媽是俄羅斯來的」(I1-1-074)

「小時候有看一些卡通，都把外國人看畫得很酷、很強，在化學實驗室裡的外國人都可以打敗原生塚，像是外星人侵入地球，顯現他們的能力，以為外國人都是這樣子的」(I1-1-080)

「那時候我一直把媽媽想像成美國片裡面的警察，很會打仗的那種，特別崇拜媽媽的國家」(I1-1-079)

(二)、媽媽與台灣家人的相處

三位新台灣之子除與母親有頻繁的接觸外，也從母親與其他家人的互動中，了解父母異國聯姻的故事起源，認知到媽媽在家庭中的位置。

1、 父母自由戀愛，相敬如賓

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在幼年時，因常與媽媽回馬國，而爸爸常在大陸，自己卻生活在台灣，對於此情況的好奇詢問下，知道爸爸與媽媽不同國籍結婚的故事：

「我曾經問過爸爸為什麼他常在大陸，我和媽媽常去馬來西亞，然後又住在台灣，為什麼不住在大陸或馬來西亞，爸爸跟我說他是因為工作的關係在馬來西亞和媽媽認識的」(I1 父親對孩子小時候發問的回憶)

在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4 歲前，與在台北的祖父母同住，當時擔任全職家管的媽媽與阿嬤和姑姑相處得很好，爸爸回台灣時，也會帶著全家一起出遊，可以感受到婆媳關係融洽：

「阿嬤或姑姑會一起煮飯，媽媽會在旁邊幫忙」(I1-3-007)

「另一半是爸爸回台灣時帶我們和奶奶去玩的照片」(I1-2-008)

不一樣的我則從大人的言談中，知道父母親的結合方式也近似自由戀愛，在阿公、阿嬤與媽媽的互動中，雖偶爾因雙方的宗教信仰不同而嘮叨，但大致上仍感受到媽媽被尊重，不會因為是印尼的身分而輕視她：

「我只記我爸爸是去印尼玩，可是他也應該沒有特地去找誰吧!然後可能就看到我媽」(I3-2-003)

「爸爸的態度還有爸爸這邊家人的態度都很好，就是都是尊重媽媽的，就是不會因為他說她是印尼的身分，不會，頂多會因為他們(父母)常去教會做禮拜，唸說又要去教會了，教會有什麼好的，就是去那邊吃飯的就是了」(I3-1-059)

2、 父母越洋仲介，烽火連天

尋找另一片天從小就開始經驗到媽媽與阿嬤之間的婆媳戰爭，當阿公還在時，阿嬤會適可而止，但自從阿公過世後，阿嬤無理取鬧，找媽媽麻煩的情況就越顯嚴重：

「當初我媽來的時候我阿嬤不會講很多，就是罵一點點就沒有再罵」(I4-1-078)

「阿嬤比較難搞，差不多天天都在吵架，就是我媽沒做什麼事，阿嬤就一直嫌，找麻煩」(I4-1-002、I2-1-009)

「阿公過世之後媽媽的處境就很慘」(I4-1-079)

當時的他們無法理解阿嬤為何要如此對待媽媽，一直到長大後，他們才知道原來媽媽當初的無心之過，讓阿嬤對媽媽的印尼身分有刻板印象，認為媽媽是不好的，媽媽與阿嬤的婆媳關係衝突一直延續至今：

「就老人家就很喜歡囉哩八嗦，不是說菜沒有阿，不然就是說她身體不舒服啊，不然就是一堆小理由、小事情都也要吵，不知道為什麼啊！」(I2-1-013)

「就一直講這句話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講到我媽煩，她就是想要吃菜啊，可是明明菜還有很多，她就是偏偏一直要講，我也不知道她為什麼要講，然後不然就是講說他的兒子、女兒啊有多麼的孝順怎樣怎樣的」(I2-1-018)

「因為好像太刻板印象了吧，第一天嫁進去不就是要討好婆婆的胃嘛，她第一天就煮了印尼的東西，可想而知那有多麼的悲劇啊！她也不懂啊，哪知道台灣差那麼多」(I2-2-056)

「她就喜歡亂講話，就講別人家的不好啊，然後不然就是講媽媽那裡不好，就是別人可能也是因為一個在台灣一個在印尼吧，她就覺得說刻板印象印尼這個地方就是不好」(I2-2-057)

由本研究三位新台灣之子的幼年經驗來看，他們於初始發現到媽媽與台灣家人的不同時，均能夠看見媽媽本身所擁有的能力，或是媽媽國家的好，進而對媽媽產生一種佩服、崇拜、想和媽媽一樣的心態。且由於地域性的關係，尋找另一片天和不一樣的我，其所處的環境同儕普同性高，對於知悉媽媽是外籍以及自己是外籍媽媽所生的孩子，並沒有任何特別的感覺，尋找另一片天反而是先從家庭內阿嬤與媽媽衝突的婆媳關係中，經驗到自家人阿嬤對媽媽來自印尼的身分標籤，以及二國文化差異的評價，感受到媽媽在家庭中被輕視和不友善對待，無法獲得應有的尊重與地位。

二、雙國文化認識與學習之旅

由於新台灣之子的父母是由二國不同的文化個體所組成，因此，在他們成長過程中，父母雙方將會各自透過不同的方式來傳遞其所屬的文化，三位新台灣之子們也在當中進行了一趟接觸雙國文化的旅程。

(一)、父親方主流文化的傳承

在父親主流文化這一方，由於台灣是新台灣之子主要的生活場域，語言以國語為主，其他方言對他們三人來說並不熟悉，關於台灣的人文地理、節慶風俗等文化內涵，主要是透過學校內外的系統課程教導，由家人於日常生活教育、休閒旅遊中傳遞，或是孩子自行透過媒體、參閱日曆行事等在地自然約定成俗的方式學習。

1、只會說國語，其他台灣方言能聽少許卻無法說

因台灣的官方語言為國語，因此生活在台灣的這三位新台灣之子們，即便知道媽媽國家也有它們自己的語言，仍是以學習和使用國語為主：

「國語是學校老師教的，媽媽就是陪著我一起學ㄅㄆㄇㄏ」(I1-2-020)

「學校、電視、課本、爸爸、媽媽都會教我們國語」(I2-2-015、I3-2-059)

這誠屬自然與正常情事，但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除了國語以外，三位新台灣之子們對於家中常講的台灣方言並不熟悉，雖有聽與說的學習環境，卻只帶給他們聽的能力，而缺乏說的能力：

「以前我們住台北，跟奶奶一起住，奶奶跟媽媽都講客家語，小時候聽久就大概會了，廣東話也是一樣，爸爸媽媽有時候講一些私人的話，就不會用中文，或是他們在講一些不能告訴我們的話，就會用廣東話，聽久了大概也會聽，但因為他們沒有教，所以我不太會說」(I1-2-010)

「阿公阿嬤講客家話比較多，國語比較少，可是我客家話講得很爛，聽比較好一點，阿公阿嬤沒有教，他們也只能將就一點聽，有時候就真的不行才講國語，可是國語他們也比較少講，有時候也很頭痛到底要怎麼跟他們溝通」(I3-2-054)

「因為學校同學大部份都是講台語，阿嬤沒有教，所以就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也有一些人講國語，就直接跟他們講國語」(I2-2-009、I2-2-011)

這樣的情況令他們在與家中長輩、學校同學溝通時產生些許的困難，不一樣

的我於是透過電視媒體學習台灣方言：

「台語我只能看八點檔，台語也可聽的懂啦，可是講就也不行啊！」(I3-2-056)

尋找另一片天姐姐則嘗試以簡單的國語和阿嬤對話，或是請爸爸當居間翻譯：

「如果他們聽不懂的話就國語啊，國語他們比較簡單一點的是一定都聽得懂的啦！不然就是跟我們家老爸講，叫他去跟阿嬤講」(I2-2-012)

此一語言溝通落差的狀態，使得很多文化訊息也因此無法直接透過長輩來傳遞。

2、學校內的教導與校外教學中的增廣見聞

學校是讓知識可以有系統被傳授的地方，三位新台灣之子們對於台灣文化的學習，有很大的部分是來自學校體制的正式教育，有時也來自電視媒體的知識置入：

「台灣文化是學校老師教的比較多」(II-2-052)

「學校、電視、課本都會教」(I3-2-060)

除了從學校課堂內的學習以外，學校也會藉由校外教學的實地到訪，讓學生們身歷其境認識台灣文化。尋找另一片天的父親由於經常投入農忙，沒有時間帶他們到處去玩，學校的校外教學便成為他們認識台灣文化的另一途徑：

「因為家裡就很忙啊，所以爸爸就沒時間帶我們出去玩，就靠自己看到學校有什麼活動就自己報名去玩」(I2-2-047)

3、家庭內的教導與家庭旅遊中的學習

除了透過學校內外有系統的傳遞台灣文化外，三位新台灣之子們的父親或祖父母也會在家庭日常生活中，向他們介紹節慶故事、教導祭祀儀式，甚或安排家庭旅遊，好讓他們對台灣的文化傳統、生活方式等有更深刻、具體的認識，同時也將文化價值觀置入其中。

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的父親在家裡會主動透過講古的方式，讓他知道每個重要節日的典故，或在家裡有祭祀時教導相關儀式：

「在家裡爸爸也會跟我講一些風俗民情，像七月開鬼門、清明節掃墓、九九重陽、教師節的故事」(I1-2-052)

「台北和新竹家裡都有佛堂，都用台灣的方式拜，阿公、阿嬤、爸爸都會教媽咪，有時候也會教我」(I1-3-015)

尋找另一片天的家裡有基督教與民間信仰二種宗教，平常他們都各自信奉各自的宗教，遇有特殊祭典時，信奉民間信仰的阿嬤會向他們說明祭拜的對象與方式，姐弟二人不排斥時，就會跟著長輩的習俗走：

「除非一些比較特別一點的東西，就是好像是10月還是11月那個時候吧，就是媽祖到我們家做客，我就坐在那邊，不知道幹嘛，阿嬤就會說今天要拜誰，要怎麼拜，我就跟著拿香拜拜」(I2-2-067)

在家庭內的學習外，三位新台灣之子們的父親也會安排家庭旅遊，期待讓他們的學習更貼近生活，但也因著父親本身特質的差異而有了不同的結果。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的父親因從事地理風水師的工作，經常需往來台灣與其他國家，致較具有旅遊經驗，使得孩子能夠從與家人一起出遊中，獲得有趣的童玩知識學習：

「爸爸回國時也會帶我們去一些重要景點，例如淡水，老街附近就有一家賣童玩和古董這些東西，裡面就有劍球、橡皮筋槍、彈弓，還有一些空氣槍，認識很多童玩」(I1-2-022)

而不一樣的我的父親雖然很常帶他們全家出遊，但卻未能有詳盡的介紹，不僅無法從中獲得透過旅遊增廣見聞的附加價值，反因旅遊品質不如自己的期待而敗興而歸：

「爸爸在暑假寒假、過年的時候很常帶我們去玩，北中南都有，可是都很無聊，因為我爸不知道怎麼玩，他只會開開開然後到一個定點之後，走一走然後再開開開，也沒介紹什麼，他就是不會玩，不懂得玩啦，所以有時候我們跟他出去就會覺得不是很開心」(I3-2-069)

然而，文化傳承不僅僅是了解有形的歷史、儀式、事物、生活方式，三位新台灣之子的父親同時也傳遞無形的文化價值觀。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的父親會在親子相處的過程中，教導生活技能與做人的道理：

「爸爸有時候會教我一些工具修理東西的事情，講一些做人處事的道理、態度吧！」
(I1-3-017~018)

尋找另一片天的父親雖然個性內向、少話，大多時間都忙於農作，但也相當重視孩子的品格教育：

「他不注重功課，他注重的是你品性好就好了，不要抽菸喝酒那一類就好了，不要在不該的年紀做不該做的事情」(I2-2-049)

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和尋找另一片天的父親藉由身教與言教，讓孩子能有健康的身心發展，以及培養孩子正當的價值觀。

4、在父親與長輩的有限教導下，多依在地生活習慣約定成俗

儘管主流文化的內涵可分別在學校教育、家庭生活中被傳遞，但仍會因著各家庭的條件不同而出現限制。尋找另一片天的父親因個性沉默和農作忙碌的關係，較無法主動傳遞關於台灣的文化知識：

「爸爸不會講話，就從頭嗯到底，你講什麼就嗯嗯，就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很少話，要不然就是講話問到一點點，他就講出一句話，然後就沒了就繼續嗯到底，我們三個人就很少跟爸爸講話，講什麼話就會嗯啊，他不會主動跟我們講話，除非有重要的事情吧，不然就是要到田裡工作這種」(I2-2-048)

他們也因為無法以流利的方言與阿嬤對談，使得阿嬤僅限於特殊節日和祭典的介紹，其他的部分無法多說；而不一樣的我則由於與父親出遊的旅遊品質不佳，而無法對所生長的台灣有較滿意的認識。

在這樣的情況下，依循地利之便，經年累月在地化的生活經驗，便成為三位新台灣之子們最好的學習管道：

「爸爸沒跟我們說，節慶不就是看月曆來過嗎？」(I2-1-100)

「時間就到了就知道要做什麼了」(I2-2-066)

「台灣節慶就已經都習慣了，這個節慶該做什麼事，就做什麼事」(I3-1-071)

「平常都在過啊！就到了這個時間點就過啦！中秋節烤肉啊、過年領紅包，台灣就幾個節慶嘛，過年嘛然後端午、中秋，然後還有教師節就學校過嘛，然後什麼清明」
(I3-1-072)

由此可看出主流文化傳遞的特色，當人們長期在主流的環境中生活，久而久

之自然對當地的文化活動有著一種熟悉，即使沒有人特別教，他們也能從觀察、聽聞和身體例行中體會到約定成俗的文化展演。

從本研究三位新台灣之子的經驗來看，由於容貌、膚色與一般台灣的孩子無顯著差異，語言學習是主流的國語，此三項對於族群的知覺，可做為他們族群認同的標記，再加上他們有著主流族群中內團體的友誼、宗教活動、文化傳統、音樂、飲食、休閒活動的族群參與，故對他們而言，對台灣的族群文化認同度高。

但再細究他們認同台灣文化的經驗發現，他們在家中常用的台灣地方語言，如客家話、台語等，長輩們均不會主動教導，致尋找另一片天姐姐和不一樣的我於家中與學校場域，當長輩或同儕常用的語言非國語時，容易出現溝通上的不便，有一種格格不入的感覺，更由於生活環境就在台灣，很多節慶習俗即使不經特別介紹，也能經由參與其中而得知，雖然不太會有深刻的認識，但很自然地就會隨著年復一年而習以為常，而後約定成俗。

或許是族群中心主義、文化優越感使然，我們會覺得在一個地方土生土長，自然會融入該地的風俗習慣，認為不需要有太多的主動，但從照鏡子會被帥死的ShenHu的經驗看來，父親這一方的家人，不論是父親本身，或者是祖父母等長輩，都在台灣文化的傳遞上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越是能夠主動、詳盡地傳遞台灣文化，孩子們知道的就越具體，族群參與也就越深刻。

(二)、母親方母國文化的傳承

在母親母國文化這一方，新移民女性由於是從外國嫁入台灣，要入境隨俗，所以剛開始皆會以主流文化來與孩子們互動，不會主動跟孩子提及關於母國文化的事物，在三位新台灣之子們的眼中，媽媽學做台灣口味的菜，用國語跟自己對談：

「阿嬤教的吧，不然就是自己學，如果去到一個地方，一定要想辦法適應他們嘛，所以一定要想辦法學會」(I3-2-022)

「應該也是阿嬤吧！我也不知道是誰教她的，她就自己會煮了」(I2-2-004)

「媽媽平常和我們講國語」(I2-1-074、I3-2-054)

但她們透過帶孩子實際到訪母國娘家、在台灣與娘家家人的通訊連繫、與同鄉姊妹們的聚會，想賦予孩子獨立往來台灣與娘家的能力等機會，以及希望可以與孩子有共通事物的想望，三位新台灣之子們除了可以從中接觸到上述所提及的特殊飲食外，也能夠逐漸認識屬於媽媽國家的其他文化。

1、多元的語言學習與使用

(1)、佩服後激起學習動機

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的媽媽剛開始帶孩子回馬國時，並沒有馬上教孩子當地的語言，反而是孩子佩服馬國家人的語言能力，希望自己也能仿效，便從觀察中自學，但僅止於聽的能力：

「看到馬來西亞家人的語言能力非常好，令我刮目相看，所以一開始我會想要學當地常用的語言，也想要讓自己變得像馬來西亞家人那樣厲害，但媽咪並沒有特別教我，我也只是偶爾回去時有機會聽他們怎麼說，逐漸地我可以聽得懂一些簡單的話，但不太會說」(I1-1-036)

後來因幼稚園、小學時常有機會和媽媽回馬國，再加上出了家門常需媽媽的協助，頗感不便，所以媽媽就開始教孩子當地常用的三種語言，但似乎也僅限於有聽的能力，缺乏說的能力：

「去那邊玩語言比較麻煩，後來媽媽會教我廣東、英語、馬來，廣東我聽得懂但不會說，馬來聽得懂基本語」(I1-1-037)

(2)、考試失利事件後母親再度教馬來母語

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的媽媽於他小學五、六年級時，報名參加一個關於新移民母親母語測驗的活動，他當時因未能通過測驗而與母親一同遭評審的責難式建議：

「我五、六年級時媽媽去外籍配偶中心，我記得我媽媽去桃園知道有一個國小舉辦寫文章，有準備機票讓你回媽媽自己的家鄉，只有一張，然後很多人參加，然後要考試，就考說媽媽國家的語言馬來語，然後你要寫，我說和寫全部都不會，後來我沒有過，然後後來還到校長室去審核，教授跟媽媽講『妳沒有把妳兒子教會妳家鄉的語言是妳的錯、

妳的疏失』，他說『妳不要在意別人的眼光，國光石化為來會跟馬來西亞合作，下一代很重要，要教會他自己的母語』，從此之後，媽媽就知道自己家鄉的東西很重要」(I1-2-016)

這件事情發生後，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的媽媽便積極地教導他學會馬來語的聽說讀寫，但這個學習並沒有維持很久，一個月後媽媽自己也忘記這件事，就沒有繼續要他背誦，久而久之對馬國語言也就漸漸生疏了：

「媽媽在被教授罵之後，隔天立刻就寫一大堆馬來基本語，早安、午安、晚安、請、謝謝、對不起那些，要我把那些都背下來，一個一個慢慢教，大概七、八個單字，就教了一個月，然後要全部都背下來，可是後來她漸漸忘記這件事，就沒有再叫我背了，然後我也很久沒有講那些話，就漸漸忘了，現在也不太會講」(I1-2-018)

(3)、培養有自行回印尼的能力及有親子共通語言

尋找另一片天從讀小學開始，媽媽就教他們印尼語，希望他們長大後可以有自己回印尼：

「大概是從小學開始，她就說這個吃飯叫做什麼，洗澡什麼怎麼說，然後跟我說去那裡怎樣怎樣，希望我們長大後可以自己回去印尼」(I4-1-047)

在教導的過程中，由於婆媳關係持續衝突，因此，當媽媽想要與孩子單獨相處時，就會跟孩子講印尼話，所以姐弟倆也因而與媽媽有了彼此間共通的語言，但仍僅限於能聽和說「洗澡」和「去夜市」這二句最常聽到的話而已，其他的印尼話並沒有學會：

「我大概只聽得懂洗澡、去夜市，因為我媽以前說去夜市之後就講那個印尼話，因為我阿嬤聽得懂國語跟客語去夜市，所以我媽就這樣講就帶我們出去」(I4-1-040)

2、我在媽媽國家的生活體驗

(1)、發現二國地理環境的差異

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自小即有很多的機會回母親母國，對馬來西亞的建築、氣候、和族群組成均有深刻的印象：

「房子比較不一樣。這邊(台灣)都蓋高樓大廈，那邊(馬國)幾乎都蓋一層樓、平房或二樓平房」(I1-1-031)

「天氣熱，那邊(馬國)的人都在喝汽水、涼水、冰水消暑，這裡(台灣)四季會有下雨，所以比較涼」(I1-1-032)

「那邊(馬國)印度人很多，有華人、馬來人，很多不同種族的人，台灣都漢人，其他都是一些原住民、觀光客、留學生或外勞」(I1-1-040)

尋找另一片天姐姐和不一樣的我也在小時候造訪印尼時，對印尼的交通工具、氣候和生活方式留下了一些記憶深刻的印象：

「他們那邊有腳踏車、三輪車」(I3-2-035)

「印尼好像是一個很熱的地方，就印尼就吃辣的，就很熱的樣子」(I2-2-036)

「那邊只能洗冰水，然後就覺得很痛苦，是很大的痛苦。熱水要自己燒，洗衣物都是冰水啪啪啪，而且那邊也是很熱啊！」(I3-1-040)

(2)、天壤之別的探親時光

三位新台灣之子接觸母親母國文化的立基點不同，影響了他們回到母親母國時，與母親母國家人的互動關係，以及對於母親母國文化的接觸感受，分別呈現親近與疏離的二種截然不同的狀態。

①打成一片 VS 不知道可以做什麼

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自 4 歲起每半年或一年就有機會回外婆家，由於母親母國家人能講華語，故雖身處異地但語言熟悉，自然與馬國的表兄弟姐妹有好的感情，很容易就和馬國的手足玩在一起：

「小時候回去他們那邊都有一些戰鬥、怪獸的玩偶，男生愛玩的玩具，就是電視上演的卡通人物，是日本的卡通，鹹蛋超人、蝙蝠俠，把它變成是縮小版的模型，關節可以移動，我們台灣也有。就可以和他們打來打去」(I1-2-012)

「有時候會聊天、講話，講卡通裡的東西，玩遊戲王卡片，或是一起吹牛說誰可以打敗誰，或是在家裡庭院前玩盪鞦韆，也會玩台灣有的鬼抓人之類的吧！」(I1-2-013)

而不一樣的我在上小學前只回去過印尼 2 次，回去母親母國的機會相對較少，再加上語言不通，所以與外婆家的家人感情生疏，在她的印象中，小時候只有待在家裡看卡通，什麼也沒做：

「看美少女戰士卡通，我看到卡通就看的很開心，因為是卡通是畫的嘛，而且小時候也不會 care 文字、劇情，那它會有聲音嘛，就是說話什麼的，沒有做什麼，那邊也不能做什麼」(I3-2-042)

長大後，考完基測升高一的暑假，不一樣的我再一次與媽媽和弟弟回去印尼

待上一個月，也同樣因為語言困難，而間接影響姐弟二人待在印尼的意願：

「很無聊，每天都不知道做什麼，因為電視也看不懂也沒有電腦，度日如年，我跟我弟都快發瘋了，我們只能玩牌，因為不知道能幹嘛，語言又不通，就那時候很想回來」(I3-2-045)

②暢遊名勝古蹟 VS 這是什麼世界

由於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自小即到訪馬國許多名勝古蹟，且曾經透過這些古蹟對母親進行認同，現在雖然有些已不復記憶，但他期待將來能夠有機會再去完成未完成的行程：

「幼稚園開始去了很多名勝古蹟，因為年紀小，就把那些名勝古蹟當成是自己外星人的基地，想像自己和媽媽是同一國人」(I1-2-051)

「有去看過大佛，吉隆坡的雙子星塔是最有名的，那是馬來西亞的地標，就和台灣的 101 一樣，連結二座塔中間的那個橋我還沒去過，希望以後有機會可以去走」(I1-2-050)

不一樣的我則再度因為語言困難，而在印尼發生猶如身處異星球的經驗，且原本期待能到遊樂園玩，後又因種種巧合，對於印尼的遊樂設施有種失望的感受，更激不起她對於認識印尼的興趣：

「我去印尼電影院看了一部電影就是貓狗大戰 2 吧，然後電影講的是英文，可是出現的是印尼話，就只能看畫面聯想，因為蠻好笑的畫面，完全聽不懂啊！這是什麼世界，看也看不懂，聽也聽不懂，就整個黏在一起」(I3-1-048)

「他們那邊有個小遊樂園，我記得那邊本來有個遊樂園我們本來要去玩的，但是它沒開，然後我們還有去鬼屋，可是好爛，一點都不可怕，就很沒什麼」(I3-2-049)

(3)、隆重的祝壽儀式

雖然不一樣的我對於印尼的人、事、物感受是疏離的，但於二年前就讀高一時，有機會隨媽媽回印尼替外婆祝壽，卻也能發現印尼家庭對年紀越長者的尊敬與重視，不同於自己在台灣家中，對於祖父母生日，或屬於父母親的節日所經驗到的，也讓她感受到印尼家人的熱情：

「就印尼那邊辦的很盛大啊，就會邀請很多親朋好友一起，辦桌什麼的，台灣這邊就還好，就一個小蛋糕，生日的話就一個小蛋糕唱生日快樂歌，他們那邊就會像請客一樣，因為可能是愈年長的人就會辦的比較盛大一點」(I3-2-062)

「我們這邊阿公阿嬤生日其實都很少在請，甚至不知道，就只有父親節跟母親節會跟阿公阿嬤說父親節快樂母親節快樂，送一朵花什麼的就這樣，不然就買個蛋糕一起慶祝」(I3-2-063)

3、 在台灣與媽媽共同生活的認識與看見

由於尋找另一片天姐姐僅於二歲時到訪過印尼一次，大弟則缺乏實際到訪的經驗，所以除了姐姐對與台灣有明顯差異的印尼氣候、用水習慣有印象外，姐弟二人對印尼的認識都是後來透過與媽媽在日常生活中相處知道的。而不一樣的我雖於二年前較長大後，有機會再度跟媽媽回印尼，但因語言不通的關係，對於印尼也缺乏深入的認識，有些對印尼文化的了解，也是透過與媽媽在日常生活中相處知道的。

(1)、和樂融融的印尼家庭圖像

尋找另一片天常聽媽媽跟印尼家人講越洋電話，每次講都講非常久的時間，表情非常豐富：

「她都用電話啊，打過去就坐在那邊2個小時沒問題，講講笑笑然後又哭了一下又繼續笑」(I4-1-059)

不一樣的我則會看見媽媽與印尼家人，透過網路資訊連繫時溢於言表的情緒反應：

「加我那幾個阿姨的 facebook，然後他們都會跟我媽說「我下載了什麼照片，然後我媽就說「妳那個四阿姨說她上傳了什麼照片我要看，然後就是每次講到這個她都很開心」(I3-1-049)

再加上她曾經去過外婆家與印尼的家人生活過，所以更可以知道媽媽與家人的深厚感情，令他們感受到一幅和樂融融的印尼家庭圖像：

「我媽是一個非常…我覺得她跟她的兄弟姐妹還有家人感情都很好，應該是說印尼人每個人都這樣子吧！」(I3-1-049)

「印尼的家庭相處都超好的」(I3-1-050)

「對啊真的，真的，我認識的印尼的朋友，幾乎他的媽媽都會這樣子，對啊！」(I2-1-072)

甚至會讓從小在成人吵鬧環境中長大的尋找另一片天姐姐感到羨慕，跟自己

在台灣所生活的家成了明顯的對比：

「好到讓我們很羨慕，因為我們家大姑姑是看到我阿嬤不是逃的跟什麼一樣，不然就是怕的跟什麼一樣，然後伯父更誇張，幾乎很少回來，要寫信才肯回來」(I2-1-073、I2-1-088)

(2)、休閒娛樂不同於台灣的特別之處

透過觀察來自印尼的媽媽的生活，尋找另一片天和不一樣的我，發現媽媽和阿姨們的特殊休閒活動有打牌、做印尼食物和聽印尼歌，他們也從中得知媽媽與姊妹淘的好感情：

「晚上打牌邊聊天，不然就是講出莫名其妙的聯話」(I4-1-087)

「打牌是她們聊天休閒的方式，不然就一直做印尼的東西」(I3-1-076)

「有時候坐我家有時候到別的阿姨家，就是他們那幾個朋友愈打愈大聲，他們感情很好」(I3-1-077)

「我媽常常放，她手機就一大堆印尼歌」(I2-1-070、I4-1-055)

但對他們而言，媽媽的這些喜好，和自己在台灣的生活經驗無法連結，因此，當媽媽請他們協助搜尋歌曲時，就會出現一種「不得不做」的情況：

「動不動就叫我們去網路上 google、youtube 下載，就絞盡腦汁叫我媽來 key，或打印尼歌這三個字，就出現一堆，她就是坐在我們旁邊啊，從上面看下去，然後就是比幾個要不要，眼睛很痛喔！」(I2-1-071、I4-1-056)

不過，尋找另一片天姐姐也因幫媽媽搜尋印尼音樂，無意中認識了印尼 MV 較台灣特別之處，雖然會有距離感，但卻也有了認識媽媽國家文化的收穫，且可以有看見印尼比台灣好的視野：

「我就幫我媽找打三個字就連連連就不知道連到什麼東西去了，音樂就看那個 MV，MV 就很特別，真的很特別，因為就跟台灣拍的 MV 不一樣，台灣拍的 MV 就很奇怪，台灣拍的 MV 就是愛情的，可是印尼他們的影片就是有包含愛情、友情，一堆雜七雜八的東西」(I2-2-022)

「真的蠻特別的，因為台灣就只是一個螢幕轉換而已，印尼就真的是在屋頂上，然後不然就是在房子裡面就這樣子對唱，真的在房子裡對唱」(I2-2-024)

4、非自願接觸母親母國文化

自小與馬國文化有密切連結的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在小學中、高年級

媽媽還沒有積極教導馬國文化以前，擁有自願學習母親母國文化的動機，但自從小學五年級參加母親母國語言能力考試失利，媽媽被評審賦予教導母國文化的重任，開始大量注入馬國文化事物後，就轉變成因怕媽媽生氣而非自願學習的狀態。

當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考試失利之初，媽媽先是密集地教授馬來語，後來雖然沒有再要求孩子學習，但卻很積極地帶領孩子參與新移民組織的相關活動，或是積極地引進馬國童玩讓他和弟弟認識：

「因為她常常去外配中心，有很多活動，所以就要我一起去」(I1-1-008)

「去年媽媽說要去參加一個比賽，我們要表演唱印尼、馬來的兒歌，也出了一張 CD」(I1-2-025)

「今年暑假已經上完了移民署辦的夏令營，裡面就有介紹越南、印尼、馬來西亞的問候語，還有一些節慶，就媽媽說去裡面學習當小隊輔啊！然後又有跟媽媽一起去參加一個南洋姐妹會辦的志工、多元文化講師培訓，從 3、4 月每個禮拜天去那邊上課，自己準備一些課程關於國外和馬來西亞自己家鄉的課程，教那邊的小朋友，就自己當講師」(I1-1-049)

「小時候在馬來西亞很少玩那裡的遊戲，最近這幾年因為有幾次是我們沒有去，所以她會要求帶點童玩回來，或是請別人幫她帶過來，然後就教我們玩」(I1-2-014)

然而，在媽媽如此積極讓孩子接觸馬國文化的過程中，孩子卻是因怕媽媽生氣而學習，讓原先抱持著沒學會很可惜的心情，油然而生一種被強迫接受的感受，二人有著截然不同的心境：

「媽媽帶我去的，不去的話她會生氣」(I1-1-006)

「那一次考試沒有考過就覺得怎麼會那麼難呢？就覺得來這邊就是要適應環境，沒有人覺得自己家鄉的語言是重要的，後來覺得很可惜，為什麼這些我都沒有學會？」(I1-2-017)

「一開始不喜歡那裡，沒有同伴，很無聊。想說在家裡可以玩電腦幹嘛去」(I1-1-014)

「有時候她會無緣無故幫我亂報名一些東西，我根本不知道，她事先都沒有跟我說，就在前一天晚上才跟我講說你明天要去喔！我就會不高興，都沒有提前告訴我，像上次有一次她就跟我說你幾點就要去了，沒有事先提醒我，那一次我就沒有去了」(I1-1-059)

從本研究三位新台灣之子的經驗來看，不論是孩子主動或受外力事件影響，新移民母親在台灣主流語言國語以外，均會想要教孩子母國常用的母語，希望孩

子能夠有多元的語言能力，且不論是實際到訪媽媽母國，或是在台灣與媽媽的生活相處，三位新台灣之子都能夠發揮敏銳的觀察力，發現二國各面向的差異以及媽媽母國文化的優勢之處。但研究中也發現，即使父親這一方沒有特別限制母親不能教母國母語，而媽媽們也很努力地教，但三位新台灣之子因生活在台灣，並不會有太多母親母國語言的學習，如，尋找另一片天只學會「洗澡」和「去夜市」二句最常與母親互動的印尼話，不一樣的我只知道謝謝而已：「我知道謝謝而已」(I3-1-044)，且他們到訪媽媽母國的次數屈指可數，或甚沒到訪過，雖然亦能看見印尼文化的優勢之處，但不會有興趣進一步了解和學習。而照鏡子會被帥死的ShenHu則算是三位中到訪媽媽國家最頻繁，語言與文化各方面在媽媽的積極撮合下學習較多的，雖然馬來和廣東基本語都聽得懂，但說的能力也顯生疏。

由此可知，媽媽本身傳遞母國文化的主動性、孩子們回媽媽母國的頻率，以及是否有共同的語言，雖是影響三位新台灣之子與媽媽母國家人情感連結的親密程度，以及深入了解母親國家的意願，但主流文化還是佔了很大的地利之便，因為生活就在台灣，很多文化事物即使不用特別教，三位新台灣之子們也能自然約定成俗，相較於新移民母親需努力、用力地傳遞母國文化，而三位新台灣之子們卻接收有限的情況呈現二樣情。

(三)、新台灣之子對雙國文化接觸與學習的回應

三位新台灣之子在成長過程中，陸續接觸與認識父母親雙方母國文化，對一直生活在台灣，飲食、語言、休閒活動等生活型態均以台灣為主的他們而言，「有條件的接受」是他們對母親母國文化的回應方式。

1、從共廚、共食中調整飲食口味，兼容並蓄

尋找另一片天和不一樣的我雖然剛開始對於媽媽印尼的重口味飲食感到無法接受，但是當不一樣的我年紀漸長，有機會幫忙媽媽做飯時，都會要求媽媽調整成全家人都可以接受的口味：

「我們會跟她說不要這麼酸，不要這麼辣，然後她會聽我的意見」(I3-1-061)

而尋找另一片天的媽媽若有做不太辣的台灣菜和印尼菜時，姐弟們也能夠跟著吃，如此一來，他們也能夠在台灣口味的飲食外，嚐到媽媽母國的風味飲食：

「我媽煮台灣的菜還可以，但還是偏重鹹、辣、酸，吃久了就習慣了，印尼菜只要不是很辣，我們都會吃，像炸雞、老椰子裡面肉弄成碎碎的，像包水餃一樣、炸餃子之類的，裡面長得像水餃裡面的餡料，不是一般水餃的餡料，是白蘿蔔絲跟一個莫名其妙的東西，很好吃喔！」(I2-1-090、I4-1-074~075)

2、習慣台灣輕食味，對母親母國特殊飲食敬而遠之

尋找另一片天(姐姐)也會跟媽媽一起做菜，但習慣台灣清淡口味的她卻發現與媽媽做出來的口味差太多，彼此都無法適應：

「我會跟媽媽一起煮，我媽煮菜方式非常特別，喜歡做很鹹的，可是我煮的就是很清淡，所以兩邊吃起來味道就很奇怪」(I2-1-089)

但在兩方差異過大的情況下，媽媽覺得不夠味，會自尋解決之道：

「我媽就會說不好吃啊，然後自己去拿辣椒，還有一個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粉紅色的超噁爛的東西，蝦子切得超碎、超粉的加點水攪拌，就變成泥狀粉紅色的配料加喔！」(I4-1-072)

「她都自己另外煮一鍋她自己要的，什麼印尼咖哩也要加辣椒」(I2-1-089)

而三位新台灣之子雖不可思議媽媽的吃法，不跟隨媽媽的飲食習慣，但也能尊重媽媽慣有的飲食習慣：

「超噁心的就看了就很噁，還吃得下去」(I4-1-072)

「就看著她吃完」(I3-2-093)

3、選擇主流和通用語言學習，不學太難或不實用的母親母國語言文字

三位新台灣之子的母親均很願意教其母國語言，且台灣家人並沒有特別限制新移民母親不能教，但他們在語言的學習上仍以國語為主，照鏡子會被帥死的ShenHu剛開始回馬國時，雖會因語言不通感到不方便而興起學習馬來語的動機，但是後來學習之後發現該語言並不常用，故選擇先學好國際通用語言—英文：

「剛開始覺得很不方便，因為一些商家都說馬來和印度語，很難在家裡以外的地方自由活動，剛開始有想要學」(I1-1-035)

「後來覺得回馬來西亞的時間又不多，二、三年才回去一次，而且英文是國際語言，

要將英文學好」(I1-3-026)

尋找另一片天和不一樣的我，在學習印尼語的過程中，發現印尼的文字和發音都比英文要難的許多，也因為覺得很少能實際用到而選擇不學習，他們認為若有需要時，則請媽媽居間翻譯即可，不需要特別學習：

「比英文還要難，完全聽不懂，英文是還有一個字，它是就全部就黏在一起，很難啦，要能聽得懂就好了」(I4-1-048)

「媽媽有教但我們沒有學。就是我們用不到，真的我們用不到，而且又很少去印尼。就妳媽媽跟我媽媽講講就算了」(I4-1-042)

「他們講什麼，我就叫我媽說他們講什麼，我媽是翻譯啦，我媽說那妳講什麼她也回回去說妳講什麼，媽媽當翻譯就是了」(I3-2-051)

4、在流行文化的風潮下，接觸但不參與少見的母親母國音樂娛樂

流行於台灣的音樂文化，除了官方語言的國語歌曲、地方語言的台語和客家歌曲外，英語、日語和韓語等外來歌曲也占有一席之地，相對來說，在台灣罕見的印尼歌就被尋找另一片天定位為非流行、過去式的：

「動不動就叫我們去下載，可是重點是其實要找到印尼歌的話，因為現在全球化，全球化不就是只有流行歌手，要找到以前的歌其實還蠻難的」(I2-1-070)

而青少年對於非流行的文化並不會有很大的興趣，又他們從小就將印尼語文定位為奇怪難學的，所以對他們而言，印尼歌帶給他們跟印尼語文有相同的奇怪感覺：

「之前有聽、看到我媽媽唱片，真的很奇怪，它的發音就是那個印尼的歌都有那種很妙的感覺，我不知道怎麼講對，很妙對，聽起來很像英文，可是它偏偏就是不是英文，真是很怪！」(I2-1-069)

這些較少接觸的音樂，對他們而言雖有新奇感，但還是較習慣台灣常見的。因此，他們雖然會幫媽媽搜尋、下載印尼歌，但不會成為自己聽歌的選擇，甚至會覺得反感：

「但我們不會聽啊！就只是說知道比較新奇的東西，接觸的比較少所以就沒有什麼，所以都還是比較喜歡、習慣台灣的」(I3-2-088~089)

「我媽常常放，她手機就一大堆印尼歌，很煩啦！」(I2-1-070、I4-1-055)

5、選擇性參與能與主流生活經驗連結的母親母國文化事務

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對於馬國文化的學習，因受比賽失利外來事件的影響，由最初自身的積極主動轉為媽媽的積極推動，呈現出看當下心情決定參與多少的狀態。當他心情好的時候，就會有學習的動機，覺得此學習對自己有幫助，而當他心情不好時，就會覺得是一件麻煩事，被動接受後的習慣也就勝過為有興趣而學的初衷：

「有時候心情好就甘願，有時候心情不好就不甘願」(I1-1-016)

「就去學習，以前都不了解國外這些東西，現在就知道了，有好沒有壞啦！」(I1-1-051)

「帶活動時可以用得上」(I1-2-024)

「有時候是麻煩，我就不想準備(帶活動)，幹嘛要拉我」(I1-3-021)

「剛開始都是被媽媽拉去的，後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要去，可能是去習慣了吧！」(I1-3-022)

不一樣的我由於對外婆家的家人並不熟悉，於情感上自然無法與他們做連結，感受與母親不同調，所以當媽媽邀請她一同分享母國家庭生活點滴時，她發現自己很難每一次都跟著媽媽一起感同身受，有興趣時會了解一下，不感興趣時就選擇不參與母親：

「像前幾天我媽不知道在看我那一個阿姨結婚，他們會寄回來，然後我媽都會很興奮一直叫我們趕快來看，有時候就不想看，我又不認識，她就自己一個人去看，每次拍的都一樣嘛，就在那邊唱歌什麼什麼的，就覺得很無聊」(I3-2-064)

由本研究中三位新台灣之子的經驗可知，語言是認識族群文化之母，當這三位新台灣之子先後接觸父親台灣文化，以及母親母國文化後，由於主要生活場域在台灣，偶爾有機會才會隨母親回母國，形成他們對於母親母國語言的學習狀態是：「媽媽教得很積極，但孩子們不會主動想要學」，即使像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剛開始有想學馬來語的動機，但後來也覺得非常用或通用語言而作罷，甚至會對於媽媽的積極感到被強迫學習的負面情緒。而語言以外的其他母親母國文化，諸如：飲食、音樂、休閒活動、慶典等族群參與型態，均在以傾向選擇自己熟悉的成長環境進行認同的前提下，納入在地性與實用性的考量，來決定媽媽

母國文化的位置，以及投入參與的程度。

在台灣的大環境下除國語外，台灣方言與媽媽母國母語並非主流語言，尤其是媽媽母國母語，沒有學它並不會對他們造成什麼利害影響。不符合主流需求而不會主動想學，看出族群認同行為背後牽涉更大的政治利益，當國語是主流就會犧牲多個也可建立族群認同的語言學習機會，非主流的族群文化就易被族群中心主義所遺忘，也讓三位新台灣之子雖然具有多元文化與語言學習的優勢背景，但卻無法自然地成為自己的一部分。



三、在污名環境中長大的我們

當三位新台灣之子逐漸長大，生活所接觸的人事物自然從家庭內擴及學校與鄰里社區，此時，他們也正在經驗外在環境眼光對他們擁有雙國文化血脈身分的另類看待和對待。

1、教學現場被點名的困窘氛圍

尋找另一片天(姐姐)和不一樣的我，在他們分別進入國小和國中正式教育體制內時，老師在教學現場直接進行身家調查的舉動，令他們的身分被凸顯，而有一種被點名做記號的感受：

「就是小一的时候有分忠班跟孝班，然後四年級之後就合班嘛，三年級之前有老師就問說誰是印尼的啊!就好死不死只有我一個」(I2-1-037)

「國小的時候好像沒幾個人，我的印象中好像沒幾個人知道我是那個混血外籍。然後國一時候開始吧，好像是有一次我們老師就說什麼，我們班有誰是外籍生，而且他是很大聲的講，然後我本來想說我私底下再去找老師說老師我是，結果他說我記得○○○妳不是好像是嗎?而且就班上就只有我一個人，然後我就有那種很自卑的感覺」(I3-1-010)

再者，她們二人所處的時期是屬於新移民女性移入早期，當時學校老師對新移民概念並沒有特別的教導，在她們二人的記憶中，老師只是很簡單地帶過：

「那時候課本好像沒有教什麼，我現在一直想不起來那個時候教什麼，老師就很簡單的就照課本講，課本寫什麼，他就講什麼，就是什麼外面來的增加的人，人口增加數，然後他們要學習的東西就這樣子差不多」(I2-2-001~002)

「就是從外地移民來的不是台灣，他們就只會照課本沒有舉例什麼的，直接照課本念過去。就是現在台灣娶外面的人愈來愈多，就講這樣，然後還有她們會去學習什麼課程就這樣子帶過了，就講完就帶過換下一頁，我覺得每次好像都是這樣子吧!」(I3-2-017~018)

因此，在尋找另一片天(姐姐)和不一樣的我的經驗裡，不論是老師與同學，都帶著對來自東南亞新移民女性的刻板印象與她們互動。

2、同儕的排擠、惡作劇效應

自從尋找另一片天(姐姐)和不一樣的我身分在學校被正式公開後，隨即引來同學的異樣眼光、言語霸凌與排擠：

「就是老師說誰是外籍的時候，然後我就舉手嘛，然後有人就開始罵我說是印尼馬」
(I2-1-037)

「後來大家就知道嘛，就有時候會突然講到就言語上開玩笑啊，然後甚至會排擠就是玩遊戲啊，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會說不要碰我，妳這個印尼人，也知道他們在開玩笑啦，可是心裡面會很受傷」(I3-1-010、I3-1-028)

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在小學時因對自己的身分自豪，而親自跟幾位要好的同學公開，沒想到同學們卻對媽媽的身分有誤會，這樣的誤會便在他與同學的人際關係中發酵，引來同儕對他言語和互動上的不友善：

「因為以前會有什麼買賣新娘阿，他們聽到後就回去跟家長講，家長可能也不知道什麼事就回答他們的問題，就講錯話，他們就罵一大串英文加中文加閩南語的髒話，像是海灘的英文，還有很多很多」(I1-2-041)

「我們原本是朋友，後來知道後就不太想理我，以前你得罪他會原諒你，到最後你得罪到他的時候，他反而回過頭來嗆你，就有這樣的差別」(I1-2-042)

「五、六年級，我那一群都是男生，有幾個都是算是很賤的人，喜歡跟別人開玩笑，有一次我去福利社，就有一个人說請你吃東西，我就拿一瓶飲料說好阿，就後來他付完自己的就立刻跑掉，結果我出來之後他就說有人亂拿東西，說我是小偷，嘴巴說要請你，到最後就把你丟在旁邊，然後就亂宣揚」(I1-2-043)

3、 同學心中的次等國家

不一樣的我在高中時，因單純跟同學分享出國經驗，沒想到卻得到被同學比較與看輕媽媽國家的回應，使得自己一直無法理解媽媽國家在外人眼中的低位置：

「就有一次我跟我高中同學，我們幾個女生圍在一起說妳們有去過什麼國家嗎?就好像有一個人問我，就說有啊我出過國，然後那時候那一群只有我出過國，然後他就說妳去過哪裡啊?然後我就說是印尼啊，我那時候就想說不會怎麼樣吧!然後他們就是有點大笑的感覺，我就說妳們幹嘛大笑，她就說我以為妳講出來的會是什麼日本、美國之類的國家，然後我就說啊印尼有錯嗎?那個時候我情緒有一點不爽，然後她們就有跟我道歉，可是那個時候我還是會覺得印尼就是低賤的國家嗎?不知道他們為什麼這麼認為」
(I3-1-018)

4、 新移民母親活躍學校事務遭非議

新移民母親由於語言上的限制，對於學校與孩子有關的事務，通常都是由父

親做為參與代表，尋找另一片天和不一樣的我也不例外：

「只有我爸會去，媽媽幾乎不會去。我媽也看不懂、聽不懂人家在講什麼啊」
(I2-1-111)

「媽媽工作比較忙，都是晚班啦，所以就沒辦法參加」(I3-1-085)

不同於尋找另一片天和不一樣的我，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的媽媽，自孩子小學中年級因學校老師的居間協助，開始積極參與學校事務，也因此與老師有了密切的接觸，而造成同學們對自己的指指點點，使得他在那段期間不喜歡媽媽到學校去：

「三、四年級時每次學校都會發一些什麼新移民的活動、中秋節晚會、姐妹聚會，問說你要不要來參加，那時候我就無聊，拿那些紙來折紙飛機，然後就不見了，回家都沒有交給家長，有一次是老師看到我這樣子，然後他就用信封袋把那張紙包好親自交給媽媽，那一次之後媽媽就加入學校志工團，懇親會每次必到，懇親會都會選班級代表之類的，她當很多次會長」(I1-2-029)

「在那段期間我也不喜歡我媽媽到學校來」(I1-2-044)

「我記得有一次算難堪的事，我媽媽跟我五、六年級老師經常聊天，有一次就被人說閒話，有人就說什麼我媽媽都會巴結那個老師，所以那個老師才會對我很好」(I1-2-046)

5、 鄰居標籤化的歧視別稱

在學校之外，社區中對新台灣之子的另眼相待也先後在進行著。尋找另一片天透過媽媽得知在他們一、二歲時，鄰居們對於是印尼媽媽所生下的小孩，都會給予一個專屬於他們的稱呼，這樣的稱呼隱含歧視的意味：

「大概我媽說是從我一、二歲的時候吧！別人知道你是印尼人啊，然後印尼生的孩子大概就只能用印尼馬、印尼古，別人以為就只有那個字可以講而已」(I4-1-022)

「外界的人一開始就叫我們印尼馬，馬算是一種就是女生，可是比較難聽，就是很像罵女生很髒的感覺」(I2-1-038)

「男生有聽過別人講說印尼古，是在講印尼男，古惑仔的古」(I4-1-018)

逐漸長大後，這樣的稱呼同時也取代了他們原有的姓名，成為他們的代名詞：

「就我們有一個鄰居阿伯嘴超賤的，他就說印尼古怎樣怎樣，那時候就我們倒垃圾，我們家就只有這一包，我丟進去囉，他就突然拿過來說印尼古你怎麼沒有幫我丟」

(I4-1-020、I4-1-026)

「他就知道我的名字叫做什麼，他家人就知道我名字叫做什麼，還是故意就講那一句話」(I4-1-029)

不一樣的我也因媽媽是印尼人而有相同的經驗，帶給他們的是一種被歧視的受傷感覺：

「就是很像在諷刺的感覺」(I2-1-032)

「很難聽，就是印尼來的雜種的感覺」(I2-1-039)

「就是瞧不起的那種感覺，就很受傷」(I3-1-003)

雖然三位新移民母親在家庭中會因著婚配方式的不同，而呈現不同的位置與關係狀態，但從本研究三位新台灣之子與外在環境互動的經驗呈現，三位來自東南亞的新移民母親無法獲得社會應得的尊重與地位，主要是來自中介系統中的學校老師、同學，甚至是家長，只要聽到他們的母親是來自東南亞，就會立即連結對該國家的負面刻板印象，進行「我群」和「他群」的族群認同區隔，而這樣的偏見與歧視則是來自於更大的鉅視系統中的價值體系。

因此，在如此污名的眼光下，來自外界對新移民母親的扭曲看待自然會轉嫁到具有雙國身分的三位新台灣之子身上，由他們繼續被用有色眼鏡看待，以及承擔主流社會價值所發出的各種形式的霸凌。

貳、新台灣之子在雙國文化間的心理衝突、行為反應調適情形與認同狀態

一、新台灣之子在雙國文化間的心理衝突

三位新台灣之子在雙國文化間的生活經驗呈現，從最初的家庭生活中，透過發現母親與其他家人在語言、飲食方面的差異，知悉母親係來自和父親不同國度時，因著母親具有多元語言、特殊廚藝、適應異地的能力，讓尋找另一片天和不一樣的我都對母親感到佩服，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甚或與自己所喜歡的英雄主義卡通做連結，對母親和母親的國家產生崇拜感。在兒童時期的他們，由於外表並沒有明顯的與眾不同，尋找另一片天和不一樣的我所處的生活環境也有著許多與自己相同身分的同儕，因此對於自己的雙國文化身分並不會感到有任何負面感受，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甚至因為自己可以常有出國的機會而感到優越。

有著父母雙方不同文化背景的身分，原先在他們的生命初期是一件美好的事物，然而，當他們的生命越往前進，卻從他們生活的家庭、學校和社區場域中，逐步經驗主流文化對母親異國身分的偏見與歧視，以及因外在事件而帶來的強迫學習，為他們原來所持有的正向雙文化認同帶來不小心理衝擊，而有著不能為外人道的心路歷程。

(一)、婚配方式影響母親在家庭的位置，讓三位新台灣之子有左右為難的無力感

三位新台灣之子中，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和不一樣的我，其父母親的婚配方式為自由戀愛，在他們的經驗裡，母親雖然是外國人，語言、飲食、宗教信仰偶會與台灣的習慣有所不同，但在母親的努力融入下大致能夠與家人相處融洽，台灣的家人也能夠給予母親一定的尊重。而尋找另一片天的父母是透過婚姻仲介而結合的，台灣的家人在對待由婚姻仲介而來的母親，就顯得格外的輕視和挑剔，持續對母親身分懷著刻板印象，使得婆媳衝突不斷延伸，尋找另一片天也在當中面臨是否要認同母親的兩難。

尋找另一片天從小就不斷經驗媽媽被阿嬤罵、嫌之後，所出現的諾大情緒反應：

「那種口氣吧!就像是罵的那種感覺，很大聲那一種」(I2-1-011)

「我媽媽很常就被我阿嬤搞到，就每次一直哭，可是也不是很常，反正就有時候吧，就是情緒爆發的時候會這樣子」(I2-1-021)

就在姐弟二人分別上小學後，媽媽開始向他們吐露心聲：

「我國小一年級時，就講說她現在很累，又被阿嬤罵，就說很想離婚，說她一直想搬出去，可是又不行因為有我們小孩子，她要照顧下去啊！」(I2-1-025、I4-1-009)

對當時年紀還小的二姐弟而言，媽媽想離婚的念頭帶給他們一種恐怖、難過的心理感受，會希望父母親不要分開，媽媽可以繼續留在家裡：

「就感覺離婚這個名詞，因為小時候就學校也會教，離婚這名詞就是要分開嘛，就感覺是很恐怖的樣子，突然變成這樣就很不習慣」(I2-2-073)

「聽到時會覺得很難過」(I4-1-011)

「就難過說不要分開啊!就希望爸爸媽媽不要走，就好好的在一起啊！」(I2-1-029)

雖然姐姐不喜歡阿嬤以瞧不起媽媽身分的態度對待媽媽，但由於只是個孩子，卻對無法插上手感到難受、無奈、無能為力：

「就明明沒有做這種事，她就很愛跟旁邊的人講啊，打電話到處亂講啊，我們家阿嬤就是瞧不起媽媽」(I2-2-061、I2-1-087)

「聽了就很不耐煩，就有時候會想跟阿嬤吵起來」(I2-2-059)

「就很難受啊!就也無奈啊!因為小孩子也沒辦法做什麼」(I2-1-026)

「那時候也無能為力對，而且重點是家裡面有爸爸媽媽在嘛，如果這樣講的話應該會被打」(I2-2-063)

心裡也清楚就算媽媽離開家，情況也不會有改善，因此能夠看見媽媽在家裡的辛苦與壓力，會自然在情感上與媽媽靠近，並提供支持：

「就算搬出去，媽媽被瞧不起的情況也不會改善，一樣啊！」(I2-1-026)

「知道媽媽壓力很大，覺得媽媽很委屈，所以就會跟媽媽比較好，會去安慰她」(I2-2-074)

而和姐姐不一樣的是，弟弟最初雖然也會對媽媽想離開家的念頭感到難過，但後來卻以情感隔離的方式呈現，在理智中隱含對台灣家人的間接憤怒攻擊：

「搬啊就搬啊!直接搬啊!誰管她(阿嬤)」(I4-1-010)

以本研究三位新台灣之子的主要照顧者都是新移民女性的經驗而言，新台灣之子在家庭中最初社會化的對象理應以母親為主體，但從尋找另一片天的經驗得知，當他們目睹家人對母親的不尊重與不平等時，內心非常地錯綜複雜，一邊是台灣的長輩家人，一邊是生養自己的新移民媽媽，長輩對待媽媽的不合理都看在眼裡，卻還是得「尊重」長輩，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似乎呈現不得不接受台灣家人對媽媽的態度，而將與媽媽間的親子關係轉為不能太靠近的「默默支持」或完全不靠近的「情感隔離」的矛盾心理狀態。

(二)、老師、同儕的負向標籤，讓三位新台灣之子對自我和母親開始感到懷疑

隨著時間的往前推進，當他們到了就學年齡，開始進入學校讀書，學校的老師和同儕變成了第二個社會化的重要機構。就在此時，尋找另一片天(姐姐)和不一樣的我分別於國小和國中時，發生老師於課堂上公開詢問身分的事件，這使得她們開始意識到自己身為外籍媽媽小孩的自卑感：

「我們班其實也有三個是從小學就開始經驗到，其實因為我幼稚園的地方比較奇怪啊，然後重點又是那一班人又好少，而且幼稚園這麼天真不會 care 什麼的，然後小學的時候就有被問，有點被意識到」(I2-1-049)

「國中以前都覺得還好，沒有覺得丟臉自卑的感覺都沒有，就自從被講之後就覺得就外籍的有這麼討人厭嗎？」(I3-1-013)

在老師為她們的身分揭開序幕後，加上早期學校教育對於新移民的多元文化概念並沒有有系統的傳授，在對東南亞女性傳統刻板印象下，接踵而來的是同學對她們的特殊眼光，對於被別人用異樣眼光看待、用歧視字眼稱呼她們會感到生氣：

「就被叫印尼馬，然後就很不爽」(I2-1-050)

「會生氣，他們又沒有比我們好」(I2-1-040)

「就覺得他們也有被排擠吧，憑什麼資格可以講我們」(I3-1-056)

受到外界不友善的對待後，不一樣的我內心於是產生一種無法理解與埋怨自己身分的心理感受：

「為什麼我是外籍的那種小孩，當時就會覺得為什麼為什麼很多的為什麼，為什麼他們不可置信？為什麼他們要嘲笑我？為什麼…為什麼…對啊就有點怨天尤人」(I3-1-023)

從此，這樣的感受就一直跟著她，國中經驗自身身分被貶低，高中經驗媽媽母國被貶低，雙重的創傷讓她現在很敏感別人對自己身分的看待，心裡會有自我懷疑和羞愧的感覺：

「大家都會感覺是外籍配偶生的那種感覺，羞愧來源是小時候的那種眼光，就會在意別人說是不是這個身分不好，其實如果現在講到自己身分不好的事情就會覺得很羞愧，可是如果平常沒有怎麼樣的話不會覺得羞愧，是別人如果說你這個身分不好的話就會」(I3-2-102)

在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的經驗裡，並沒有如尋找另一片天姐姐和不一樣的我一樣，受到老師的公開點名，而是自行以自豪之姿揭露身分，但卻意外招來同學對母親身分的誤解，同儕家長仍是以傳統東南亞新娘的概念來詮釋，並以此傳遞給同儕，而這樣的誤會除帶給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人際關係衝突外，當母親積極參與學校事務時，也容易被讓別人用放大鏡檢視，讓他和母親間的親子互動關係由親密到覺得被媽媽連累，而轉為保持距離，不喜歡媽媽到學校：

「其實我們在五年級的時候很好，他媽媽都會跟我媽媽聊天，不知道聊到什麼東西到最後反而是吵架，他也很不喜歡我媽，可能有一點連累吧！」(I1-2-043)

本研究從三位新台灣之子在學校場域的經驗發現，三人的同儕或師長對他們的雙國身分均抱持一種標籤、輕視的態度，讓他們的心裡產生自卑、羞愧與自我懷疑感。依 Cooley (1956, 1964) 的「鏡中自我」和 Mead (1934) 的「社會自我」理論所提，個體會由重要他人和參照團體所反映的評價中，發展出對自我的形象感受和概念，三位新台灣之子從老師和同儕處接收到負向的形象回饋，感受到外在環境對自己投以歧視的異樣眼光，不僅影響他們在自我認同發展上出現低自我概念，以及對媽媽與對自己生氣的心理衝突感，也對於是否要選擇對母親進行認同有著潛在的矛盾感受。

(三)、外力事件讓三位新台灣之子對母親母國文化產生心理的趨避衝突

三位新台灣之子們在學齡前與學齡階段除了學習主流文化，他們的母親也會在日常生活中以各種方式傳遞母國文化。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從 4 歲起常吃到媽媽做的馬國食物，也常有機會跟著媽媽一起回母國，感受到馬國家人在語言上的多元能力，觀察到馬國與台灣不一樣之處，以及被馬國飲食開啟味蕾，而興起主動認識馬國語言、文化的強烈動機。媽媽在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幼稚園至小學階段，為增加他到馬國時語言使用的便利性，開始教他馬國常用的三種語言。尋找另一片天和不一樣的我於幼稚園時期，對於媽媽有時會煮印尼食物、說印尼話以及用印尼文寫信感到好奇，他們的媽媽也順此機會分別於幼稚園和國小時期，教孩子們認識印尼語的說法和文字的書寫。

在他們學習過程中，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在幼稚園至小學低年級階段，透過聽二國家人日常生活的對話，樂於學習二國家人所使用的多種語言，不會特別選擇何者學何者不學，而尋找另一片天和不一樣的我則會傾向將印尼語跟國語和英語做比較，覺得印尼的語言和文字均較國語和英語來得困難，且用到的機會不高，於是他們僅選擇學習幾個較實用的用語，以做為基本的認識，或是成為與媽媽之間的親子共同語言。

在小學低年級階段，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的媽媽雖然有教馬國母語，但主要還是跟著孩子一起學國語的注音符號，學習和適應台灣文化，並沒有特別具強烈意圖要將母國文化置入給孩子。至小學中、高年級時，媽媽先是加入學校的志工媽媽行列，後參與新移民組織團體，自此熱衷於各項與新移民有關的活動：

「三、四年級時每次學校都會發一些什麼新移民的活動、姐妹聚會，問說你要不要來參加，那時候我就無聊，拿那些紙來折紙飛機，然後就不見了，回家都沒有交給家長，有一次是老師看到我這樣子，然後他就用信封袋把那張紙包好親自交給媽媽，那一次之後媽媽就加入學校志工團，懇親會每次必到，懇親會都會選班級代表之類的，她當很多次會長，然後又加入外籍配偶中心」(I1-2-029)

更於他報考母國母語聽說讀寫比賽失利，聽取教授評審的嚴厲建言後，積極督促他學馬來語，重新奠基馬來語聽說讀寫的基本能力，也在半推半就下參與新移民組織活動，國二時，甚至還要犧牲假期與最喜歡的電腦遊戲，參與馬拉松式的培訓課程，在自己的需要與媽媽的期待間感到很難抉擇，剛開始即萌生想要放棄的念頭：

「多元文化講師培訓很辛苦，因為每個禮拜天都要犧牲掉禮拜天，玩東西的時間，從早上 6、7 點要起來去搭火車，晚上 9、10 點才到家，趕到台北又要趕回新竹，中途很想放棄，我有跟媽媽說我要退」(I1-1-051)

正在猶豫是否要退出訓練之際，發生了自己的表現不被肯定的情況，更加懷疑自己接受訓練的目的，後來因不想讓別人看輕而堅持到最後，完成訓練時，帶給自己一種榮耀和成就感：

「受訓過程中又因為帶領的課程準備不理想，而被阿姨們指責，我當時哭得非常難過也很生氣，不知道為什麼自己要去，後來我因為不服氣，想說前面都堅持這麼久了，就傳簡訊給媽咪說我一定要完成訓練，所以就繼續堅持下去。最後和媽媽一起完成訓練，拿到證書有一種開心、得意的感覺，因為從一開始有 20 多個人去，都爆滿，中途有很多人都放棄，然後最後不到 10 個，原本有很多都是台北人、屏東人，最後拿到證書的都是新竹人」(I1-1-055~056)

但由於有這段被評價的負面經驗，在他心裡深處存在著一股不想再提的羞慚感，即使從小開始就有很多上台表演的機會，培養出穩健的台風，仍會在意他人如何看待自己：

「四、五年級開始媽媽就會要我上台去唱歌，台下就一堆人，我有訓練過，所以敢上台不會緊張，國一國二時一堆課程都需要報告，就地理報告每次完老師就說我很厲害，可以講得很清楚，不會像平常一樣結結巴巴，然後每次分數都是最高分，這是個好處」(I1-2-028)

「不想再提這些事，覺得很丟臉，如果表現不好就會很丟臉，全部的人都在看我」(I1-3-023~024)

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在接觸與學習母親母國文化的過程中，從原先的有動機主動學習，繼因比賽失利及母親活躍於新移民組織活動，被母親半強迫參

與學習，又在其進退兩難的時刻被評價學習表現，後雖因自己不服輸的意志力完成訓練獲得成就感，以及一直以來均對從小被培養出的穩健台風感到得意，但這樣的挫敗經驗卻讓他產生深刻的丟臉心理感覺，變得在意他人看待自己的眼光，也認為馬來語與英語相較之下是不常用的語言，當務之急應是將英語學好才是，對於馬來文化學習的熱誠度不再如當初強烈。

尋找另一片天和不一樣的我在幼稚園階段初接觸母親母國的飲食、文字時，除覺得語言、文字很奇怪，對飲食重口味感到不可思議外，更重要的是有一股油然而生的佩服感，也能欣賞媽媽母國文化的特別之處。二家的媽媽在教導印尼文化的過程中，由於同時也需要學習和適應台灣文化，所以沒有特別期待他們一定要學或接受多少，雖然主流文化的語言使用與生活習慣，影響他們對母親母國文化採選擇性的學習與接納，他們也卻能夠自在地選擇。但就在他們上小學和國中之際，學校老師、同學甚或鄰居對他們身分的標籤與污名事件，在他們心中劃下一道深刻的傷痕，使得他們於日後是以保持距離的方式與母親母國文化作互動，呈現出接受它的存在，但並不特別共同參與的狀態。

本研究中的三位新台灣之子，在認識、學習父母雙國文化的過程中，父親這一方的台灣主流文化是主導他們生活方式或認同選擇的準則，孩子透過社會學習方式被模塑成該文化所期望達成之特質，但在面對主流文化的同時，對具有雙國文化身份的他們而言，會因此帶來需承接多少母國文化的心理掙扎與衝突。

在三位新台灣之子的經驗中，發現當他們意識到外在大環境對來自東南亞的母親抱持著貶抑的態度，連帶對自己貼上負面標籤，心裡便會興起若學習了母親的母國文化後，外界恐將自己與母親身分劃上等號的內在擔心，或是當學習變成是外力所驅使的一種不得不的狀態，與主流文化發展的方向相抵觸時，內心對於母親母國文化的學習將衍生一種「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矛盾衝突感，充分顯示當他們嘗試進入主流族群，卻不被接納、認同時所產生的雙文化認同困境。

二、新台灣之子行為反應與心理調適情形

三位新台灣之子在家庭、學校和社區場域中面對被標籤和貶抑的經驗，分別有著外顯反擊行動、尋求家人支持後分心轉移、內在心理自我調節、重新詮釋被認定的「低下」的特質、發展出事實澄清與雙國文化經驗分享的問題解決之道，以及呈現願意表態自己的身分，但不正面回應他人任何好奇的心理調適歷程。

(一)、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因主動公開自己的身分，使得媽媽被同學誤會是經由買賣來的，而遭受到不友善的對待，當同學用髒話罵他，或是對他刻意開玩笑、栽贓時，他有時會因氣不過而出現言語和行動上的反擊：

「我有時候會跟他們吵架、互罵，有時候要理不理的，因為他們也會罵別人，我們也經常因為朋友間的派系猜忌互相吵。有時候會跟他們打架，如果他們再講我就繼續打，打到他們不講為止，嚇阻一下」(I1-2-044)

尋找另一片天和不一樣的我也因同學和鄰居的語言標籤、霸凌而有想打人的念頭或就直接以回嗆的方式堵對方的嘴：

「就是看到他們的嘴臉、想到他們的嘴臉就想扁下去」(I3-1-014)

「我弟就只要對方講一句話、一個字，他就馬上講，不給他講第二句話的機會」(I2-1-041)

「先是完全不理他，他就說印尼古怎樣怎樣，然後我就直接嗆他說你信不信我放火燒你家，他就不敢啦！」(I4-1-021)

尋找另一片天和不一樣的我剛開始對於自己的身分並不會感到有特別不一樣，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甚至對自己的不一樣是感到驕傲的。然而，他們對學校和社區中不斷發生的被標籤、霸凌言語和行為感到生氣，為了捍衛自己與媽媽的尊嚴，令他們不得不採取各種防衛行動，來為他們自己的身分發聲。

因此，關於原有對新台灣之子具低自我概念、生活適應不良與人際關係建立困難的刻板印象與結論，透過本研究三位新台灣之子的經驗明顯透露出「社會共謀建構」的現象觀點。

(二)、尋求家人支持後分心轉移

傷痛往往帶給人們力量，卻也帶來脆弱，尋找另一片天(姐姐)和不一樣的我在生氣反擊後，也會找家人傾吐，情緒雖獲得宣洩，但卻發現並無法對現狀有助益：

「去找弟弟啊！就晚上跑去他那邊睡覺，兩個人就全部亂聊、亂發洩，聊到兩個人都睡著」(I2-1-084)

「找家人吧！其實說是找同樣的話，講出來的話也不太可能激勵多少啊！」
(I3-1-054)

為了不被傷痛傷得更深，忽略、不在意、轉移注意力至開心的事物上，是一種最直接的心理保護傘，於是，她們選擇以不理會的方式因應外界的標籤眼光：

「一開始聽的時候會回嗆，久了之後就直接不理他就好了」(I2-1-057)

「我一開始就不理他，因為我覺得跟他生這個氣也沒什麼值得的啊！」(I3-1-034)

但在外界負面聲浪仍持續蜂擁而至時，不理會轉由性質相同的一笑置之取代，或將注意力轉移到開心的事物上：

「我就笑一笑就沒事啊，因為我其實就這個人很健忘吧！」(I2-1-059)

「這種中傷的事情不要講太多也比較好，找開心的事情吧！去玩啊，和朋友在一起玩」(I3-1-039)

想刻意壓抑不受外界的影響，但傷口卻會不時隱隱作痛，不去聽、不去想其實做起來並沒有那麼容易：

「悶在心裡一下，就是之後有一段時間就會淡忘，但是你有時候就是還是不經意想起來會難過，就一個人想一下就沒事了」(I3-1-036)

(三)、調整內在正向語言來自我肯定

當代學者 Michael Berzonsky 與 Neimeyer (1994) 認為個體是基於過去、未來、個人與社會關係等特徵來發展自我認同，且自我認同是自我調節 (self-regulation) 的工具。當青少年發現自己嘗試完成一個目標，而不能完全改變社會時，就必須改變自我，找尋達成目標的最佳方法以達到目標，在這樣的情況

下，適應是處理達成目標過程失敗或損失的一部分（引自黃德祥主譯，2006）。

在本研究中，尋找另一片天(姐姐)和不一樣的我除了以外顯反擊行動、內隱壓抑的方式面對外界對自己的傷害外，也努力將外在負向評論透過建構內在正向自我對話進行調整由看見自己和媽媽的好來認同、肯定自己：

「有時候就會想說混血兒其實也有好處啊!混的漂亮的話其實也不錯啊!」
(I2-1-042)

「覺得我媽這麼好就是也不會覺得很丟臉，這個身分就這個身分啊，你也不能怎麼樣啊，就好好做自己就好」(I3-1-024)

本研究在尋找另一片天(姐姐)和不一樣的我的經驗中，呈現不能改變社會就改變自我內在語言的心理調適歷程，這樣的調適是在她們無法被周圍環境所接納後，所發展出來的一種自我解套的心理安全防護機制。

(四)、重新詮釋被認定的「低下」的特質

Tajfel (1979) 指出低地位團體的成員會以發展團體內的自尊，重新解釋被認定的「低下」的特質，透過藉由強調自己所屬團體特色的方式，來讓他們不會再顯得低下，而與主流團體產生區別（引自 Phinney,1990）。

尋找另一片天姐姐在屢經驗別人對自己身分的異樣看待後，也發展出正視自己的身分，並重新定義在他人眼中被視為「低下」特質的因應：

「聽到別人說啊印尼來的喔，然後就外籍新娘來的，我就說對啊怎樣，比你行比你好多了怎樣，就多了這個血緣我就比你好多了，總比不是平埔族加混中國的來的好，我比你混的更多怎樣，中國的血洗掉啦!」(I2-2-078)

透過此一解構外在對自己所持負向認知的過程，她在認知與心理上進行建構新的自我與母親母國文化認同的自我調節(self-regulation)，讓自己更有能力適應主流社會環境。

(五)、事實澄清與經驗分享

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雖然對同儕的誤會和舉動感到生氣，會予以反擊，

但因此誤會令自己和媽媽都很受傷，促使他向母親詢問嫁來台灣的來龍去脈後，盡全力向同學們說明，同時也跟他們分享接觸母親母國文化的經驗，期待同學們在了解事實真相後，能夠不再以標籤媽媽的眼光來看自己的身分：

「後來我也有問媽咪，媽咪跟我講她不是他們說的那種情況之後，我就有跟他們解釋，或是跟他們說我可以經常出國，那裡有多好玩，一直說到他們懂為止」(I1-2-044)

在此同時，不同於尋找另一片天(姐姐)和不一樣的我學校老師照本宣科的做法，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的學校老師在課堂上對新移民的概念予以重新概念化，助其一臂之力，讓同學們對於新移民母親與孩子的背景、身分能有更多的了解和尊重，讓他逐漸感受到被接納，也從這樣的經驗中學習到內斂的重要性：

「後來老師在小學六年級教到這個(新移民)單元，提到台灣一直是個移民社會，從早期的閩南、客家兩大族群，到光復時期的外省人，到近年來的婚姻新移民概念，當同學們知道之後，我和幾個原本要好的同學又和好了，我媽媽才比較常去學校」(I1-2-044)

「還是有一些同學會覺得我很特別、很幸福，每年都可以出國玩，並不是每個同學都用異樣眼光看我，否則我應該就不會想要去學校了」(I1-2-049)

「很有趣，別人沒有這種記憶。覺得還是不要炫耀比較好」(I1-2-045)

(六)、正面表態身分，但以打岔方式回應

尋找另一片天的弟弟雖然在學校沒有發生和姐姐一樣被公開點名的經驗，但因有被鄰居標籤的經驗，所以當朋友提及自己的身分時，也採先堅定表態立場，後對於朋友們的單純好奇以無厘頭的方式做回應：

「朋友是不會講啦，他只會說你印尼喔，我說對啊不行喔，然後他說你去過印尼嗎？沒有。那種問題是覺得不會讓你覺得不舒服，他們就只是好奇問一問一些有關印尼那邊有什麼好玩的事情，然後他就會問我說為什麼你不去印尼？我就說我小時候看過鬼啊！」(I4-1-031)

其中可以看出他雖然感受到被朋友接納，但過去經驗讓他對於坦露身分一事仍是小心翼翼，以不回應就是最好的回應來保護自己不再度受傷。

本研究中的三位新台灣之子帶著雙國文化身分，在充滿污名化意識形態的台灣環境生活，呈現不斷經驗罪惡、無力、自卑、自我厭惡等心理感覺歷程。然而，

在這樣的歷程經驗中，可以看見他們非常努力地透過各種內外方式，對外藉由行動傳達不想被標籤化的心聲，對內則嘗試用自我語言重新建立被毀壞的自我形象，持續經由同化(將新訊息併入其既有的基模之中)和調適(改變既有基模以納入新訊息)的共同作用，來提高自己對環境的適應性。

他們如此奮力地在充滿污名的環境中掙扎，目的即在尋找能夠安撫自己受傷心靈與適應社會眼光的安身與安心之處，他們用自己能夠掌握的方式幫助自己發展正向的自我認同，找到自我相信的自己，同時也在向外在系統傳達社會是否願意拋棄舊有的成見，以新的觀點來了解他們的訊息，讓他們有機會可以成為想要成為的自己。



三、新台灣之子對雙國文化的認同狀態

三位新台灣之子從家庭裡與來自東南亞媽媽相遇的那一刻起，一路與家庭、學校、社區中的人、事、物產生內外經驗的互相衝撞，展開雙國文化認識與選擇認同的旅程，交織成對雙國文化的認同狀態有以融合二國文化優點、認同台灣文化但同時重視母親母國文化價值、強烈認同台灣文化等形式呈現。

(一)、新生活經驗啟蒙對母親母國文化的認同感

三位新台灣之子對於母親母國文化的認識皆開始於家庭，透過與媽媽的共同生活，最先發現不同於台灣文化的是在語言和飲食方面的獨特性。後有機會隨母親回母國，也進行了一趟開啟感官知覺的體驗之旅。

1、 浸身多元語言的環境

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有屬於他們專用的語言，生活在台灣，三位新台灣之子們發現除了國語和地方方言外，媽媽竟說著自己沒有聽過的語言：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常常聽到奶奶、姑姑和爸爸用客家、廣東話對談，媽媽也常用廣東話與爸爸交談，回去馬來西亞時，馬國家人都會同時使用馬來語、英語和廣東話和媽媽說話，讓他對於媽媽與馬國家人刮目相看；尋找另一片天的阿嬤和爸爸在家裡常用的語言為客家話和台語，雖然對於媽媽說話腔調和其他家人不同而感到奇怪，但當他們聽到媽媽與朋友說話或和印尼家人通電話，能夠以四種不同的語言做轉換，與自己在學習印尼語言文字感覺到很難學的經驗相對照時，就覺得媽媽非常厲害；不一樣的我其祖父母和爸爸在家裡常用的語言為客家話，和尋找另一片天同樣有對於印尼語言和文字很難學，媽媽卻能夠運用自如的不可思議感，不過她對於媽媽的佩服，更多是來自於媽媽以一個外國人的身分能融入台灣家庭的不簡單。從小孩子的眼光看大人的世界，媽媽對於多種語言的使用和對環境的適應能力，是他們望塵莫及的，也因此對媽媽的母國文化有了初步的欣賞。

2、 有特色的美食饗宴

在家庭裡除了語言的經驗交流外，飲食也是三位新台灣之子能夠認識母親母國文化的途徑。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從和父母過小家庭生活起，不論是在

台灣或回馬國，主要跟著媽媽以吃馬國口味的食物為主，這樣的飲食習慣讓喜歡美食的他，因鍾愛馬國飲食而傾向選擇居住於媽媽的母國；尋找另一片天和不一樣的我則因與祖父母同住，飲食習慣仍以台灣口味為主，相較之下，媽媽所煮的印尼食物口味偏重，而僅能接受較清淡的料理，但對於印尼一些有特色，味道可以接受的食物，也能夠讓它融入於台灣的飲食中。

3、迥異的風土民情

除了在台灣和媽媽一起生活，他們也有機會跟著媽媽回母國，有著敏銳觀察力的三位新台灣之子們，開始感受和台灣不一樣的國家風情。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觀察到不同於台灣的高樓大廈，馬國的房屋多屬平房式建築，人口的族群組成也較台灣多元；不一樣的我觀察到媽媽與印尼家人的感情深厚，印尼多以腳踏車和三輪車做為交通工具；尋找另一片天(姐姐)和不一樣的我二人共同對於印尼慣用冰水洗澡、洗衣，熱水不易取得的狀態，感受到很大的不習慣；三人同時均能感受到東南亞四季如夏的氣候狀態，而能夠理解當地人經常飲用冰品、使用冰水洗滌的特色。

對三位新台灣之子而言，媽媽的與眾不同為他們帶來各種新奇的生活經驗，雖然在台灣主流環境中生活，語言和飲食主要都依循其形態，對於母親所呈現與台灣相異的母國文化在認同的強度上不一：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因與母國文化接觸較頻繁，再加上自己由卡通而來的想像與連結，致較認同母親的馬國文化；尋找另一片天和不一樣的我則傾向以主流文化為要接納多少母親母國文的依據，但即使或因為媽媽的飲食習慣與台灣差異過大，或因為語言不通而聽不懂印尼卡通對話內容，或覺得在印尼的生活方式較台灣不便利，他們均能夠有自己怡然自得的適應方式，如，看卡通畫面聯想、吃口味能接受的印尼食物，看見差異下的優勢並予以珍視。

三位新台灣之子在這個時期對於二國文化是不帶有任何評價的，三人之所以會有認同程度的差別，係因個人所處的生活客觀條件不同所致，人們對於自己經常接觸、熟悉的生活環境事物認同度自然較高，但本研究從尋找另一片天和不一

樣的我生活經驗可知，和主流文化不同的事物未必完全被排斥在外，他們還是願意去看見、欣賞母親文化的特別之處，且具有涵容差異的能力，此現象與 Cross (1978) 和 Kim (1981) 認同理論所提及「少數族群在移入新環境的初期，為了在短時間內成為被主流社會認同的一員，他們會傾向先放棄己族的社會文化，納入主流社會的價值體系、態度或行為標準」的觀點有差異，雖然新台灣之子的雙文化認同議題與傳統理論所提的少數族群不盡相同，但可看見三位新台灣之子在雙文化認同的初始階段，父親的主流文化因為地利的關係而有一定的影響力，可是他們並不會呈現完全接受主流文化，拒絕母親母國文化的絕對狀態，而是有一種在雙國文化間自由挪動的可能性。

(二)、社群關係為認同母親母國文化帶來挑戰與機會

當三位新台灣之子的生活環境由家庭不斷向外拓展，視野的開展會為他們帶來對母親母國文化認同的挪動，10 歲的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雖因環境感觀不良對馬國感到失望，讓他對媽媽國家的認同感稍微鬆動，但仍覺得媽媽是外國人是很酷、可以跟別人炫耀的事：

「大概 10 歲的時候，回馬來西亞覺得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好。我記得在馬來西亞吉隆坡有個地方很噁心，那個煙蒂是丟了滿地都是，一大片，我就覺得好髒、好噁心，地上髒髒的，人也沒有特殊功能，失望很大」(I1-1-082~085)

而從三位參與研究的新台灣之子生活經驗中發現，更多影響他們對母親母國文化認同的因素，其實是來自於學校老師、同儕、同儕家長、鄰居等社群關係，依主流文化價值觀建構而來的排外氛圍，但透過理解母親的生命經驗、看見自己從母親身上的獨特傳承，以及被主流文化接納，也能讓他們在經驗主流建構的同時，願意有不同的選擇。

1、從學校、社區關係中被排除

Bronfenbrenner (1979) 指出，來自兩個不同文化婚姻結合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可能比一般的孩子承受更多負面壓力，週遭社會成員的排斥會造成其

適應困難或低自尊，導致心理適應失調，甚至認同困境（引自夏曉鶯，2005）。

本研究中的尋找另一片天和不一樣的我，分別在國小、國中時期發生被老師公開標籤身分的事件，後來又遭到同學、鄰居拿他們的身分開玩笑，影響他們後來選擇與母親母國文化保持一定的距離。

不一樣的我在幼稚園至高中時期雖然透過在台灣與母親共同生活，以及隨母親到訪過印尼，能夠觀察到印尼文化與台灣文化的差異與獨特之處，但由於長期生活於台灣，印尼語言不常使用的陌生感、少回印尼而與母親母國家人感情不深等因素，所以很自然地對熟悉的環境選擇認同：

「感覺就是比較少接觸印尼的文化，就覺得對印尼那邊很陌生，所以覺得就是台灣人」（I3-1-078）

「因為已經習慣了，如果印尼跟台灣讓我選，我選擇台灣，畢竟是熟悉，對台灣的感覺比較深，土生土長啊！」（I3-1-081~082）

但透過生命經驗的回顧，更多想讓自己成為道地台灣人的內在心理運作，是來自小時候被歧視的經驗：

「別人如果提起就會記得說你還有一半是印尼血統」（I3-1-080）

「羞愧來源是小時候的那種眼光，大家都會感覺是外籍配偶生的那種感覺，就會在意別人說是不是這個身份不好，其實如果現在講到自己身份不好的事情就會覺得很羞愧，可是如果平常沒有怎麼樣的話不會覺得羞愧，是別人如果說你這個身份不好的話就會」（I3-2-102）

國、高中時期二度被歧視的經驗，更是影響她對母親母國文化缺乏深入了解動機的最重要因素，就她的生活經驗值，在主流價值觀的眼光下，不符合當地風俗民情的文化，是很難被接納的。因此，也就不會多加詢問母親關於母國文化的事情：

「問了她應該也會講，我們連問都不想問。因為太麻煩啦，知道也不能說什麼啊，就像很有名的泰國潑水節嘛，台灣北部很盛行，到這邊還不是一樣沒有什麼用，然後在南部幾乎很少看到喔，你噴水人家說你浪費水」（I3-1-073~074）

此負向過去經驗影響她在雙文化認同過程中，對於在別人眼中可以接觸台灣以外的文化並不感到光彩，且極度認同台灣：

「就是因為礙於身分有印尼跟台灣人啊，就只是說知道比較新奇的東西，但並不會因此感到開心，同學們這樣問雖然沒有惡意也只是好奇，可是心裡就會有不喜歡的感覺出現，印尼的接觸的比較少，然後也不常用，所以就比較生疏，所以都還是比較喜歡、習慣台灣的，因為在台灣同化了吧！比較喜歡台灣，台灣的比較好」（I3-2-089~090）

現在提到關於媽媽國家的文化，不一樣的我在認知上是接受、不討厭的態度，但在情感上並沒有喜歡的感覺，但對她來說，影響自己有這樣的落差，傾向選擇認同台灣文化，不是認為媽媽本身或印尼國家不好，而是因為媽媽母國在別人眼中是不入流的，外在對媽媽母國的負面評價，讓自己在自我與文化認同上，深受過去經驗的影響：

「我不會討厭媽媽那邊的文化，但也不到喜歡的程度，就都接受」（I3-2-104）

「不是媽媽，媽媽很好，印尼沒有不好，是他們為什麼會覺得…就會在意別人說是不是這個身分不好，因為我是印尼媽媽生下來的小孩，而不是因為媽媽這種身分帶給我們覺得不好，就是別人啦，都是因為別人的關係」（I3-2-103）

2、 重新建構母親和自己於主流文化間的關係

在尋找另一片天和不一樣的我幼稚園至小學階段成長經驗裡，雖然有著台灣和印尼的雙重血統，但在容貌與膚色上均和其他的孩子無異，語言也是學習主流文化的國語，再加上所處地域同質性高，當他們開始接觸媽媽國家的文化，進行語言、飲食、內團體朋友聚會等部分族群參與活動，接著知道自己的雙國身分，發現自己可以被接納時，即使語言和飲食不太能習慣，但樂於接觸媽媽國家的文化，此時他們對於台灣和印尼二國文化均持著正向、自信的族群態度。

而後進入中學時期，不一樣的我在國中被歧視的經驗於高中重複發生，使得她比尋找另一片天姐姐更強烈感受到父親這一方對母親母國身分和文化的貶抑，自己的母親無法被社會所接納和認同，這樣的現象讓她意識到有這樣的母親是丟臉的，但自己身上卻有一半是流著她的血，如此的矛盾使得她後來在關於母親母國音樂、休閒活動、慶典的族群參與活動上，心裡產生對母親母國文化不感興趣的變化，並轉為強烈認同台灣，有強烈隱藏認同母親母國文化之意。

而尋找另一片天雖然沒有什麼機會到訪印尼，也從小學開始就經驗外在歧視

眼光，致對在臺灣與母親共同生活中所得知的印尼文化也不太感興趣，但姐姐卻透過被動參與母親母國音樂的網路搜尋瀏覽，無意間發現印尼 MV 在影像製作上的手法優於台灣，因而進一步對印尼相關訊息投以好奇，並主動詢問母親，逐漸開啟對母親母國文化的探索之旅：

「有時候過年就會問我媽媽說那邊有沒有過年，好像跟我們差不多，一樣是穿新衣服到處亂晃，放煙火，但好像沒有拜拜這個習俗」(I2-2-037)

「例如看到榴槤，就問媽媽說妳們那邊有種榴槤嗎？那邊榴槤好不好吃？然後她就說晚上不要去偷榴槤，不然被砸到就會死掉，或是就看到什麼好像爪哇島吧，就是電視上常報紙一些奇奇怪怪的島名嘛，然後就看下面標印尼兩個字，就問媽媽你是不是住這邊，媽媽就說不是，是哪裡」(I2-2-038)

由於能看見母親母國文化的優勢，使得尋找另一片天(姐姐)雖和不一樣的我相同，猶然認同自己是台灣人，但她並不會對自己的雙文化身分感到丟臉，也能夠向外傳達她所看見的母親母國文化的好，來調整外界對印尼文化是不好的刻板印象：

「如果沒有特別有人有瞧不起或者是輕視的態度，基本上是不會覺得，就是道道地地的台灣人」(I2-1-107)

「其實我不會對這份血緣感覺到很丟臉，你們說那個文化很不好嗎，不會好不好，比你們台灣好多了，意思就是說顛覆你的想像，你也沒有那麼差啊，其實你也很好不好，之前公視有播一部印尼連續劇吧，青春、愛情、還有友情啊親情那一類的，比台灣好看多了真的，印尼其實比台灣還不錯」(I2-2-079~082)

現在母親母國文化對尋找另一片天(姐姐)來說，在認同台灣文化的好以外，也覺得印尼是一個值得被開發的處女地：

「印尼的文化是一個未開發地區，因為沒去過也沒有認識過，然後台灣其實都習慣了，說實在話台灣是比較好了嘛，但是畢竟也是媽媽的家嘛，所以就是蠻想去看看的，也覺得值得去認識它開發它」(I2-2-083)

尋找另一片天自小從家裡開始就感受到父親這一方強烈對母親母國身分和文化的貶抑，後來也與不一樣的我同樣經驗老師、同學、鄰居的特別對待，深刻感受到自己的母親無法被父親、其他家人和社會所接納和認同，再加上主要生活

在台灣的主流社會環境，這樣的狀態也一度影響他們只認同台灣主流文化，對母親母國文化予以冷回應，但或許是他們自小即將母親在家中低位置的苦看在眼裡，加上從母親的生命經驗中傳承能夠適應外在環境的高抗壓特質，而早已在心理上與母親進行情感連結：

「我媽媽那邊就大概小學就開始工作，所以我小六的時候就被帶出去工作啦！就餐廳洗碗啊，洗了一堆，不然就是送餐。因為從早上做到晚，很累啊，以前會想簡直是虐待童工啊！但我媽說這是磨練啊，她小時候也都是這樣做，現在反而會想說努力工作的話其實比較好一點，因為抗壓性比較高啊！」(I2-1-115~119、I4-1-096)

雖然帶來不少適應和認同的危機，也希望自己在別人眼中能是道地的台灣人，但卻也能在好奇心的趨使下，讓她開啟看見印尼文化有勝於台灣文化之處的契機，願意再多看看除台灣以外的文化樣貌。

本研究由尋找另一片天和不一樣的我經驗發現，其雙文化認同的歷程為，初始雖在主流環境中生活，接受主流文化教育，因沒有被視為異己，而能夠對母親母國文化採開放態度，後因經驗被主流文化歧視，而讓他們在自我與文化認同上開始產生心理衝突與混亂，為了能夠讓自己適應主流價值環境，遂透過內在語言的自我調節方式，選擇強力認同台灣文化，捨棄母親母國文化來因應外在加諸自己的歧視。同時在研究過程中也發現，不同於不一樣的我般絕對認同主流文化的狀態，母親在台灣主流社會下被對待的關係形態，以及從母親身上所學習到可以讓自己與眾不同的特質，影響尋找另一片天(姐姐)呈現出對母親母國文化的認同狀態由全然捨棄，轉為重新看見母親母國文化的價值。

3、擁有歸屬後對雙國文化的欣賞

而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雖然也在國小時期經驗同儕對其身分的標籤化事件，但較其他二位新台灣之子幸運的是，學校老師能夠透過教學的過程中，將新移民概念重新釐清和去標籤化，讓他得以被同儕接納，且母親從他幼稚園和小學階段開始，不斷創造機會讓他接觸母國文化，雖然他在過程中有時呈現半自願

狀態，但這也讓他對於媽媽國家感到認同：

「去年和幾個朋友一起玩一個名為『彈彈堂』的網頁遊戲，裡面有一樣裝備叫做『馬來西亞寶箱』，都沒有什麼越南寶箱阿、泰國寶箱，就只有一個馬來西亞寶箱，就覺得馬來西亞還真偉大呢！」(I1-1-086)

除了母親以各種方式傳遞母國文化外，相對於尋找另一片天的父親或因個性較內向少話、農忙無法教導，阿嬤對於祭祀活動的簡略說明；不一樣的我父親雖帶全家出遊進行實地到訪，但卻僅能走馬看花，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的父親會從日常生活、旅遊中的介紹與經驗分享，讓他了解台灣文化與知悉基本做人處事道理，而他也從一起回母親母國時看父親輕鬆過海關，和命理職業專長交談的經驗中，看見父親的能力，進而對父親產生崇拜感：

「我一直很羨慕我爸爸，他英文跟我一樣很菜，在我小時候我們去馬來西亞都要過海關，外國人跟本國人不一樣路線，所以媽媽沒有辦法幫我爸爸跟海關說英文，我爸爸說他就靠了 yes、no，和一些簡單的東西他就可以過去了」(I1-2-020)

「因為爸爸是命理風水師，往來大陸、香港幫別人看房子，他很強，我前幾天拿了我七個同學的名字給他，要他猜這些同學的個性是怎樣，他說的個性都對，所以我覺得他很強」(I1-2-052)

現在的他，也會因在學校有展現獨特自我的舞台，而以有雙國身分為榮，能夠看見二國異中有同之處，並傾向雙國文化融合的狀態：

「現在國一、國二覺得這個身分還不錯，每次講到馬來西亞大家就會說那是○○○的媽媽，都會由我來介紹，就覺得很光彩」(I1-2-057)

「我記得曾經在國一時，馬來西亞的家人來台灣找我們玩，回來後我在週記上畫一個圖是，將馬來西亞媽咪住的那一塊地方和台灣二個國家的地圖都畫出來，然後再畫手牽手，再畫一個愛心連在一起，因為我覺得二個國家的形狀長得都很像地瓜，可以當好朋友」(I1-2-058)

「所以我以後打算假如有辦法的話，曾經有想過說把馬來語或英語學好，可以去馬來西亞幫別人看房子」(I1-2-052)

Phinney、Horenczyk、Liebkind 與 Vedder (2001) 指出，特定族群的分散或聚集、家庭或同儕個人化的關係、學校或鄰里居住地的活動設置，甚至是宗教信仰，也會影響移民者的族群認同，由本研究發現，社群關係的網絡建構，的確會

為新台灣之子的雙文化認同帶來不小的影響。

(三)、主流文化的接納程度決定新台灣之子雙文化認同與心理調適狀態

1、 雙文化的認同與欣賞

從本研究中三位新台灣之子雙文化認同形成過程與結果狀態來看，台灣文化因生活環境之便，自然是最先被這三位新台灣之子接觸並熟悉，而在此同時，母親的母國文化也透過日常生活與孩子的相處經驗中顯現。最初，當他們與父母雙方二國文化互相接觸時，台灣主流文化雖占有地利之便，可以讓三位新台灣之子順其自然地選擇直接認同，但他們也能夠從母親所展現出的特質，看見母親母國文化的特別之處，有傾向融合方向發展。

2、 主流文化的在地優勢影響雙文化認同

然而，在發展自我認同的兒童與青少年關鍵時期，主流社會開始對「東南亞母親所生的孩子」投以標籤、歧視的眼光和行動，也傳遞什麼樣的價值、態度、行為是可被主流社會接受的。Phinney、Horenczyk、Liebkind 與 Vedder (2001) 以互動理論觀點在研究中指出，對移民者而言，雙文化的形成是重要目標，它包含成為主流社會的一部分，在達成過程中如果他們的努力遇到歧視或拒絕，不被大社會的成員所滿意和視為有生產性，則會令他們感到挫敗。

本研究從三位新台灣之子的雙文化認同經驗發現，成長過程中的負向標籤化經驗，會讓他們希望自己可以是道道地地的台灣人，以被主流文化所接受，所以認同過程中嘗試以放棄或隱藏母親族群身分背景的方式，尋求被同化來「通過」成為主流團體的成員而離開原有的團體。

3、 認同主流文化環境下的調適

雖然受到主流文化環境氛圍的影響，原先想部分認同的母親不被大社會所接納，使得三位新台灣之子們的內在開始變得混亂，以至於在尋求認同過程中，不斷透過內外自我心理調節機轉，甚或認同主流文化不重視母親母國文化，來調適自己在主流社會中的雙國文化身分。

但他們在趨向認同台灣文化之外，卻也分別因著家庭社經背景、重要他人、重要事件、個人與社會環境等因素，而產生不同的雙文化認同狀態：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因父母主動積極的傳遞二國文化，再加上老師重新詮釋新移民的定義，創造、接納多元與適才任用的氛圍，讓他重新認同母國文化，達成雙國文化融合；尋找另一片天(姐姐)體會低位置母親的苦與母親傳承給自己的高適應力優勢，而在情感上有強烈的連結，願意在心理上騰出一些空間，嘗試將母親母國文化納入主流文化中，傾向從同化走向融合；而不一樣的我則因過去被否定的經驗太過沉重，選擇全然地被主流文化同化。

比較三位新台灣之子的雙文化認同經驗，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其父母因社經地位較高，對於雙邊文化均積極傳遞與引導參與，而尋找另一片天和不一樣的我家庭屬於勞動階層，其父親相對於母親和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的父親來說並沒有太積極，但他們二人對於主流文化的認同強度，並不會因為父親的不教而影響，三人也不會因為母親較積極傳遞而傾向認同母親母國文化。

透過本研究細究三位新台灣之子的經驗發現，當中除了主流文化的在地性認同因素使然外，決定何以三人同時均有被標籤的負向經驗，但卻有著截然不同認同狀態的差別在於，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擁有被主流文化接納的經驗，使其在雙國文化認同的心理歷程，呈現從最早崇拜母親的國家與身分，認同母親母國文化，過程中因同學對母親身分的誤會、母親過度積極植入母國文化，而偏向主流文化、排斥母親母國文化，最後到在主流文化中能夠納入母親母國文化，對雙邊族群均發展出正向態度的狀態。而反觀尋找另一片天和不一樣的我，由於早期承受較多歧視的負向經驗，又缺少外在系統反映給他們的正向經驗，故在文化適應過程中就顯得比較辛苦，影響他們現在提及自己身分或與母親母國有關的事情時，會較容易與過去經驗所引發的負向感受做連結，甚或選擇與母親母國文化保持距離。

這三位新台灣之子在台灣社會中，最初接觸到的是父親這一方的主流文化，當他們發現母親的特殊性時，可能會對母親的母國文化產生興趣，但經驗家庭內、

學校甚至是大社會環境對母親的歧視，會促使自己轉而認同強大的主流文化，但認同了主流文化，似乎也無助於融入主流社會，這樣的情況在不一樣的我生命經驗中深刻呈現。

但即使如此，本研究發現，三位新台灣之子的雙文化認同也並非都是以同化狀態呈現，從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和尋找另一片天的經驗中，我們可看出孩子在社會化機構中的重要他人，如，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的老師；重要事件，如，重新詮釋新移民定義後被接納、與媽媽的辛苦有情感連結、看見媽媽傳承給自己的優勢能力均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均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由此看來，「被主流文化接納」、「母親母國文化被視為是有價值的」，是影響這三位新台灣之子雙文化認同傾向融合，以及正向心理發展的重要因素。



參、雙文化認同經驗帶給新台灣之子的生命亮點

在一連串關於新台灣之子生活適應不良、學習發展遲滯、學習動機意願低落的負面評價聲浪中，本研究透過三位新台灣之子對自己生命特殊意義事件的敘說，可以看見他們在尋找雙文化認同過程中，為自己重新編寫的生命劇本。

一、激盪生命的韌力

尋找另一片天因從小就經驗家庭、學校、社區的不公平對待，這樣的經驗隨著媽媽在他們成長過程中的工作訓練，發展出獨立的人格特質，此人格特質引領他們發展出成熟、自律的生活態度：

「我跟我弟兩個人是從小就覺得蠻獨立的啦，應該也是家庭因素的關係，不獨立很難生活。就是凡事不能依賴別人、家人，因為每次就不是別人家中傷我們，不然就是看不起我們，這個就是從小就要獨立啊！」(I2-1-076~077、I4-1-067~068)

「應該也是類似說心智要成熟一點，比他們還要好，就是說要乖不要怎樣不要做怎樣，就是比現在的那時候的人還要好好一點，就是要做的比他們好」(I2-1-078、I4-1-069)

這樣的道路走起來是艱難的，但他們看見自己能有這樣的生命韌力，不禁佩服起自己，而這也是他們未來面對各種未知挑戰的潛在能力：

「因為其實如果有一個人就是長期的中傷你，其實這樣也蠻難的耶！還蠻不可思議的。就是說熬過這一切吧！就是可以活到那麼大的歲數，很謝謝他們攻擊我們，我們才可以成長變得比他們還要成熟。這也是一種經驗吧，成長的過程對環境的適應很快」

(I2-1-079~081、I2-1-104)

二、雙國文化的優勢影響

尋找另一片天和不一樣的我的父母親均屬低社經地位者，學歷、薪水均不高，在主流文化的刻板印象中，新移民家庭因父母教養方式差異（陳明利，2004；劉秀燕，2002）、新移民母親適應狀況不佳（劉秀燕，2002）、家庭社經地位普遍低落（夏曉鵬，2000；莫藜藜、賴佩玲，2004），而為新台灣之子帶來各種情緒、行為和學習問題，但從本研究三位新移民之子的學習經驗中發現，新移民母親與台灣母親愛護孩子的心意，以及希望孩子好的期待並無不同，係因本身語言的限制，以及家庭現實條件、資源支持程度的不同而有差異，但三位新移民母親從母國所帶來的不同生活方式與生命經驗，與父親台灣文化互相碰撞後，卻也激盪出滋養的火花，讓她們的孩子有了不一樣的啟發和體悟。

（一）、期待不落人後，但接受限制

三位新移民母親與台灣籍母親一樣，都會對孩子在課業上有所期待，每當尋找另一片天和不一樣的我成績不理想時，媽媽們總是會以處罰和叨唸的方式，向他們表達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情：

「小學的時候成績不好，媽媽覺得還可以救，她就會打你」(I2-2-050)

「每次考不好都會說我有補習為什麼還是這種成績什麼什麼的，努力一點」
(I3-1-094)

但由於他們小時候不太能知道父母親的辛苦，也因為父母沒時間教，或對讀書沒興趣，因而荒廢了學業：

「因為小時候爸爸工作忙，成績這一類的他就沒辦法教，從沒有教的那一刻起我的成績就已經敗掉了，可能一直都不理想，之後爸爸媽媽就也就放棄了」(I2-2-049)

「之前就是還覺得我不想念書，很煩，而且國中課業很重，那些東西都不喜歡」
(I3-1-094)

這時候的他們因著現實條件的限制、父母親態度的轉變，以及選擇跟著自己的感覺走，對於自己的課業不理想，其實並沒有很在意。

(二)、昇華金錢價值，致力學業與生涯發展

一直到不一樣的我於高中時有機會跟媽媽回印尼，使用到印尼國家的貨幣，有了不同的金錢觀，同時也發現媽媽的辛苦，進而改變學習態度，於是就鞭策自己努力學習通過護理證照考試，好分擔媽媽的經濟壓力：

「印尼那邊的鈔票很小啊，他們的錢很小，每次出去都好多張喔，我都嚇死了動不動就一萬一萬多，自己拿在手上好多錢好爽喔，然後我媽說這才沒有幾百塊，幾百塊好可憐的數字」(I3-1-090)

「因為我的學校是私立的，然後因為私立的錢比較多嘛，然後我不想讓我爸就是負擔太重，就是花那麼多錢，然後就覺得護理的專業科目很重要，我就會努力的給它學好」(I3-1-070)

「我覺得我媽媽很辛苦對啊，她常常什麼班都不穩定啊，有時候這個班有時候那個班，覺得她賺錢很辛苦，然後就我不要讓他太花錢。趕快考到執照，趕快去工作，然後趕快把第一份薪水給媽媽，只想快點獨立啦！」(I3-1-091)

尋找另一片天從小就跟著母親到外面工作，由於體會賺錢的辛苦，所以物質欲望不高，也養成了節儉的習慣：

「就開始不在乎錢這種東西，就會感覺錢不重要，錢的價值變低的感覺，就只是說它是拿來買東西，然後這樣子而已，就是一點都不看重錢，就是物質慾不高的那種感覺」(I2-1-120~122)

「就像買東西你愈想買這東西，可是你會覺得還是算了，要省錢」(I4-1-099)

尋找另一片天(弟弟)也因為媽媽始終被貶低，而立志想要趕快藉由自己所學的一技之長謀職，讓媽媽可以擺脫經濟弱勢的污名：

「就是覺得你可以工作喔，你要讓自己媽媽過好日子，那時候小時候就沒有能力，現在可以，因為我媽很容易被人家瞧不起，就全部的人就看她說印尼窮嘛就這樣的觀念啊！」(I4-1-08)

(三)、適性發展，追求身心平衡與多元能力展現

新台灣之子的父母雖因著各種限制而無法在學業上給孩子協助，但他們選擇在有限的情況下做自己能做的事，尊重孩子的特質，讓孩子有適才適所的發展空間，且從言教與身教中傳遞比成績更受用的價值觀與做人處事態度：

「後來他們也轉為也可以接受說其實成績也不一定要要求的這麼的嚴格對，但是其實還蠻慶幸的因為其實成績算是不太好啦，我對實做比較強而已啦，所以後來媽媽也可以接受說就是按照我的程度來發展」(I2-2-050)

「我們家現在注重的是你的品德好一點，不要學壞什麼都好」(I2-1-124)

「我媽是說她不注重成績，可是她注重你的品性」(I4-1-098)

生命中種種經驗成就了三位新台灣之子擁有獨特的生命特質，就像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所相信的，新移民孩子不會是腦殘，反而有著一股堅毅、敏銳與彈性的生命活力：

「只是最近才知道說大家說新移民的小朋友是腦殘，我覺得會發生這種事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家裡有個語言天才的媽媽，我又聽得懂一些馬來西亞當地的語言，我雖然英語不太好，但是我對科學有興趣」(I1-2-035)

就本研究尋找另一片天和不一樣的我從社會所定義的新移民弱勢家庭所發展出來的優勢，進一步仔細探究可以發現，生活在母親為非新移民且同時被社會所定義的其他弱勢家庭中，也有不少孩子會突破逆境，為自己和家庭開創新局，但這樣的現象何以在非新移民家庭中容易被看見，卻在新移民家庭中因被主流眼光過度聚焦於文化差異所衍生的問題，而使得新台灣之子的優勢隱而不現。

研究者認為，如果與主流文化能夠不以「文化霸權」的觀點來看待新移民母親的母國文化，而是以一種欣賞和接納每一種文化都有其正面價值的心態來看待，這些原本由差異所衍生出來的問題，將不會是問題，也更能夠讓新台灣之子展現出他們多元文化的優勢。

第五章 終曲：看見、反思與前進

本研究藉由故事敘說，來探討新台灣之子在父母親雙國文化間的生活經驗，雙文化認同過程中的心理衝突、行為反應和調適，以及認同狀態，主要是以敘說探究之「整體－內容」、「類別－內容」的分析模式，進行資料的整理與歸納。本章透過綜觀全局的討論提出研究結論，並對研究歷程進行反思，書寫於研究過程中所看見的自己，作為與新台灣之子們共同前進的力量。

第一節、研究發現與綜合討論

本研究旨在透過三位新台灣之子在母親母國及父親台灣社會主流文化間之生活經驗，了解其在二種不同族群與文化間，會經驗什麼樣的心理衝突，帶來何種行為反應和調適，以及認同狀態。依據莫藜藜、賴珮玲（2004）研究顯示，跨國婚姻中來到台灣的東南亞新移民女性，常常被標籤為來自於落後的東南亞地區、買賣的婚姻模式等負向說詞，且二國的文化差異更會為新台灣之子帶來身心和學習發展遲緩、生活適應不良、人際關係建立困難的情形（柯淑慧，2004；蔡榮貴、黃月純，2004；鍾文悌，2004）。由此可知，主流文化對東南亞新移民母親與新台灣之子的刻板印象，是隨著社會文化脈絡的變化所建構而來的。

本研究藉由三位新台灣之子的生命故事敘說，經由研究者對其故事文本的分析，發現在主流文化刻板印象的大框架下，會左右新台灣之子雙文化認同的選擇，更會與他們的心理衝突、行為反應和調適、社會環境交互影響而呈現不同的策略與模式。以下為研究者將文本進行整合分析後，針對待答問題所提出的研究發現與綜合討論：

一、家庭是雙文化認同的初始指引

本研究發現，家庭內父母的社經地位、教育程度、文化傳遞積極程度、父親方對母親母國身分和文化的接納狀態等因素，可為三位新台灣之子的雙文化認同帶來啟蒙。

(一)、家庭社經逆境帶來金錢價值觀與生涯轉化

研究中三位新台灣之子的家庭社經地位、父母教育程度，呈現二種不同的對比型態，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雙親屬高教育程度的中產階級，尋找另一片天與不一樣的我雙親則屬低教育程度的勞工階級。國內關於新移民家庭的研究，多數會提及家庭經濟條件不理想對新台灣之子所帶來的負面身心影響(莫藜藜、賴珮玲，2004；夏曉鵬，2000；劉秀燕，2002)，這是一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本研究發現，在這可見的事實背後，經濟弱勢使他們將承擔家庭經濟納入認同，化阻力為助力。

尋找另一片天中的姐姐從童年與媽媽一起工作的過程中，體會到唯有自己獨立、堅強，才能面對外在持續不斷的無情打壓，也改變對金錢的價值觀，學習對物質欲望的節制，而弟弟的急於學得一技之長後就出社會賺錢，是來自於想扭轉主流眼光評價母親身分的心意，不想讓母親一直處於經濟弱勢而被歧視的狀態；不一樣的我則是在知道台灣與印尼貨幣的相對價值後，為了減少家庭負擔而恢復對學業的學習態度，對未來有明確的生涯方向規劃。

李維純(2007)認為家庭經濟弱勢影響新移民家庭青少年的自我概念，包括被歧視、人窮志不窮、變得懂事、認為錢很重要等，本研究從尋找另一片天和不一樣的我的生命經驗看來，家庭經濟弱勢的確會被歧視和污名化，更因有許多有力的研究報告做佐證而很難去標籤化。然而，和一般社會所認為「錢很重要」的價值觀有很大差異之處是，尋找另一片天和不一樣的我所認定的錢的重要性，是出自於體恤父母的辛苦，想分擔父母的經濟壓力，以及欲協助母親翻轉因經濟弱勢被歧視的新移民身分。在他們的雙文化認同過程中，雖然對母親母國文化僅有情感上的認同，但家庭經濟弱勢讓他們認同了從母親身上所傳承之面對生命困境

的韌性，進而促成他們的認同往更獨立、成熟的方向前進。

(二)、父母親對二國文化傳遞的積極度

除上述所提之外，父母雙方對二國文化傳遞的積極程度，也是在家庭內開啟雙文化認同的影響因素之一。在雙國文化的傳遞過程中，相較於尋找另一片天與不一樣的我父親或台灣家人對台灣文化傳遞多持「習慣成自然」的型態，照鏡子會被帥死的ShenHu的父親則是積極透過日常生活與休閒旅遊的親子互動中主動傳遞台灣文化，他認為孩子有機會認識媽媽國家文化是件好事，所以經常全家人一起回馬來西亞，再加上照鏡子會被帥死的ShenHu的母親熱衷於新移民組織事務的參與，相對地比尋找另一片天與不一樣的我的母親更有資源引領孩子認識母國文化，是為新台灣之子帶來是否覺得「自己和母親母國文化間的關係密切」，進而將母親母國文化與台灣主流文化兼容並蓄，朝向雙文化認同融合的影響關鍵。

(三)、父親方對母親母國身分和文化的接納狀態

對於青少年而言，在自我認同與文化認同的追尋中，母親仍為其頗具有影響力的重要他人 (Rice & Dolgin, 2002)。然而，本研究中尋找另一片天的母親是透過婚姻仲介的方式成為台灣媳婦，阿嬤因此對母親的身分持刻板印象而產生婆媳關係衝突，使得母親在家庭微視系統內無法被接納和平等的對待。從尋找另一片天母親與阿嬤間的婆媳衝突經驗，充分呼應莫藜藜、賴佩玲 (2004) 所提，身為新台灣之子母親的新移民女性，處於家人對她們因經濟文化背景差異、買賣婚姻觀念而生的歧視與偏見狀態，讓新台灣之子經驗到其所仰賴照護與認同的新移民母親，在家庭中地位和權力的低落，更目睹家人對母親的不尊重與不平等，在家庭的認同發展上於是產生對母親認同的迷惘情況。但從另外二位新台灣之子的經驗中也發現，他們的母親是以自由戀愛的方式與父親結合，台灣家人對其母親的身分則是予以尊重，可見婚配方式會影響東南亞新移民母親在家庭中如何被看待

和對待，但並非全然呈現被歧視的狀態。

新台灣之子所處家庭的社經地位，與其在家庭中與母親的互動關係中，從母親身上的學習到對母親的認同，會影響他們對自己的認同(李維純，2007)。因為與母親母國文化的連結過於薄弱，再加上若大多數新移民母親並沒有像照鏡子會被帥死的ShenHu的母親般，特別希望孩子去認同自己有一半是外國的血統，並且受到父親方的支持，便會如同尋找另一片天和不一樣的我，在雙文化認同上選擇直接認同父親方的台灣文化，忽略母親母國文化可以為他們帶來的有益之處，自然也會讓他們不覺得自己與母親原生國文化之間的關係是那麼的重要。

二、主流文化影響自我與雙文化認同發展

國內與新台灣之子相關的研究結果，大多傾向因新移民母親母國文化與台灣文化迥異，為新台灣之子在生活、學習、人際等層面帶來問題，以致產生低自我概念(王雅惠，2006；柯淑慧，2004；熊淑君，2003；鍾文悌，2004；蘇玉慧，2006)。本研究透過三位新台灣之子雙文化認同的經驗發現，當他們以雙國身分現身時，主流文化對於來自東南亞新移民母親的負向刻板印象與標籤，會自動平行移轉至新台灣之子身上，影響他們對自我、母親，以及母親母國文化的認同危機。

(一)、過往被歧視的經驗，影響對母親母國文化的認同程度

三位參與研究的新台灣之子，從國小就學階段開始，即陸續面對身分揭露後的評價聲浪，承載主流文化對東南亞母親的污名：照鏡子會被帥死的ShenHu主要受到同學對母親身分的偏見與誤解；不一樣的我是在學校場域中經驗老師與同學共同建構對東南亞母親所生孩子的標籤；而尋找另一片天則是從家庭內就開始經驗母親受貶抑的位置，延伸到學校與社區對他們身分的歧視行動。

新移民子女因家庭成員、社會大眾及主流文化對其母親的偏見與種族歧視影響，造成其對母親的認同產生困惑、衝突與矛盾的態度，進而影響對自己的觀感(莫藜藜、賴珮玲，2004)，這樣的現象在尋找另一片天和不一樣的我生命經驗

中清楚呈現。由於過往被歧視的經驗，使得不一樣的我不覺得能夠接觸到台灣以外的文化有任何可高興之處，反而讓他們極力想認同自己為道地的台灣人。

且當個體由家庭進入學校另一個社會化場域，他們接觸老師的言語和行為，從中建構新的道德標準、價值觀與行為模式，也透過對同儕的觀察、模仿和比較，形成對自己能力與價值的肯定，進而認同並產生團體歸屬感。王聖雯(2006)和龔元鳳(2007)的研究指出，學校場域中的班級是族群、文化議題最突顯的情境，班級內的關係網絡對族群身分的反應，會影響新台灣之子對族群身分的認同。而尋找另一片天(姐姐)和不一樣的我在被老師標籤化的過程，更呼應王聖雯(2006)研究中指出，來自於科任老師對新台灣之子族群身分的刻板印象或輕視的負向經驗，會引起他們對自身身分質疑的研究結果。由此可知，影響三位新台灣之子對母親母國文化的認同程度關鍵因素，為中介與巨視系統中，對於少數族群抱持負面觀感的主流文化觀點。

(二)、以主流價值觀、實用性，來衡量學習、認同的價值

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雖然沒有明顯的選邊站，但對於母親母國文化也會如同尋找另一片天和不一樣的我，以主流價值觀來衡量學習、認同的價值，三人對母親母國文化的認同傾向從最初的崇拜、佩服到現在部分束之高閣的模式。

Quintana (2007) 提出青少年發展族群團體意識過程中，會有「擷取觀點」的能力。當三位新台灣之子因著各種生活經驗，覺察到自己是因母親的身分而被標籤，他們就會意識到認同媽媽是不被接受的，進而影響他們選擇與母親母國文化維持何種關係的狀態。雖然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表示未來可結合英語和馬來語應用在工作上；尋找另一片天(姐姐)表示喜歡與母親談論有關印尼國家的事情，並可看見印尼文化較台灣文化的優越之處，認為了解母親原生國的文化是值得的，有機會也願意到母親的原生國去看看，但他們卻因在主流文化中不實用而不太喜歡「學習母親原生國與語言文字」，或者是要搭著主流文化所認同的語言來學，這表示新移民女性的語言在台灣並沒有獲得重視，也影響新台灣之子不認

為「參加有關母親原生國文化的活動」對他們而言是很重要的態度。

因此，無論是學習母親母國文化、歌謠、風俗或語言文字，他們的學習意願並不高，對母親母國文化之整體投入並不高，僅在認知或情感層面上表示認同，就算如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跟著母親頻繁參與新移民組織活動，仍可偶見其在自我認知與母親期待間的拉鋸戰。

陳美芝(2011) 在國小社會領域教科書中新移民族群意象之分析研究結果指出，新移民的母國文化內涵多是隱而未見，或節慶表演零星點綴的呈現，新移民子女在社會領域教科書中不易找尋到認同的對象。由此可見，有關新移民女性母國的文化語言、文字、風俗活動等並沒有相對受到重視與推廣，為國內相關研究所指出「新移民子女對二國文化統合情況良好，但對屬於漢人主流文化的父族認同顯然高於對母親原生國文化的認同」(莊家欣, 2006; 龔元鳳, 2007; 吳瓊洳, 2009) 的現象提出具體的形成因素。

因此，本研究結果呈現，主流文化的偏見、歧視與價值觀，讓新台灣之子在自我與雙文化認同發展上產生衝突矛盾心理，形成對母親母國文化在情感上表認同，但在文化投入方面則缺乏實際行動的興趣。

三、面對雙文化的心理調適偏向對污名化的回應

Sellin的文化衝突理論認為，面對不同文化之挑戰，個人或團體必然會遇到價值判斷或忠貞取捨的問題，其內心會感受到衝突(吳瓊洳, 2009)。Piaget (1950) 指出每當個體遇到某事物時，會用既有在環境中所遭遇到的經驗，以及經驗發生時他們所具備的認知基模去核對、處理，在兩者之間尋求一個平衡：若個體所接收的訊息與其既有的基模搭不上，導致認知失衡，會試圖藉由同化來重建平衡，也就是將新訊息併入其既有的基模之中，是既有知識類推運用的一種歷程；然而，也有可能需要藉由改變既有基模以納入新訊息，也就是調適。這兩種歷程共同作用的結果，賦予個體具有更高的適應性。

三位參與研究的新台灣之子們，由於主流社會對於他們來自東南亞的母親有

刻板印象，使得他們在社群關係中不斷地遇見Goffman所提的，無法符合社會所謂的「正常」情境，或是偏離「社會期許」，所形成的負面評價，也就是污名。因此，當他們在面對二種不同的文化時，其內在衝突除了Sellin文化衝突理論所提，價值判斷或忠貞取捨的問題，以及Piaget認知發展理論所提，認知基模不一致產生的認知失衡外，從他們的經驗中看見，更多的心理調適反應其實是對於污名的回應。

(一)、行動發聲

Lewin (1948) 和Tajfel (1979) 的社會認同理論認為，假如主流團體對一個族群團體的某項特性抱持貶抑的態度，那麼此族群的團體成員可能就會面臨負向社會認同的潛在危機。Hogg、Abrams 與 Patel (1987) 以及Ullah (1985) 也認為，如果在社會中的主流團體持著對族群團體特質的低尊重，然後族群團體的成員們就會潛在地面臨一種負面的社會認同（引自Phinney, 1990）。

三位新台灣之子在尚未被標籤化之前，對於自己身分的認知基模，與一般台灣的同儕並無特別的差異，覺得自己就是在台灣出生的人。但是當他們面對主流眼光的評價，發現他人看待自己的眼光竟與自己所認知到的不同時，便會產生認知不平衡的情況，於是開始透過各種社會心理機制來調節。

初始，三位新台灣之子覺察到外界是用歧視的眼光在看待自己時，如此的形象反映無法被原有的基模認同，內心油然而生罪惡、無力、自卑、自我厭惡等複雜與衝突的心理感覺，與他人的互動中為保護自己和家人，第一時間均會開啟外顯攻擊行動的自我保護傘，傳達不想被標籤化的心聲。此與Goffman的看法，被污名化的個體能夠繼續與他人互動，通常他們的心理特徵就是「接受」(acceptance) 的狀態有明顯不同。

許多關於新台灣之子在生活適應與人際關係的研究結論，傾向他們有低自我概念、生活適應不良與人際關係建立困難的情形(柯淑慧，2004；莫藜藜、賴佩玲，2004；蔡榮貴、黃月純，2004；鍾文悌，2004)，但從本研究三位新台灣之

子的經驗可看出，新台灣之子之所以會有生活適應不良、人際互動困難的困境，與來自外界先對他們投以歧視的眼光，而後引發的反作用力，有很高的關連性。

(二)、宣洩情緒後保持心理距離

在激烈抗議之後，當他們覺察到外在偏見與歧視的環境依舊，如此的行動只是一種宣示作用時，三位新台灣之子們接下來分別選擇在情感和認知層面採取應對策略，面對不被主流社會接受的強烈污名感受。如此無法為外人道的複雜心情，尋找另一片天(姐姐)和不一樣的我以尋求家人支持，互相傾吐心情的方式，好讓自己的委屈情緒能夠被了解，不會覺得自己是孤軍奮戰的。Juang 與 Cookston (2009) 指出，早期經驗歧視的負向文化適應，或負面自我形象皆會導致失衡，形成憂鬱心理症狀的觀點，在二人的情緒經驗中明顯呈現。

然而，當她們發現即使找有相同背景的家人或朋友互相述說之後，被歧視的外在情況依舊無法改變時，為了不讓自己陷入矛盾、痛苦的情緒之中，她們便選擇將負面情緒轉移至開心的事務上，藉由隔絕感受的方式來因應。Root (1990) 指出，雙族裔個體可能視他們自己為一新種族，並且設法去隱藏或拒絕他們繼承的任一方，而使得他們邊緣化。本研究中的這二位新台灣之子，因受過去被標籤經驗的影響，對於自己有印尼血統的身分不到隱藏或拒絕承認，但在心理上切斷負面感受，選擇不去面對，採取逃避的方法，不去看不去想，眼不見為淨，是另一種與自己身分隔離的狀態，呈現在心理的反應上。此種因應模式此與Goffman所提的讓渡(pass)策略中的保持距離概念相當。

(三)、揭露

除了行動上攻擊發聲、情感上尋求支持、與負面感受保持距離外，照鏡子會被帥死的ShenHu選擇用傳達正確資訊、澄清誤解的方式，再一次面對自己的雙文化身分，並表態優勢之處以去除污名，呈現Goffman所提個體願意顯現他自己，將本身污名公開的揭露策略。

然而，完全的揭露對個體而言，有時候會是一種冒險，如同Goffman所提，雖能降低身分隨時會被發現的焦慮感，但也有可能會從訊息控制者轉變為需適應困難情境的人。或許是因為如此，尋找另一片天(弟弟)雖正面表態雙國身分，但採取以無厘頭的方式不積極回應，與他人保持某種程度的距離，減低與他人發展親密關係，避免自己的資訊在不經意的互動中揭露，呈現一種承認自身所擁有的身分，但還是要盡很大的努力讓污名不被看見的部份揭露的回應策略。

(四)、調整內在認知

在外在行動與心理情緒上讓渡的因應方式外，他們也會轉向內在進行自我基模的調整，嘗試用自我語言重新建立被毀壞的自我形象。尋找另一片天(姐姐)和不一樣的我一同運用內在正向語言，以及尋找另一片天(姐姐)重新詮釋外在認定的低下特質，來進行自我肯定，呈現著調整與既有認知基模衝突的看法，以適應外在歧視眼光的心理狀態。此一因應策略未涵蓋於Goffman的污名反應策略中，但近似於掩蓋的策略，先對自己的心理進行正向的建設，準備好充分的能力去面對自己的雙文化身分，如此一來就能讓自己與他人輕鬆從污名的關注中退出。

本研究透過三位新台灣之子的經驗發現，Goffman所提的隱瞞、遮掩，以及區分成兩種生活方式，在文本中並沒有明顯的呈現，和一般會被污名化的族群，如，自殺遺族、身心障礙者面對污名的反應不同的是，他們雖因不想讓自己經驗太衝突和痛苦的情緒感受，而有時選擇與負面感受做隔離，也不太喜歡被人提起自己的身分，但他們並不會選擇全然避而不談或接受污名的方式因應，其以行動發聲、與負向情緒或外在環境的人事物保持距離、揭露以及內在認知調整等方式，來進行雙國文化的調適，有更多的意涵是朝向對污名化的回應，以及為自己去除污名標籤的行動。

四、雙文化認同過程與狀態，依據個人生命脈絡經驗有不同的建構，非單一固定的選擇

各家學者對於弱勢族群或移民者的次團體，當其面臨兩種不同文化的交相推拉時，與主流社會所產生的關係，具有不同的觀點：社會認同論者認為個體必須在二個衝突的文化間做認同選擇，或是建立一個雙文化族群認同來適應，若主流文化對於少數族群抱持負面的觀感，則雙文化認同可能造成問題 (Phinney, 1990)，此論點與Berry (1986) 在涵化論中所提之兩極化的線型模式有相似之處，將文化認同視為是一線性的概念。Berry (1986)在涵化論中的雙向模式，著重一個族群要保留遺產文化，或接受主流社會的涵化，是依個體如何衡量二個文化的價值，呈現出融合、同化、分離和拒絕等四個處理文化適應策略的方式。Cross (1978) 和Kim (1981) 的認同形成理論關注個體對於族群認同持續改變的歷程，分別會歷經認同主流文化，捨棄己族文化；遭遇主流文化歧視後，轉關注己族文化；最後至認同己族文化。Phinney (1989) 則提出青少年在文化認同過程中會呈現未覺察、探索期與認同期三階段的前進過程模式。

本研究三位新台灣之子的雙文化認同過程與狀態，與前述社會認同理論和涵化論中所提及的線性模式有不同之處。最初當他們與二國文化相遇時，同時具有對台灣社會主流文化的主要認同與對母親母國文化的部分認同，但會受到過去經驗、家庭與社會支持系統的影響，而呈現融合、半融合與期待被同化狀態。此一對兩種文化認同的過程，與Berry (2001) 涵化論中強調兩種文化間的關係並非是同一直線上「絕有」和「絕無」的兩端，而是互相獨立，依個體如何衡量二個文化的價值而決定的雙向模式吻合，凸顯三位新台灣之子於雙文化認同過程中，主體和環境脈絡間具有交互作用性，他們在同一時間點對族群文化認同不是單一選項，而是同時認同兩種族群文化標記，後依被主流文化接納的程度在認同上呈現出比例輕重的差別。

第二章文獻中趙佳慧 (2006)、Berry (2001) 和Singh Ghuman (1997) 所提外表特徵所帶來的歧視和偏見，會影響其揭露族群身分的經驗與方式，在本研究中並沒有明顯的發現，在Abu-Rayya (2006) 研究中所指出性別與族群認同和心理健

(2000)，以及Martinez 與 Dukes (1997) 的研究是類同的。就本研究的發現，主流文化對新台灣之子的接納程度低，主要是來自於對東南亞母親身分的偏見、歧視之轉移。而這也呼應Phinney (1990) 所提出，如果主流文化對於少數族群抱持負面的觀感，則該族群對雙文化認同可能造成問題的觀點。

除此外，Phinney (1989) 提到在文化認同過程中，青少年和成人早期都尚未顯露、未開始探索族群認同議題，他們對此議題不感興趣，也不會有太多的想法，處於鬆散的階段，但會從父母親或其他成人處獲得對族群的正、負向態度，由於非出於主動探求，因此不見得會在主流團體中表現出來。從本研究看來，如尋找另一片天和不一樣的我是生活在屬於新移民子女較多的環境中，同質性高而不會特別被視異類，再加上外在特徵沒有明顯的不同是可能的因素，但當他們從父母親或其他成人處獲得對父親主流族群文化的正向態度，卻對母親母國族群身分持負向態度時，他們並不會因非主動探求而不在主流團體中表現出來，而是會依照自己的生命經驗與資源，進行能夠讓自己適應主流社會的心理調適，也因此呈現出不同的雙文化認同狀態，三位新台灣之子雖傾向以認同台灣主流文化為主，但也呈現有涵容母親母國文化的可能性。

Phinney、Horenczyk、Liebkind 與 Vedder (2001) 認為，移民認同的選擇與該國家的政策互動有關，國家政策支持多元文化，移民者就能形成雙文化和好的心理狀態。融合是最好的文化調適模式，對移民者最有助益的福祉，是族群保留和進入新社會的調適同時發生，以達到雙文化認同，而排斥是最差的。由本研究可知，當我們期望新台灣之子們對兩種文化具有良好的統合能力時，應該同時對其母親母國文化加以保存與發揚，以促使他們無論是在情感上或行動上，都能珍視其母親之母國文化。

五、時代性影響建構接納與尊重新移民多元文化的環境氛圍

參與本研究的三位新台灣之子分別來自二個不同的時空背景，尋找另一片天和不一樣的我其母親們是屬於早期嫁入台灣的東南亞新移民，當時人們以「外籍

「印尼新娘」稱呼她們。八十年代左右，對於外籍以及大陸地區嫁到台灣的女子，我們稱呼她們為外籍新娘，例如「泰國新娘」、「菲律賓新娘」、「印尼新娘」，或者是以閩南語「泰國仔」、「印尼仔」、「菲律賓仔」等帶有些輕蔑、歧視的語氣稱呼之。1990年代以後，台灣新住民人數漸增，台灣主流媒體往往特別對於其中的女性配偶，冠以「新娘」的稱呼，例如：印尼籍者稱呼為「印尼新娘」，越南籍者稱呼為「越南新娘」，中華人民共和國籍者則稱呼為「大陸新娘」，並以「外籍新娘」統稱這個群體。為符應實際現況，內政部於92年8月6日函辦各機構與研究單位將「外籍新娘」正名為「外籍配偶」(內政部，2003)，外籍新娘的用語被改以外籍配偶稱呼，並且成為官方的標準用語。

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的母期則屬中期以後嫁入台灣者，當時適逢部分台灣人開始思考用外籍二字，對她們而言似有輕佻不敬，甚至可能帶有歧視之意，婦女新知基金會遂於2003年舉辦「請別再叫我『外籍新娘』徵文活動」，其後又舉辦的正名活動，票選出她們最想被稱呼的名稱，「新移民」為票選之結果，並成為稱呼該族群的主要用語，「新移民」一詞遂開始廣泛被使用於教育單位與學術研究中(婦女新知基金會，2003)。

尋找另一片天和不一樣的我因身處台灣早期對新移民女性所持貶抑觀點的社會環境，所以居於社會大系統下的家庭、學校與社區等微視和中介系統，自然而然均對他們予以標籤化的不友善回應。相對來說，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就幸運許多，雖然初期也因外界對母親身分的偏見和誤解而遭連坐，但由於此時新移民的概念已被婦權團體正視並正名，也將之導入學校教育體系中，再加上其國小老師能在社會科領域教學上，清楚介紹台灣移民歷史脈絡，協助學生們對新移民概念的再認識，而非如尋找另一片天姐姐和不一樣的我被以照本宣科、簡單帶過的方式教導，後國中老師亦能看見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的優勢能力，為其創造成功經驗，重新建立多元文化被尊重的價值。

一個人在家庭環境外所遇見的重要對象或團體，如：師長、同儕、社區、社會等，對個體形象的反映，將持續影響和塑造內在認同，Singh Ghuman (1997)

認為，對於在主流社會中出生及接受教育的移民者，有較高的文化適應態度。但從本研究三位新台灣之子與學校老師的互動經驗中發現，出生於台灣主流社會和接受台灣主流教育並不完全會為新台灣之子帶來好的文化適應，反而是外圍系統若能夠願意替他們正名與創造成功經驗，將是協助他們從對自己與對母親認同混淆的狀態中跳脫，在適應主流文化的心理發展歷程上，能夠更如實、自在地接納自己雙國血統的身分的契機。

Phinney、Horenczyk、Liebkind 與 Vedder (2001) 指出，如果主流社會正在接受移民者，他們會渴望和開始在原有的空間內，去調適進入新國家的過程，則將會有選擇成為雙文化認同的結果，並且帶來心理健康。文化認同是一個動態的建構過程，個體會因二者文化交會所形成的部分改變，經驗不同的心理變化，而形成心理的文化適應（psychological acculturation）(Berry, 2001)。本研究由於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與尋找另一片天和不一樣的我二者所處的時代性不同，再加上教師能夠營造一個高度包容性的班級環境氣氛，使得該新台灣之子在人際關係上的關係得以改善並增加他們的社交互動空間，而老師們肯定該台灣之子的表現，增強其自我認同，亦促進同儕間融洽氣氛，更能讓該新台灣之子的生活適應良好。

由此可知，台灣社會對新移民母親與新台灣之子概念的轉變趨勢，影響這三位新台灣之子在不同時空背景下被對待的方式，而這樣的方式可成為他們如何認同自己與雙國文化的契機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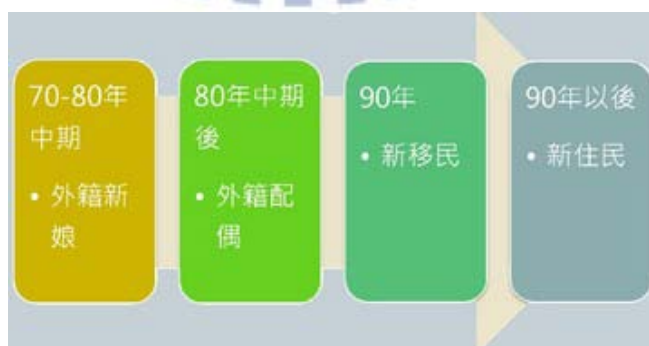


圖5-1、從「外籍新娘」到「外籍配偶」再到「新移民」、「新住民」

六、拋開主流眼光歧見方能欣賞多元文化價值

長久以來，在學術研究、媒體的建構及國人不瞭解的情形下，新移民女性配偶以及新台灣之子總是在一連串的社會問題下被看待。然而，從本研究發現，照鏡子會被帥死的 ShenHu 由於擁有被主流文化接納的經驗，所以當他在經過老師重新框架後，面對仍是有同儕用異樣的眼光看自己，或是在學習母親母國文化遭遇挫折時，能夠以告訴自己「還是有很多人羨慕自己可以常出國」、「多學一些東西也是不錯，帶活動用得上」等正向的眼光來看待事件的亮點，也能夠在父母親雙方的薰陶下，看見自己可發展的長處和方向；而尋找另一片天和不一樣的我，由於早期承受較多歧視的負向經驗，又缺少外在系統反映給他們的正向經驗，故在文化適應過程中就顯得比較辛苦，影響他們現提及自己身分或與母親母國有關的事情時，會較容易與過去經驗所引發的負向感受做連結，但他們卻也能從這樣的逆境中，發展出獨立的人格特質、成熟自律的生活態度、務實的金錢價值觀，以及期許能用自己的生涯努力為家庭開創新局。

三位新台灣之子結合了父母雙方的跨文化資本，各自展現出屬於自己的生命色彩。跨國婚姻所帶來的異地文化，事實上為三位新台灣之子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們比只有單一文化的孩子更具有多元語言與價值視野的優勢。從本研究看來，不同文化組合的家庭，反而能提供三位新台灣之子文化認同多樣而有趣的情境，其文化張力即提供個人一個既新奇又良好的表現機會。

國內外相關研究指出，族群認同、文化適應二者與自我認同、心理幸福感和行為適應間具有正向關係，跨文化個體接受融合或雙文化策略，有較好的心理和社會文化適應，有較強族群認同的雙文化青少年，也有較好的心理社會適應（陳毓文，2010；Abu-Rayya, 2006；Eyou、Adair & Dixon, 2000；Ward, 2006）。換言之，多樣的文化背景對三位新台灣之子的發展是助力而非阻力，其社會化的結果比單一文化結合的家庭更有助於他們接觸更寬廣的價值、規範、道德與行為。因此，在強調國際化與多元文化的社會中，跨文化將是這三個新移民家庭有利其子女發展的墊腳石，而非絆腳石。

第二節、研究者的回觀行動與反思

本節將以研究進行的前、中、後期為切點，進行本研究的整體回顧，並呈現研究者於研究進行各階段中的內在狀態與反思。

一、研究前的「問題」意識與「特別」眼光

當初，選擇新台灣之子雙文化認同議題，是因為在助人工作實務上，發現不少新台灣之子因情緒、行為與人際問題，被轉介參與團體輔導或個別諮商，在工作過程中，我發現這些孩子所呈現的問題，與周圍的人如何與他們互動有關，所以就很好奇他們的雙文化身分在主流社會生活的經驗，想透過研究了解他們在心理上如何面對主流社會的眼光，以及父母親雙方文化在他們心中的定位。

當我開始閱讀相關文獻時，發現國內大部分關於新移民家庭和新台灣之子的研究結果，均著重於他們在生活適應、學習上所呈現出的困難。然而，在這之外，也有不少研究者開始關心新台灣之子受主流文化影響的自我認同建構，更讓我意外的是竟有一、二位研究者開始關注新台灣之子文化認同議題，這樣的研究趨勢於是支持著我朝此方向前進，想在現有以量化呈現新台灣之子文化認同傾向的現象下，能透過質性研究了解他們在文化認同過程中的內在心理運作，如何與主流社會建構出他們的文化認同狀態。

但何以新台灣之子的文化認同議題如此吸引我，以及我對於自己和新台灣之子的文化認同議題是如何看待的呢？自小在父母雙方家族都是閩南族群的環境中成長，對於需要在二種不同文化間尋求認同的平衡，一直都不是我需要學習的課題。所以，當我在求學或工作生涯過程中，聽到或看到關於人們在雙親二種不同文化下生活的心路歷程故事時，往往都投以一種羨慕和感動的眼神，覺得他們的生活經驗真是精彩與豐富，也因為每次與自己生命經驗大不相同的人說話，總是讓我在看待世界的視框上有了新的挪移，而對他們抱持著「很特別」的感覺。而這樣的經驗影響了當我與這群新台灣之子服務對象接觸時，同樣也以他們很「特

別」的視框來看待。

在尚未進入研究前，新台灣之子之所以會被我定義為「特別」，是因為他們經常被主流社會體制視為是「問題」，但在多次與他們相處後，覺得他們的生命經驗其實是很不一樣的，很多都不是我這個生活在父母為同一個族群的人所能夠經驗到的，但很少有人能夠看見他們的這個優勢，反而都看見他們因不適應主流社會所產生的問題。因此，就啟動了一股想在現有「問題」思維的社會情境下，欲透過研究進行發聲，讓他們這些寶貴和豐富的「特別」生命經驗被正向看見的熱誠。

二、尋找研究參與者與訪談互動下的「問題」與「特別」被解構

研究初期，我透過自己的職場與人際網絡尋找研究參與者，但因遲遲未得到回覆而焦慮不已，焦慮的過程心裡就在想，會不會要他們說自己雙文化的生活經驗，其實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因為這會有需要現身自己的身分，並且可能觸及不愉快經驗的為難，而這樣的擔心其實隱約從研究過程中研究參與者的反應浮現。

前導研究的研究參與者是透過其母親的邀請而來，由於母親熱衷於新移民組織活動，自也想讓孩子能有參與此研究議題的機會，但我不確定研究參與者自己是如何看待這件事，我還是在母親表達孩子有意願受訪的情況下進行預訪。第一次訪談主要是在研究參與者家中進行研究計畫說明，當時研究參與者一直專注於玩電腦，沒有意願和父母親一起聽，直說還沒輪到自己，後於半推半就下完成了第一次預訪。訪談過程中，研究參與者所回應的語言與內容簡短，多表達太久了想不起來，或者不知道怎麼形容，我想嘗試問其困難和挫折的經驗，他則表示自己一帆風順。

後來在經過幾次接觸後，經詢問下才了解到他剛開始在面對陌生的我其實是抗拒的，他的說法很坦誠，表示「要先確認研究者是好人還是壞人」，後來把我當成朋友之後才越說越多，也願意主動提及自己的負向感受經驗。在第三次見面

時，研究參與者對研究方法好奇而主動提問，我邀請研究參與者分享對敘說自己故事的想法和感受，研究參與者認為：「故事交給別人說較好，站在自己的角度無法看見很多事，要訪問周遭的人才對」，雖然在效度的角度上的確能增加故事的豐富性，但似乎也呈現出要他回顧並說出自己生命經驗的忐忑心情。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南部研究參與者的訪談過程中，但與北部研究參與者略微不同的是，他們是由傳道代為詢問意願，並沒有非得答應的壓力，參與研究的動機與自主性較高。他們對於我的來訪非常歡迎，也會於訪談結束時，主動詢問下一次訪談時間。訪談過程中，他們對於自己面對主流文化的經驗侃侃而談，時而開心時而生氣，當談到不喜歡別人主動提及他們的身分時，我主動詢問他們對於我聚焦於新台灣之子身分經驗的訪問，是否會為他們帶來任何的不舒服感，他們給予「並不會」的回應，也就令我安心許多。但後來在補訪過程中，因我想多了解他們在接觸二國不同文化的差異經驗，而舉例說到：「比如說妳們有其他同學，媽媽不是印尼或不是越南的，就不會吃到這樣子的料理啊！」，其中一人脫口而出「所以我們該感到開心嗎？」的回應，令我感到震驚，也讓我反思自己如此的表達，似乎讓他們感受到是站在主流的眼光看待他們的特殊性，有一種他們想淡化這種「特別」，但主流卻要凸顯此種「特別」的氛圍。

這樣的衝撞讓我回到自己曾經被說「很另類」的經驗。由於我自己除了有社工和諮商的訓練背景外，另一個則是取得人類性學的碩士學位。一般人在聽到我有涉略性學領域時，大家都會很好奇，有人會問：「妳怎麼會對這個領域有興趣？」，也有人會爭相詢問我一些在生活或工作實務上對性的疑問，但更不乏有人會回應我：「好特別喔！」或「妳一定是個很另類的人」。每當聽到有人說這樣的話時，我都會先會心一笑，但內心其實是不太舒服的，因為在我的觀點裡，性議題是每個人每天生活都會遇到的事，它就是很一般，哪來的特別？又怎麼會被以「很另類」來形容我這個人？後再進一步探問之下，原來會這麼說的人，都是覺得性在我們文化價值觀裡是很少被談，也很少人敢談的議題，而我竟然可以如此，所以說是「很另類」。

這裡發生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當我說出我有性學背景時，人們「特別」的觀點就會馬上跑出來，甚至會用「很另類」來定義我這個人，而這中間少了對於我如何進入性學領域的脈絡理解，也凸顯出主流社會如何看待非主流人事物的主觀認定。

回想在與三位新台灣之子訪談的過程中，我邀請他們分享對自己雙國文化身份的想法，很妙的是，他們在不同的時空裡，第一句話均直接回答：「都是同一種人，地球人」，我當時僅在心裡直呼：「這也太有默契了吧！回答的都一樣」，現在回顧整個研究歷程，再加上自己的經驗體會，充分感受到他們真的很想和其他人一樣被一般化看待的心情。

這樣的交會帶給我一個很大的提醒是，新台灣之子所感受到的「特別」多是建構在污名之上的，我與研究參與者有著不同的身分是事實，但如何能在不同的位置上進行經驗的對話，又不讓他們感受到再次受到傷害，避免主流文化價值觀凌駕於個人經驗脈絡的理解之上，可做為我未來與多元身分服務對象工作時的借鏡。

三、二種生命經驗交會後的重新建構

我覺得敘事吸引人的地方，就在於「故事滋養故事」，他們的坦誠讓我很感動，透過他們真實生活經驗的分享和感受的表達，讓我想到自己過去於文化認同上不被主流價值得接納的經驗。文化認同是身分構成的過程，性別是其中的一項文化符號元素。從小就看見母親很認真地在實踐社會對於女性性別角色的期待，當初我以為女性就是只有媽媽那個樣子，需要以家庭為主，在關係中退讓，將自己的情緒和聲音都藏起來。後來慢慢長大後，我發現母親其實是辛苦、不快樂的，所以我就決定不和媽媽長得一樣。

就在我做出暫時不進入婚姻的性別角色實踐，而先致力於成就自我的生涯發展的選擇和決定時，也曾經驗過一段與主流價值抗爭的過程，雖然不至於是污名的對抗，但在過程中會不斷地與牢不可破的主流衝撞，和主流文化不同的這個選

擇，一度衝擊我的自我價值，於是我努力調整自己，順應主流社會的期待，但後來我發現如此巨大的改變，吞噬了我原本自由不拘的個性，我突然變得不認識自己，感到非常痛苦，我體會到只要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身處於關係脈絡中，關於面對體制到決定回應行動間，自然會有著一連串的自我對話，這樣的對話過程其實是一個可以看見自己的機會，看見自己的狀態是有時候是一件痛苦的事，就像我看見自己的需求後，會想要為自己做些行動，而這樣的行動其實就意味著要挪動些許自己或他人眼中陳舊的規範及視框，某種程度來說，這是一種需透過痛苦所學習而來的經驗。

很幸運自己能與這幾位新台灣之子走一趟生命經驗的整理，欣賞他們能在逆境中發展出讓自己生命往前進的力量，過程中內心雖非常的衝突、煎熬，但他們自有一種不輕易接受命定的勇氣，每個人處於主流社會的洪流中，最後皆能夠找到安身立命的方法，並且因著此種經驗豐富未來的生命。以往一味與母親辯論女人是否應該認命完成社會期待議題的我，也因此能夠學著接受母親在她那個時代下有屬於她自己的選擇，並欣賞她能夠在每一段逆境中找到繼續前進的生命韌力，而於婚姻關係後期對自己覺察後，說出了看見自己數十年來在婚姻關係中的辛苦狀態，同時也欣賞自己由母親生命經驗而來的傳承。

也因著他們與自己故事的碰撞，讓我更加體會差異不被接納在主流文化下的辛苦，若這社會對於所謂的差異能有更多脈絡性的理解，則能有更多接納多元的氛圍，所有的「特別」也就是不是「污名」的特別，而是一種「有價值」的特別。隨著研究的進程，文化認同的主體已從最初的特定族群，轉換到對每個個體如何成就自己生命經驗的欣賞，這樣的體會將會帶入我未來繼續在從事社區工作時，能夠以更大欣賞的態度，來對待各式各樣的服務對象。

第三節、建議

本節先說明未來研究可進行的方向，繼對社群民眾、新移民家庭教育單位、學校老師、政府當局及多元文化諮商工作者提出建議。

一、對未來研究者的建議

(一)、增加來自不同國別母親的研究對象

本研究經立意取樣結果，研究參與者母親的國籍僅有馬來西亞與印尼二國。雖然他們居住與學習地區分別位於北部都會區，以及南部農村區，能夠呈現二種不同類型的對照，但由於南部受訪的新台灣之子，實際接觸母親母國文化的經驗與內涵較北部研究參與者來得少，且來自於相同的生活環境，在背景條件沒有太大差異的情況下，經過研究者努力的多方探問後，所述說的生命經驗仍相似，趨向大同中僅有小異的情況。

建議未來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能夠再增添母親來自其他國家的研究參與者，以得更多元的個別化敘說經驗。

(二)、增加融入研究參與者生活場域的可能性

由於本研究係採敘事探究，除了研究參與者的口述經驗外，他們生命過程中的照片、文字記錄等歷史材料，均能輔助故事的敘說。而在研究過程發現，與北部研究參與者相較，南部研究參與者在這方面的材料並不多，僅有兒時的照片與記憶，文本的建構主要由他們依記憶口述，訪談間有幾次發生年代久遠不復記憶的情況。

再者，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生活場域之間的關係，亦是豐富敘說材料的途徑之一。但因考量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雙方交通便利性因素，故與南部研究參與者訪談地點均在教會，沒有機會如北部研究參與者般，擁有在地便利性而能夠有機會與其父母互動、交談，以及進行實地的觀察，致亦未能於文本撰寫上有多一些

增添輔助的資訊，甚為可惜。

建議未來在研究過程中，可依研究者的地緣性尋找研究參與者，以增加融入研究參與者生活場域的可能性，也可彌補研究參與者歷史性資料不足之憾。

(三)、確實交付文本予研究參與者

敘說文本是在研究參與者與研究者互相建構而成的，研究過程發生一個插曲是，研究者欲將文本交予第一位研究參與者校閱，但適逢該研究參與者不在家，研究者便將文本託由媽媽轉交，但媽媽看完後便向孩子表示有些內容說錯了，使得該研究參與者於下一次訪談時的敘說內容頓減，頻表達「問媽媽比較清楚，講太多怕講錯，媽媽會不高興」，致研究者需進一步處理潛在的親子衝突。有此前車之鑑，另二位研究參與者的文本，經雙方討論後，均以電子郵件的方式傳送，並在傳送後以電話通知開信閱讀，確保研究參與者的隱私權。

建議未來與未成年研究參與者進行研究時，文本需當面交給研究參與者本人，且單獨約在外面的場所與其進行文本內容確認為宜，以避免父母過度涉入和指責研究參與者的敘說經驗，影響文本的建構。

二、對社群民眾的建議：降低社會偏見與歧視，欣賞不同個體的生命力

由本研究發現，主流社會對東南亞新移民母親與新台灣之子的偏見與歧視，主要影響了三位新台灣之子對母親母國文化的認同感，而從這三位新台灣之子的心理調適歷程可得知，他們所採取的因應策略多是偏向對污名的回應。

因此，在平時我們需留意自己是否帶著主流偏見看待新移民母親與她們的孩子，有時候當我們只聚焦於問題，就會看不見問題背後的亮點，事實上人不會是等於問題，研究中新移民家庭的經濟或文化不利所帶來的限制，並不阻礙新台灣之子的發展，反而成為他們更能承擔責任，相信自己能力的轉機。

三、對新移民家庭教育單位的建議：推動家庭內重視新移民多元文化，促進新台灣之子對雙文化的認同

本研究結果發現，三位新台灣之子自覺和母親母國文化之間的關係，並不十分密切，雖然會因對母親母國的事務好奇而詢問，但是在實際的活動參與部分，對於學習母親母國文化、歌曲、技藝或語言文字，他們的學習意願並不高，甚或被動參與，且並不認為「參加有關母親母國文化的活動」是很重要的。這個結果反映出國內許多新移民家庭的多元文化教育仍有待努力。

目前提供新移民家庭服務的相關政府與民間單位，在推動新移民母親認識、適應和融入台灣文化的家庭教育，以及提供讓新移民母親有介紹母國文化的機會上不遺餘力，但研究者發現參與的主體均為新移民母親和新台灣之子。從照鏡子會被帥死的ShenHu的經驗可知，若父親這一方願意支持，孩子就能在接觸不同文化過程中，發現多元文化對自己的助益。因此，若新移民家庭教育單位能在舉辦新移民母親介紹母國文化的活動時，提倡以家庭為中心的理念，邀請和鼓勵父親方的家人一同參與，透過認識台灣以外的文化，並普同化其特殊性，將能提升家庭內對母親母國文化的支持度。

四、對學校老師的建議：學校內營造接納多元的氛圍，協助新台灣之子獲得成功經驗

由本研究發現，學校環境脈絡中老師與同儕的標籤與歧視，造成三位新台灣之子的認同壓力與衝突，但老師對新移民概念的重新架構，為照鏡子會被帥死的ShenHu的人際與學習適應帶來曙光。由此，學校第一線工作者需時時檢視自己是否因刻板印象，而標籤化、弱勢化新移民家庭的子女，同時增進與多元文化相關的輔導知能，在班級經營與課堂教學過程中，透過拼圖教室¹的教材設計概念，賦予每一位學生於課程的活動、討論和分享上均有其任務，運用自己的特長以達

¹此為社會心理學名詞。社會學家創造讓不同種族與膚色的學生，每人都分到唯一的學習任務，追求完成共同目標、教室內相互依賴氣氛的實驗情境，有別於傳統教室學生的互相競爭，結果發現，經由這個拼圖歷程，學生們開始留意別人，並且彼此尊重，更有能力以別人的觀點看世界（李茂興、余伯泉譯，1995）。

成團體共同目標，營造平等和多元的氣氛，並視學生的個別情況，予以資源協助，讓他們從中獲得成功學習經驗，有助於新台灣之子對自我與雙文化認同的發展。

六、對政府當局的建議：制訂讓能新台灣之子運用多元語言的政策，為雙文化認同帶來支持後盾

雙文化認同的目標要能達成，除了必須有來自社群與家庭的支持之外，學校教育若可以是雙語或多語的，在教導主流文化語言之外，也能提供學生有學習不同族群語言的機會，讓所有的學生了解到即使是弱勢族群的文化及語言，也都有她的價值，進一步培養新台灣之子對其母親母國文化的驕傲，增加對該文化的認同。學校教育在實施雙文化教育時，仍然可以要求新移民子女在學校使用主流文化之語言，但同時也鼓勵學習母親母國語言及文化，使新台灣之子能因感受到實用性而熟習雙語、雙文化之內容。當這些族群的聲音能在學校中自由的呈現，新移民子女也將會建立足夠的信心。

在強調國際化與多元文化的社會中，發展新台灣之子的雙語或雙文化教學，將是跨文化族群的極大優勢。當我們期望新台灣之子對兩種文化具有良好的統合能力時，應該同時對其母親母國文化加以保存與發揚，以促使他們無論是在情感上或行動上，都能珍視其母親之母國文化，而並非一味的要求新移民或新台灣之子瞭解、適應與融入台灣社會主流文化。

七、對多元文化諮商工作者的建議：實踐「人是解決自己問題的專家」的敘事精神

敘事是一建構後解構而再重新建構的過程，自我認同也透過此過程而有不同的轉變。本研究中，三位新台灣之子從缺乏文化覺察意識，到改變成對在社會關係中的自己有所覺察和行動，在故事中可以看見他們對自我與文化的認同狀態，是跟隨著自己如何面對外在環境的挑戰而做調整，過程中他們各自有著各種情緒、認知和行動的因應策略，同時也長出了足以支持他們生命往前進的能力。

主流文化的諮商師，對於不同種族的服務對象，經常會有負面的刻板化印象，或是隱微的攻擊，就像研究者初始帶著新台灣之子很「特別」的有色眼鏡進入研究，訪談過程中與研究參與者建構的碰撞，而將這個「特別」進行解構，重新建構對新台灣之子一般化的觀點，轉而對他們如何讓自己成為一個令自己滿意的人的欣賞。

身為一個在多元社會趨勢下的諮商師，必須有能力區辨出文化認同的層級與覺察，並據以調整諮商風格以符合服務對象的覺察層次。從他們的背景脈絡中去聽故事，協力找出他們如何能在具有挑戰的生命裡，還能夠繼續往前走的力量，欣賞自己的難得之處，並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去解構主流社會所賦予的標籤。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 內政部戶政司(2012)。100年國人結婚之外籍與大陸配偶統計。2012年1月21日，取自<http://www.immigration.gov.tw>。
- 王雅惠(2006)。高雄市新移民女性國小高年級子女家庭環境與其自我概念、學校生活適應關係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 王聖雯(2006)。從多元文化看跨國婚姻家庭子女的生活場域經驗。私立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 王勇智、鄧明宇(合譯)(2003)。C. K. Riessman著。敘說分析。台北市：五南。
- 朱玉玲(2004)。推展南洋媳婦成長活動之策略與經驗—以澎湖縣為例。社區發展季刊，105，258-268。
- 朱儀羚、康萃婷、柯禧慧、蔡欣志、吳芝儀(譯)(2004)。M. L. Crossley著。敘事心理與研究：自我、創傷與意義的建構。嘉義市：濤石文化。
- 李怡璇(2005)。社會支持課程對學習適應、人際關係與自我效能之實驗研究—以外籍配偶子女為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碩士論文，未出版，屏東縣。
- 李國基(2008)。東南亞外籍配偶子女雙族裔認同之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屏東市。
- 李維純(2007)。東南亞籍新移民女性其青少年子女自我概念發展與轉換之探討研究。國立暨南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南投縣。
- 李建銘(2009)。新移民子女的心理認同。載於張芳全，新移民子女的教育(179-200)。台北市：心理。
- 李茂興、余伯泉(譯)(1995)。E. Arouson, T.D. Wilson & R.M. Akert著。社會心理學。台北市：揚智文化。
- 呂錘卿(1987)。我國兒童認同對象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 吳芝儀(2003)。敘事研究的方法論探討。載於齊力、林本炫主編，質性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頁95-114)。高雄市：復文。
- 吳瓊洳(2009)。新移民子女文化認同之研究—以雲林縣國中生為例。臺中教育大學學報：教育類，23(2)，187-204。
- 車達(2004)。台灣新移民女性子女之心靈世界探索。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技職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雲林市。
- 周美慧(2006)。從生態系統觀點探討新台灣之子的生活適應—以台中縣國小學童

- 為例。靜宜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中市。
- 林瑞穗（譯）（2002）。C. Calhoun, D. Light & S. Keller著。社會學。台北市：雙葉。
- 柯淑慧（2004）。新移民女性與本籍母親之子女學業成就之比較研究—以基隆市國小一年級學生為例。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幼兒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 夏曉鵬（2000）。資本國際化下的國際婚姻—以台灣的外籍新娘現象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9，45-92。
- 夏曉鵬（2005）。不要叫我外籍新娘。台北縣：左岸文化。
- 張春興（1989）。張氏心理學辭典。台北市：東華。
- 陳明利（2004）。跨國婚姻下一東南亞外籍新娘來台生活適應與教養子女經驗之研究。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 陳清花（2005）。澎湖縣新移民女性子女學校學習之探討。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 陳佩君（2007）。台灣新移民家庭高中職子女之自我認同內涵與歷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彰化市。
- 陳毓文（2010）。新住民家庭青少年子女生活適應狀況模式檢測。教育心理學報，42，1，29-52。
- 陳美芝（2011）。關於國小社會領域教科書中新移民族群意象之分析研究。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 莫藜藜、賴佩玲（2004）。台灣社會少子化與外籍配偶子女的問題初探。社區發展季刊，105，55-65。
- 莊家欣（2006）。外籍配偶之子女族群認同與自我概念之相關研究—以台南縣為例。國立臺南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南市。
- 教育部（2011）。新移民子女就讀國中小人數統計。2011年1月21日，取自 http://www.edu.tw/statistics/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8869。
- 婦女新知（2003）。婦女新知與新移民工作。2012年12月28日，取自 <http://www.awakening.org.tw/active/1/02.asp>。
- 黃瓊瑤（2007）。屏東縣本國籍以及外籍配偶子女族群認同與自我概念之相關研究。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屏東縣。
- 黃德祥（主譯）（2006）。R. M. Lerner著。青少年心理學。台北市：心理。
- 黃尚文（2006）。多元文化思潮之爭議及其對台灣多元文化教育之啟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 游恆山（編譯）（2004）。心理學。台北市：五南。
- 楊瑪利、楊艾俐（2004）。新台灣之子—未來百年台灣競爭力。台北市：天下雜誌。
- 葉宜亨（2005）。新移民女性子女的親子關係、家庭氣氛與生活適應知相關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 容彩君 (2007)。青少年社會化關係、自我認同與自尊之相關研究-以苗栗縣跨國婚配子女為例。中國文化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 熊淑君 (2003)。新移民女性子女的自我概念及人際關係之研究。國立台北師範學院教育心理與諮商輔導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2003)。大陸及外籍子女學校適應狀況調查報告。
- 趙佳慧 (2006)。台灣與東南亞跨國家庭青少年外表形象、自我概念及族群認同間關連性之初探。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縣。
- 劉秀燕 (2002)。跨文化衝擊下外籍新娘家庭環境及其子女行為表現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縣。
- 劉芳玲 (2005)。新移民女性子女的學業成就與家長參與之關聯分析。私立元智大學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桃園縣。
- 蔡榮貴、黃月純 (2004)。台灣外籍配偶子女教育問題與因應策略。台灣教育，626，32-37。
- 蔡敏玲、余曉雯 (譯) (2003)。D. J. Clandinin & F. M. Connelly 著。敘說探究：質性經驗中的經驗與故事。台北市：心理。
- 潘淑滿 (2003)。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台北市：心理。
- 鍾文悌 (2004)。外籍配偶子女學業表現與生活適應之相關研究。國立屏東師範學院教育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屏東市。
- 蘇容瑾 (2004)。外籍配偶對母職之角色覺察與子女教養態度之研究。私立南台科技大學技職教育與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南縣。
- 蘇玉慧 (2006)。新移民女性子女生活適應調查研究-以基隆市國民小學為例。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 龔元鳳 (2007)。大陸與東南亞新移民女性子女族群認同之差異研究。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南市。

英文文獻

- Abu-Rayya, H. M. (2006). Acculturation and Well-Being among Arab-European Mixed-Ethnic Adolescents in Israel.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39, 745-751.
- Berry, J. W. (2001). A Psychology of Immigratio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7, 3, 615-631.
- Eyou, M. L., Adair, V., & Dixon, R. (2000). Cultural identity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of adolescent Chinese immigrants in New Zealand.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3, 531-543.
- Erving Goffman (1963).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NY: Prentice-Hall, Inc.
- Juang, L. P., & Cookston, J. T. (2009). Acculturation, Discrimination,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Chinese American Adolescents : A Longitudinal Study. *J Primary Prevent*, 30, 475-496.
- Lewin, K. (1948). *Resolving social conflicts*. Harper & Brothers, New York.
- Lieblich, A., Tuval-Mashiach, R., & Zilber, T. (1998). *Narrative Research*. Calif : sage.
- Martinez, R. O. & Dukes R. L. (1997). The Effects of Ethnic Identity, Ethnicity, and Gender on Adolescent Well-Being.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6, 5, 503-516.
- Phinney, J. S. (1990). Ethnic identity in adolescents and adults : Review of resear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3, 499 -514.
- Phinney, J. S., Horenczyk, G., Liebkind, K., & Vedder, P. (2001). Ethnic Identity, Immigration, and Well-Being : An Interaction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Vol. 57, 3, 493-510.
- Rice, F. P., & Dolgin, K. G. (2002). *The adolescent: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s, and culture*. Boston: Allyn and Bacon.
- Root, M. P. P. (1996). *The multiracial experience: racial borders as the new frontier*. London: Sage.
- Singh Ghuman, P. A. (1997). Assimilation or integration? A study of Asian adolescents. *Educational Research*, 39, 1, 23-35.
- Tajfel, H., & Turner, J. (1979).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group conflict. In W. Austin, & S. Worchel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pp.33-47). Monterey, CA: Brook/Cole.
- Ward, C. (2006). Acculturation, identity and adaptation in dual heritage adolesc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30, 243-259.
- Quintana, S. M. (2007). Racial and ethnic identity: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s and research.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54,3, 259-270.

附錄

附錄一：研究邀請函暨同意書

您好：

我是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教育心理與諮商組的研究生張琬涓，指導教授為許鶯珠博士，目前正在進行「新台灣之子雙文化認同心理歷程探究」的論文研究，誠摯地邀請您分享自己的成長故事，讓您的真實經驗帶領社會大眾更加理解新台灣之子的內心世界。

我會和您進行至少 3 次、一次約 1~2 個小時的訪談，若有需要，則會再進行補訪。這是個很特別的經驗，除了學術上的貢獻外，也可讓您透過說自己的故事來更加認識自己，許多說過自己故事的人都表示對自己有更多的發現。

為求寶貴之訪談資料能被完整記錄，整個訪談的過程將進行錄音，並於訪談後謄寫成故事文本，文本內容僅供本研究之用，並且遵守保密的原則，以匿名方式謹慎處理任何可供辨識之個人資料，並會將每一次書寫的內容與您一起校閱和檢核，您持有對所述說的故事修改及保留呈現的權利。

在研究過程中歡迎您隨時提出意見及問題，研究完成後會奉上論文一本，以及一份小禮物作為答謝，如果同意參與研究，請在同意欄內簽名，誠懇地歡迎並感謝您的參與。

研究參與者家長：_____

研究參與者：_____

祝平安快樂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教育心理與諮商組指導老師：許鶯珠副教授

研究生：張琬涓敬上

附錄二：訪談大綱

- 1、請介紹你自己和家人，並說一說從小到現在，你、爸爸、媽媽，還有家裡其他人的相處情形。
- 2、說一說從小到現在，你在與家人、老師、同學或其他人相處的生活經驗中，讓你印象深刻、對你產生影響的事件，它們如何發生?帶來哪些影響?自己如何感覺和解讀?
- 3、你遇過什麼令你印象深刻的困難和挫折? 它們如何發生?對你帶來哪些影響?你是怎麼面對和克服，讓自己走過來的?
- 4、你最得意、有成就感的經驗是什麼? 它們如何發生?對你帶來哪些影響?你是怎麼做到的?
- 5、除了熟悉台灣的語言、文化(服飾、飲食、音樂、舞蹈、節慶、民俗活動)，你認識媽媽國家語言或文化的經驗為何?過程如何?帶給你哪些想法或感受?
- 6、對於父母親有兩種不同的身分和文化，帶給你什麼樣的經驗、感覺和影響?你怎麼想你自己和父母親之間的關係?你如何面對和調整自己的心情?
- 7、回顧成長過程後，你會如何形容現在的自己?以及對於自己擁有二種文化的身分有何種新的想法?